

金融与发展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www.imf.org/fandd

2007年9月号

中国经济谜团
IMF 最新监控
实际汇率入门
对 Robert Barro 的采访
Johnson 关于主权财富基金的观点

城市的演变

Finance &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07 - Chinese



MFICA2007003

《金融与发展》是IMF的季刊,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英文版刊号 ISSN 0015-1947

Laura Wallace
主 编

Camilla Andersen
Jeremy Clift
Archana Kumar
James Rowe
Simon Willson
高级编辑

Elisa Diehl
助理编辑

Luisa Menjivar
创意主管

Lai Oy Louie
美术编辑

Lijun Li
Kelley McCollum
Randa Elnagar
编务助理

编辑顾问

Francesco Caramazza
Adrienne Cheasty
Alfredo Cuevas
Domenico Fanizza
Andrew Feltenstein
Paul Hilbers
Paolo Mauro
Adnan Mazarei
Thomas Richardson
Jerald Schiff
Jan-Willem Van der Vossen
Jeromin Zettelmeyer



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
地址: 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 (202)623-7430
传真: (202)623-7201
电子邮件: publications@imf.org

©版权所有,IMF 2007年。翻印本刊文章
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Telephone: (202)623-8300
Facsimile: (202)623-6149

Website: <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
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
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中文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
地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 88190915 88190916
传真: 88190916
邮政编码: 100036
网址: <http://www.cfeph.cn>
中文版刊号: ISSN 0256-2561



金融与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

2007年9月号·第44卷·第3期

特 辑

城市化和大城市

8 城市变革

如果世界能够关注并且合理规划,快速的城市化将呈现出繁荣景象。

David E. Bloom和Tarun Khanna

15 城市贫困

穷人正在向城镇移居吗?是的,但速度可能还不够快。

Martin Ravallion

20 大,还是太大?

超大型城市在公共治理、融资和服务提供方面也面临一些特殊问题。

Ehtisham Ahmad

24 观点:在管理大城市方面什么是最大的挑战?

有关不同处事方式的三种观点

Matthew Maury、Kishore Mahbubani和Ramesh Ramanathan和Swati Ramanathan

其 他

27 中国再平衡行动

中国的经济奇迹可能处于危险中,除非可以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

Jahangir Aziz和Steven Dunaway

32 解决中国再平衡难题

市场力量会遵循“自然”轨迹

Jonathan Anderson

36 观点:中国的改革路径

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以保持稳定的长期目标为基础的。

胡晓炼

38 中国的出口迅猛增长

中国的出口势头正急速地转向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

Mary Amiti和Caroline Freund

42 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外依存度

中国的经济繁荣与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Li Cui

48 帮助全球经济保持健康

IMF采取了新的框架以监控各国经济业绩

Carlo Cottarelli和Isabelle Mateos y Lago



8



15



38

其他内容

- 2 读者来信
- 3 简讯
- 4 经济学人物
*Prakash Loungani*对哈佛大学宏观经济学家Robert Barro的采访
- 18 图表释义
城市的演变
*Patrick Salyer*和*David E. Bloom*
- 46 返归基础
为什么是实际汇率?
Luis A.V.Catão
- 52 书评
道德规范与金融:
寻找当今经商的道德规范,
*Avinash D.Persaud*和*John Plender*
国际货币稳定的立法基础,
Rosa Maria Lastra
经济管理实务: 加勒比视角,
Courtney Blackman 爵士
东加勒比国家经济组织(OECS)论文集,
*S.B.Jones-Hendrickson*博士
- 55 国家聚焦: 墨西哥
- 56 直言不讳
Simon Johnson: 主权财富基金增长

城市难点

据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称,在未来一年之内,全世界将首次有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不是农村。大约75%的城市居民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该数字预计到2030年还会上升到80%。

这种城市化的演进对于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本期《金融与发展》由哈佛大学的David Bloom和Tarun Khanna撰写的封面文章告诉我们,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如果把握得好,城市化有望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而如果把握不好,城市化不仅将会压抑经济的增长,而且还会导致贫民的增加。据联合国的报道,在2007年,世界又创造了另一个记录:10亿多人口生活在贫民窟——即全世界每3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民窟中,而无疑他们主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贫困是否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普遍现象?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报告说,发展中国家中75%的穷人仍然生活在城市地区,尽管各地区的情况具有较大差异,但是居住在城市地区的穷人的比例正在上升,其速度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然而他说:“通过促进经济的全面增长,人口的城市化有助于减少总体上的贫困——但是,城市化的进程对农村穷人的影响超过了对城市穷人的影响。”

作为这种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我们见证了更大型的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的发展——尽管除去其规模外,这些地方仅居住着全世界人口的大约5%。在最大的20个城市中,人口最多的在亚洲,拉丁美洲位居第二。我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Ethisham Ahmad的文章中得知,超大型的城市在面对治理、融资和服务的提供时,也有其诸多的问题。

鉴于赋予了决策者如此重大的责任来很好地把握城市化的进程,我们不妨看一下来自亚洲和非洲地区的专家们的洞见,这些地区的城市人口增长最快。专家们一致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不同选区之间擅自移交权力的现象。国际人类栖息地组织的Matthew Maury指出,非洲无力为其飞速增加的低收入移民群体提供适当的空间、住所及服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Kishore Mahbubani认为,几乎没有几个亚洲城市实现了成为全球中心的梦想,这种中心能正确地摆平加强“硬件”(物质基础设施)与加强“软件”(导致出现伟大人才的文化振兴)之间的关系。印度Janaagraha公民权与民主中心的Ramesh Ramanathan和Swati Ramanathan呼吁更多的草根组织参与解决城市化的问题,以实现可持续的变革。

Laura Wallace
本刊主编

美术作品:封面, Tim Webb; 第48页, Steve Pica。
Stephanie Carter/Imagezoo。

摄影作品:第3页, Allan Greig/ZUMA Press 和 Pius Vtomi Erpei/AFP; 第4页, IMF图片; 第8页, Simon Willson/IMF; 第12—13页, epa/Corbis、Lester Lefkowitz/Corbis、George Esiri/Reuters、Ellen Creager/Detroit Free Press 和 Viviane Moos/Corbis; 第15页, Adrian Murrell/Getty Images; 第20页, Steve Jaffe/IMF; 第27页, Jon Hicks/Corbis; 第32页, Reuters/Corbis; 第38页, Zhang Heping/ChinaFotoPress; 第42页, Jürgen Effner/Newscom; 第52、53、54和56页, IMF图片。



援助阴暗的一面

所有人都知道,对非洲的援助常常不能得到较好地利用。但是我还是同意 Mark Sundberg 和 Alan Gelb 的观点(见本刊 2006 年 12 月号“让援助发挥作用”),即大多数援助从来就没有打算把用于发展的支出放在首位。



人们常常看到的是,援助的资金被私下挪用,而且,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的钱还被用在破坏性的事情上——包括不正当的战争。这些国家还能从什么地方找到钱来追崇花费昂贵的战争呢?

任何一个向非法政府或反叛集团提供援助的援助国,都旨在将援助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手段——例如分裂受援国或培植傀儡政府。但是援助者还会将其援助的得失算到发展援助的账上,尽管其初衷并不在于发展,并反过来责备受援国没有把援助资金用好。现在是直接设立援助记录的时候了。发展援助的失误不应再按一般意义来解释,而应逐国进行分解。

援助者本身也应为对援助失误的责备负起部分的责任。让我们从现在起就直言不讳,只有这样,我们所期望的结果才会最终出现。

Ikechukwu-Maria N.H.Okoye
销售顾问, 尼日利亚拉各斯

作者答复:

Okoye说出了我们完全赞同的重要一点:援助者应为对援助失误的责备以及将援助的较大份额用于非发展目的负起部分的责任。他认为,援助者不应继续向腐败政府提供援助。这种观点正在获得援助者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的确,对于多边机构来说,良好的治理是提供援助的单个最重要的标准,而且它也日益成为双边援助的重要标准。但是,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的国家虽然治理结构薄弱,但经济增长却很强劲,社会指标也有所改善(例如孟加拉国和哥伦比亚),而许多管理不善的国家(包括一些脆弱的国家)却仍然有大量社会的和人道主义的需求。援助必须得到更好的配置,也需要通过将援助直接发放给确实需要的人等形式,使其更有针对性。

别再错误地使用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方法

Tim Callen 关于 PPP 计算方法的论述(“PPP 与市场:哪个更有份量?”《金融与发展》2007 年 3 月号)做了一件大好事,它为 PPP 使用中的主要问题构建了一个框架。



然而,当使用 PPP 来对富裕的和贫困的经济体进行总体衡量时,他对运算问题性质的描述却极其轻描淡写,这种看法也反映在 IMF 的其他许多出版物中。

PPP 的确是对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的一个基本尺度,尤其当汇率方向偏离之时。它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避免由于市场汇率暂时脱离中期均衡价值的轨道而引起的扭曲。

但是,PPP 系统性地夸大了穷国的生产力和产出。这是因为在 PPP 的计算中,实际上是按照接近富国的价格对所有国家的产出重新计价的。因此(正如 Callen 所认可的)对于由穷国低技能的劳动力以极低的成本大量生产的非贸易货物和服务来说,价格被调整的幅度最大。但是,隐含地用富国的价格来为此类产品定价以及误导性地将富国的生产力赋予受雇的劳动力,会极大地夸大穷国的潜在生产力。

简而言之,PPP 夸大了穷国的经济“规模”。按目前这种盛行的方式来对其加以使用的做法不应鼓励。

Patrick Honohan
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教授

使人人都可获得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

《金融与发展》2006 年 9 月号的“简讯”强调非洲极其需要得到新资金来对抗艾滋病,因为该地区承载着全球 60% 的艾滋病疾病负担。我赞同社会疾病——例如性传播疾病——是极其难以根除的,然而,它们对公共健康造成的危害是能够降低的。以乌干达为例,该国最近几年获得了大量援助。尽管它的生育率依然相对较高——达 6.9%,年度人口增长率达到 3.4%,而艾滋病感染率则稳定在 6%—7%。

问题是,如果不将政策的制定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再多的援助也不能达到效果。控制艾滋病传播的关键应该是阻断新的感染病例。我们知道大量有关利用混合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进行短期治疗来预防 HIV 病毒从母体传染给婴儿的事例。我们也知道,如果血液循环中的 HIV 浓度(即所谓的病毒载荷)控制在每毫升血液中低于 1500—1700 个核糖核酸,异性恋者中 HIV 传播的风险就可以减少 98%——而这是可以通过使用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来实现的。

提倡将使用此类药物作为对抗艾滋病新感染事例的又一工具,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要使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治疗的覆盖率从目前乌干达的 15% 扩大到覆盖每一个诊断为艾滋病的人,就必须对政策加以改变。

Biryahwaho Benon 博士
乌干达病毒研究所 HRL/QA 负责人



热带作物也嫌热了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Jacques Diouf说,气候变化可能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的基础,而工业国则可能潜在地受益。他是最近在印度钦奈召开的一个大会上发表这番言论的。他说,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贫瘠的雨浇农业地带处于最危险的境地——事实上,印度雨浇谷物的产量可能会减少1.25亿吨,相当于其总产量的18%。

Diouf说,即便全球气温小幅上升,也可能使处于季节性干旱的纬度地区的作物产量减产,增加饥饿的风险。相反,全球平均温度上升3℃,可能会使处于更温



印度阿姆利则则在收割小麦。粮农组织称,气候变化会使该地区的谷物产量受到影响。

暖的纬度地区的作物产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他又讲,气候变化已经给森林和以森林为生的人们造成了影响,他们将面临爆发更多的野火和森林病虫害的危险。一个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包括草原、森林和海洋系统都需要进行调适,以适应气候变化。而且,在未来30年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比过去30年其在绿色革命中的发展更迅速,以便为农业生产扫清道路。

认识援助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最新的一份报告称,世界50个最贫困的国家必须掌握科学、技术和创新手段才能实现良好的经济增长,以减少贫困。《2007年欠发达国家报告》称,这些国家必须“创新它们的脱贫之路”。《报告》指出,最近的格局显示出一种脱离学习的经济自由化和没有创新的全球一体化局面。

以图指路

北亚和中亚国家计划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8个目标而起草一份地区性的路线图。这些目标包括在2015年前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今年夏天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比什凯克召开了一次官方会议。在由联合国发起的一个论坛上有一种说法,即中亚国家已经落后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应达到的基准点。中亚国家尽管在减贫和促进女童教育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遏止艾滋病和结核病的蔓延以及提供饮用水和改善农村卫生设施方面却落在后面了。

电子蒙古: 请点击这里

据最近由联合国发起、在乌兰巴托举行的一个内部治理研讨会称,信息技术已成为使内陆国家蒙古与全球经济相融合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蒙古国家信息与电信技术管理局主席Saikhanbileg Chimed说,“电子蒙古”战略的初衷,是利用了服务部门在经济中的份额日益增长和民众较高的识字率的优势。蒙古的移动电话市场从几年前对通信业改革之时的基础上,以每年超过100%的速度增长。



蒙古国哈尔和林的一个电脑中心。“电子蒙古”战略的初衷是利用服务业部门日益增长的优势。

2007年即将发生的事件

9月27—28日,美国芝加哥

第10届国际银行业大会年会:

全球化与系统性风险

10月20—22日,华盛顿特区

IMF与世界银行年会

11月11—15日,意大利罗马

第20届世界能源会展

11月19—23日,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地区间债务管理大会

12月4—20日,法国巴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大会

IMF 资讯窗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网站上为与低收入国家的债务相关的问题而创建了一个新的信箱,这些问题包括债务的可持续性和债务减让问题。建立该信箱的目的是为回应与政策和国别有关的问题而提供一个平台。有关人士曾敦促IMF设立一个“一站式联络手段”,以便他们从这里获得涉及此类与债务相关的问题的答案。现在,这些人士可以直接通过下面的网页向IMF询问有关问题了——有关债务可持续性: www.imf.org/dsa; 有关债务减让: www.imf.org/concessional。

榜首人物

Prakash Loungani对哈佛大学宏观经济学家Robert Barro的采访



大多数的学术文章都没能在学术界激起太大的反响，Robert Barro 笔下的大作却绝非如此。一份最新的榜单列举了自1970年以来在经济学领域最富影响力的146篇文章，Robert Barro 以6篇文章入选而高居榜首——和他共享这个荣誉的只有两位学者（Eugene Fama 和 Joseph Stiglitz）。但是，我们很难根据Barro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含有氟桥的聚钴化合物的水晶结构》——预言出他会在经济学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Barro身上发生了什么？他本来打算呆在加州理工大学找一份与物理学相关的差事，是什么使他改变了初衷？“这得怪Richard Feynman（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Barro说，“Feynman是一个充满伟大灵感的人，但他所教的东西常常让我无法理解，这使我认识到自己将来无法在物理学领域成为顶尖人物。”于是，Barro转而研究经济学。之所以转投经济学阵营，一方面，利用他的技术和数学背景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激励了他，另一方面，Barro主修经济学的哥哥也给他树立了榜样。

Barro的宏观经济学家生涯有两个值得铭记的转折点。第一个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他背弃了在哈佛读

本科时所学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并成为了芝加哥学派所领导的反凯恩斯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凯恩斯主张，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政策来消除国民收入的起伏波动，同时，凯恩斯也因其经济周期理论闻名于世。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学者和决策者们都在重新思考政府是否有能力修匀经济起伏。Barro六篇上榜论文中的四篇外加他所著述的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都有力地支持了“政府应该扮演更加低调的角色”这样一种学术观点。

Barro 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转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在那个时候，宏观经济学界自己作出了一次路线修正。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宏观经济学界都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探讨是什么引发了与经济周期相关联的国民收入短暂波动。在这几十年里，诸如“虽然在不同的年代里增长速度不同，但到底是什么在驱使国民收入增长？”、“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之间会存在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这样的问题都不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但是，再次受到芝加哥大学学者们作出的理论创新的驱策，宏观经济学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转而研究上述那几个早先被人们忽视的问题。而Barro走在了潮流的前头，他所著的两篇



论文“开创了对这几个问题答案进行经验主义探索的先河”。IMF 首席经济学家，也对经济增长理论作出了杰出贡献的 Simon Johnson 如此高度评价 Barro 的开创性成果。

一花引来万花开

Barro 所著的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一篇上榜论文所包含的思想其实十分的简单——这篇文章于 1991 年发表在经济学家季刊上。在论文中，他集合了 1960 年以来近一百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数据，并使用了许多理论家们认为会对国民收入增长产生影响的变量来对这些数据进行比较。这些变量包括，学校新生入学率（经济学家口中所说的“人力资源”的标志性指标）、私人投资、政府行为的种类及规模，以及适当的经济测算体系、政府行为引致的市场扭曲、政治动荡等等。

Barro 考察了这些变量与国民收入增长之间的统计学联系。他发现，“只要拥有了大量优质的人力资本，穷国就更能容易地赶上富国的发展脚步，否则不能。”他同时发现，政府投资对刺激经济增长收效甚微，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甚至会减缓经济增长。

此外，政治动荡和市场扭曲同样会导致低增长。

关于数据集与学者，存在着这样一个简单事实：你只要构建好一个数据集，其他学者们就会凑过来进行相关研究。这一点在 Barro 所建立的数据集身上同样应验了：它吸引了许多宏观经济学家投身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在一本由 Barro 于 1991 年所发表的论文衍生而来的著作中，他所归纳的那一长串对经济发展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冠以“Barro 变量”的名号而变得十分知名。Barro 论文中的一些结论也比别人的有关理论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Johnson 认为，Barro 所做的这些在给相关著作提供经验主义基础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却不能把它们推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去。

Barro 关于经济增长的著述如此具有影响力，以至于那些现在 30 多岁的年轻宏观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认同他 90 年代的著作，而不是早期那些关于经济周期理论的作品。

如果你行，请赶上我

Barro 的另一篇有关经济增长理论的上榜论文——这篇文章于 1992 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季刊》上，是

与 Xavier Sala-i-Martin 合著的——中所阐述的主要结论如此成功地接受了时间的考验，以至于 Barro 在哈佛的同事 Larry Summer 赞誉它为“趋同理论中的铁律。”与 Barro 1991 年那篇文章一样，这篇论文思想简朴，并引入了许多新的数据。这篇论文成功的诀窍是使用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数据，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把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Barro 变量”近似地假定为是完全相同的。比如经济制度和政治动荡的程度等等。

不必操心的是，这些变量的测量尺度为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定的问题上提供了一个明晰的路径：最初比较贫穷的地区能够追赶上富裕地区吗？就美国各州而言，答案是肯定的。美国内战导致了南方各州普遍比其他各州更加贫穷。但是 Barro 和 Sala 指出，在 1880 年以后的差不多 100 年时间里，那些起初比较贫穷的州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这就是追赶，或者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这就是“趋同”。当然，穷州追赶富州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仅仅为每年 2% 到 3%。

这种推测致使 Barro 于 1991 年在《华尔街日报》上提出警告：两德统一以后，东德的国民收入水平会迅速赶上西德这样一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趋同的力量最终会很强大”，他写到，“但是东西德之间任何一个方面要想在短期内趋同是不可想象的。”结果表明，在一阵短暂的冲刺之后，东德的生产力水平停滞在了相当于西德 75% 的水平，尽管政府为了加速这一进程而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更富有，或更贫穷

在一些学术性文章以及《华尔街日报》和《商业周刊》上的专栏中，Barro 继续探究着一些国家富有而另一些国家贫穷的原因。Barro 认为，事实表明，穷国可以通过保护产权，促进法制建设，培育自由的国内市场以及开放国际贸易等方式来增加收入。此外，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加大对教育、医疗以及某些类型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Barro 认为“软政策”则对经济增长起不到多少作用——如推进民主，制定专门针对妇女的教育计划，保护环境，消除收入上的不平等，创建市民组织及提升社会资本等等。但是，正如 Barro 在他 2002 的论文集《没有什么神圣的》中所写的那样，他的这些观点并不为所有人接受。他写道：“1998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我的同事阿玛蒂亚·森，一些评论员们认为这是对‘软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观点的一种认可。”

然而，尽管承认“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些软性措施体现了他们内心的需要，”Barro 仍坚持他自己的观点，并指出，他的观点根植于探究这些软性因素是否确实

能够增加收入的细致研究。事实上，近年来，Barro 和他的妻子兼同事哈佛教授Rachep McCleary已经完成了到目前为止最为详尽的研究，以确定宗教（或许这才是终极软性因素）是怎样影响收入增长的（见专栏）。

顺其自然

从Barro的有关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思路中不难看出，他相信，正如他在1996年的论文集*Getting It Right*中所阐述的那样：为加速经济增长，政府应该只去执行“有限范围内的职能”。他写道，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念书时曾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于出现的任何社会问题，我都毫不迟疑地认为解决方案中应包括政府的干预。”但是如今他却持有截然相反的见解；他将自己现在的哲学形容为“自由意志主义（或古典自由派）”，而不是保守派或共和主义。

从自由意志主义观点出发，Barro认为政府的核心职能在于“定义并保护产权”，政府的其他行为还可以包括“保证（而不是直接提供）教育的基础水平，提供最低福利保障，以及参与小范围基础设施的投资（如高速公路和机场）。”他认为，盲目扩张政府职能使之超出上述范围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害的。

“从自由意志主义观点出发，Barro认为政府的核心职能在于‘定义并保护产权’。”

Barro认为中国的经验证实了他的上述观点——他与一所中国高校的合作使他如今能频繁地出入中国。

宗教能促进经济增长吗？

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与职业道德类似，宗教可以通过对性格的塑造来影响经济表现。Barro和McCleary针对这一观点设计了一个严格的测试。和Barro早期的工作一样，此次研究最独特的方面在于对大量新近数据的精心汇编。这些来源于六项世界性调查的，有关正规宗教服务机构中的宗教信仰和参与人数的数据，就覆盖了大约50个国家。

Barro和McCleary发现，那些国民拥有更为强烈的宗教信仰（表现为确实相信天堂和地狱的存在）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会更快——这一发现与韦伯的理论是一致的。然而，一旦宗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被证明，更多的正规宗教服务机构的出现将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所以宗教服务机构的设置得有一个限度，它可以影响信仰，但不能以耗费时间和资源为代价，否则就会抑制经济增长。

他说，这个国家在共产主义道路上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当政府想要努力干预经济生活中的所有方面时，就会把事情搅得一团糟。不过现在，他补充道，他被在中国所遇到的许多政府官员和平民的那种“非常资本主义和商业化”的态度所震撼。“那里有所大学的校园里甚至树立着亚当·斯密的雕像，而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哈佛，一定会有许多人提出抗议的。”他开玩笑道。

Barro的自由意志主义信仰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和其他许多知名的宏观经济学家不同，他并没有成为美国或其他国家政府的出色的政治顾问。他说，一个认为政府的很多职能应当取消的人是难以受到政府欢迎的。在论文集《没有什么神圣的》中，他坦率地承认，他向政府提出的那些进行冒险式开创式尝试的建议很少能被采纳。在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章里，他描述了自己1998年夏天正在科德角度假时，被匆匆派往莫斯科的经历；俄罗斯政府没有采纳他关于建立货币局的建议。韩国政府同样也拒绝了他关于采用美元作为其流通货币以及改变对外资并购韩国国家银行事件采取抵制态度的建议。

并非“视金如粪”

即便没有20世纪90年代那些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论文，Barro作为一名卓越的宏观经济学家地位依然牢固。早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他的那些宣扬政府应当采取自由放任的手段来修匀国民收入波动的论文就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Barro的著作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的一部分，这一革命取代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当积极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控制来修匀经济周期）。由于得到了在统计学关系上表现得十分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支持，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大众对政府控制经济周期的能力空前信任。60年代的经验表明，政府可以简单地通过多印些钞票（提高通货膨胀率）来给人们提供工作机会（减少失业率）。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菲利普斯曲线似乎意味着货币政策确实卓有成效。

在保守派经济学者如Milton Friedman眼中，菲利普斯曲线毫无意义：它似乎在暗示，政府可以通过印刷钞票这样一种成本相当低廉的方法来达到诸如增加就业之类的实际目标。这就好比用一把厘米尺代替英寸尺来丈量以使人变得更高一样荒谬。Friedman在当时因为持有这种观点而受到奚落，但是Barro说，“甚至在我1968年夏天离开哈佛之前，就意识到那些针对Milton的攻击是无意义的，不过是一种妒嫉的表现罢了。”

由于受到Friedman以及同样来自芝加哥大学的

Robert Lucas 等人著作的激励, Barro 于 1977 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所提供的证据表明, 激进的货币政策只有在中央银行所制造的通货膨胀大到让人吃惊的程度时才可能降低美国的失业率。紧接着, 他又与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现在克莱姆森大学执教的 David Gordon 合作撰写了另外两篇这方面的论文。其中的第一篇论文指出, 当人们意识到中央银行即将制造惊人的通货膨胀时, 整个社会会在一种糟糕的平衡之下停滞不前: 通货膨胀过度, 而失业率却不会比以前下降多少。第二篇文章介绍了一条摆脱这种糟糕平衡的出路。如果中央银行能够致力于遵守规范其行为的规则, 通货膨胀率将会低于其未能遵守规则的情况。即使遵守了行为规范, 中央银行仍会有制造程度惊人的通货膨胀的冲动, 只是这种冲动会被随后发生的信用危机所缓和。

Barro 和 Gordon 的论文成为“改变中央银行行为方式运动”的一部分。现代中央银行更趋向于遵循那些能使其不制造过度通货膨胀的规则, 以捍卫它们作为反通货膨胀的斗士的信用。现在很多中央银行针对通货膨胀水平同时设置了一个公开的控制目标和一个内部控制目标, 它们根本不会允许恶性通货膨胀发生。

您肯定是在开玩笑, Barro 先生!

Barro 对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的攻击, 得到一大批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们的支持。而在此之前, Barro 对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攻击则是单枪匹马进行的。凯恩斯对于财政政策的观点也是十分激进的: 政府应当利用财政预算赤字来修匀私人收入的波动。当私有经济的发展停滞时, 政府应当通过运行更大规模的预算赤字来刺激私人消费, 并且应当用举债而不是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填补赤字。

在 1974 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的一篇论文中, Barro 指出, 是选择用借债还是增加税收的方式来筹措资金都是无关紧要、没有区别的。如果政府用借债的方式来维持财政赤字, 人们也许会意识到, 政府终究有一天会通过增加赋税来偿还这些负债。于是, 他们会减少消费、增加存款以备支付将来的税收。因此, 政府试图通过借债来刺激私人消费的努力是不会有好成效的。如果把这些未来的税务负担都遗留给下一代, 情况又会如何呢? 今天的人们会不会因为政府的举债而并不会感到自己变得更加富有了呢? Barro 在论文中说, 如果这一代人关心的并不只是他们自己的支出, 而是包括他们的下一代的支出的话, 情况就并非如此。如果他们关心自己的孩子, 他们就会攒下更多的钱留给孩子, 以供孩子们支付未来的税收负担。于是, 政府

试图利用预算赤字来刺激当代人消费的努力再一次失败了。

Barro 的观点引起了一片怀疑。1990 年刊发于《经济科学人》上的“学派简介”指出: Barro 提出的诸如“要无穷无尽地向前看”、“父母都是没有私心的”之类的看法都是疯狂的、不理性的。在一开始, 就算是经济学家也不免会对这些看法抱以嘲笑。然而随着时间流逝, Barro 的模型慢慢变得权威起来, 故而, 即便是当初批评他的那些人也不得不利用他的模型来作为自己的模型的基点。《经济科学人》总结到, 受到 Barro 理论的影响, “很少有人还像以前那样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抱以很高的期望了。”

会有更多的上榜论文?

曾与 Barro 共事的波士顿大学教授 Robert King 称 Barro 为“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影响力的应用宏观经济学家”。King 同时还告诉《金融与发展》, 这种影响力并非源自某一项单独的贡献, 而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在宏观经济学的每一个主干领域里, 你都不得不与 Barro 所写的论文相竞争。”

近年来, Barro 一直致力于解决一个长期困扰宏观经济学界和金融界的难题, 即所谓的“股权溢价之谜”。这个难题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历史上, 股票的收益率远远超过了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当然, 股票所具有的更高的风险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会有更高的收益率。但是, 这种收益的差别如此之大, 以至于经济学家们认为, 那些放弃股票高收益率而购买政府债券的投资者对于风险的厌恶程度大得不合情理。Barro 认为, 像经济大萧条和 9·11 事件这样罕见的大灾难, 尽管发生的几率极低, 却会使投资者们保持对政府债券这类可靠资产的需求。

且不管这项研究是否会像他的其他论文一样进入最有影响力论文行列, 毋庸置疑的是, Barro 一直在努力。在 1999 年出版的论文集《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中的一篇短文里, 他写道, “当处于巅峰时, 我从来不曾真正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能吸引我离开这个顶峰。”他不理解为何纽约扬基队的击球手 Joe DiMaggio 会在 1951 年尚处事业巅峰之时退役; 为什么披头士乐队、Simon 和 Garfunkel 组合会在他们最辉煌的时候解散。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 公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错过了许多即使算不上最伟大也必定十分优秀的演出。值得 Barro 的崇拜者高兴的是, Barro 曾经含蓄地做出承诺, 他不会提早退休, 他会在这个领域里继续努力, 继续前进!

Prakash Loungani, IMF 对外关系部副处长。



城市 变革

如果世界能够关注并且合理规划，
快速的城市化将呈现出繁荣景象。

David E. Bloom 和 Tarun Khanna

2008年将成为错综复杂的和正在进行的城市变革的分水岭。历史上首次有超过15%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当中（详见表1）。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如果城市化进程能够一直保持现有的速度，到2030年，城市人口在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60%。

很多人将城市人口达到人口总数的50% 视为一种进步的表现。他们认为，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是社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一种自然的结果，并且指出城市生活的种种好处，涵盖了从人均收入的提高到健康状况的改善等诸多方面。其他一些人则不太乐观。持批评观点的人们认为，城市化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政府政策与投资对城市的偏好所造成的结果，这种偏好迫使人们不得不从乡村移民到城市来寻求工作机会。有关城市化弊端的相关证据支持了这样一种负面的评价，这些证据包括诸如犯罪的高企和平民窟的增加等等。考虑到当前和可以预计的将来全球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对以上相互对立的观点有所认识，并且加以解决，对于制定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计划和政策是非常关键的。

城市化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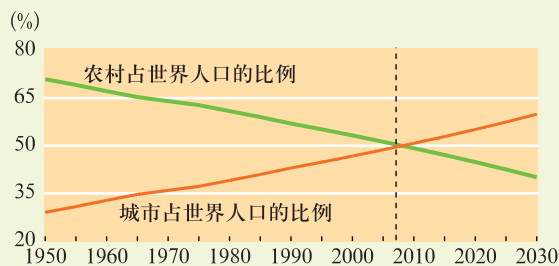
如果最近几十年以来的发展趋势能够得以持续，绝大多数的城市增长都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详见第18页的《城市的演变》），在发达地区，城市居住人口数量在未来25年中将仅仅有少许的增长，欠发达国家则将经历一场特别剧烈的人口数量的增长（见图2）。

但是对这些难以用图表精确表述的数据进行分析时，必须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政府是基于不同的标准来对所谓的“城市”进行的——诸如行政区划、人口密度或经济结构，有时候根本不能将乡村和城市区分开来。虽然联合国的相关定义较为有用，但是它们也主要只是这些不同划分标准的集合。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对城市化进程及其影响有诸多的了解。首先，我们知道城市化可以通过三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最为显而易见的人口增长是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移民所造成的，正如中国最近发生的城市化那样，主要受这种移民潮的驱动。其次，“自然增长”，即现有城市人口的增长，也会带来城市人口的增加，据联合国估计，60%的城市增长是由这种方式带来的。再

图1
打破均衡

明年城市人口将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乡村人口。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处，《世界人口展望：2006年修订版》（2007）。

次，随着人口的增长，有些乡村地区被划为城市，由此产生了城市化现象。

我们同样知道，城市化进程并不是均衡发展的。有些城市比其他城市更吸引移民。尽管84%的世界城市人口居住在小城市或者中等城市，余下的居住在大城市或者“特大城市”（居住人口超过1000万）。虽然特大城市的数量在过去的30年内显著增长，但是世界上只有不超过5%的人口居住在这些地方（见表3）。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未来十年内一种所谓“超大城市”的增长，这种城市是拥有超过2000万人口的集聚体。东京城区已经拥有超过3500万的居民，到2015年，巴拿马、圣保罗、墨西哥等城市可能也会加入到这类超大城市的行列。

城市化所产生的问题在特大城市当中，特别是在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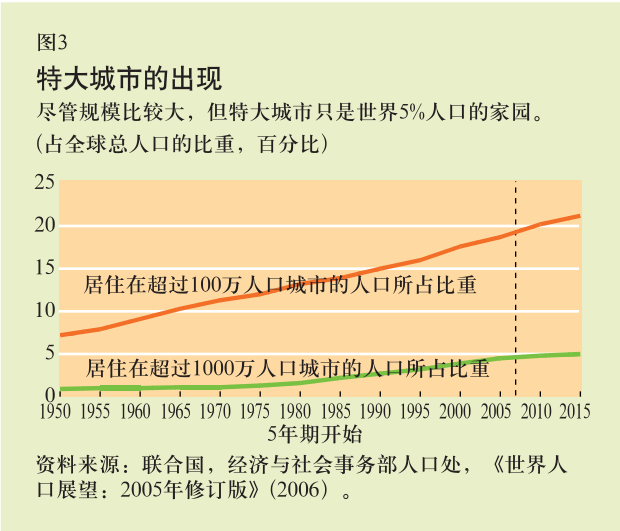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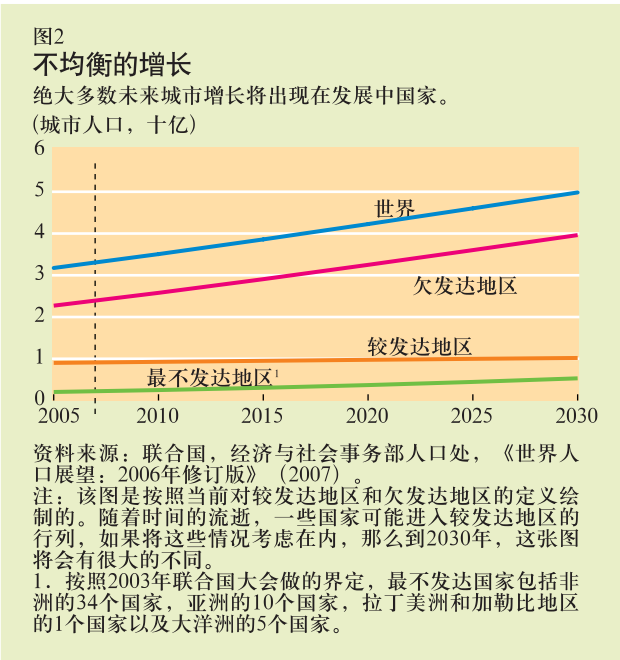
市化进程非常迅速的情况下，将会被放大。提供就业机会、住房、卫生设施、交通工具、教育以及医疗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一项很复杂任务，而对于那些正在经历着特大城市数量剧增的发展中国家则显得更为困难。

最后，还有些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对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对向城市方向流动的移民产生了推动作用。对于移民个体来说，这些因素包括：寻找工作（或者更高的报酬），在健康、教育等方面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以及在娱乐和生活方式方面更多的选择。这些移民可能是受到媒体对城市生活的描写或是受到早先移民到城市中心的亲戚所获得的成功的影响。城市化还与国家层面的变化有关，例如政府和外国投资向城市中心的集中，以及人口出生率的降低等社会因素。

什么激励了城市乐观主义者

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带来了几点收益。首先，他们认为，城市化会给个人带来很多益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收入的变化，城市的收入要比乡村的收入高很多。例如，在中国，城市的平均家庭收入几乎比农村的家庭收入高出三倍多。

其他一些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的因素，在城镇可能要比在乡村得到更为普遍的实施。例如，在提供公共交通、通讯设施、水资源供应、公共卫生和垃圾处理等服务所获得的规模经济，使得政府相关项目能够在城市得到更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聚集体

大多数在亚洲，拉丁美洲虽居第二，但远远落后于亚洲

分类：				
✓大城市（1000万—2000万）				
✓✓超大城市（2000万以上）				
城市，2005	人口 (2005, 百万)	1975	2005	2015
东京，日本	35.2	✓✓	✓✓	✓✓
墨西哥城，墨西哥	19.4	✓	✓	✓✓
纽约，美国	18.7	✓	✓	✓
圣保罗，巴西	18.3		✓	✓✓
孟买，印度	18.2		✓	✓✓
德里，印度	15.0		✓	✓
上海，中国	14.5		✓	✓
加尔各答，印度	14.3		✓	✓
雅加达，印度尼西亚	13.2		✓	✓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	12.6		✓	✓
达卡，孟加拉国	12.4		✓	✓
洛杉矶，美国	12.3		✓	✓
卡拉奇，巴基斯坦	11.6		✓	✓
里约热内卢，巴西	11.5		✓	✓
大阪，日本	11.3		✓	✓
开罗，埃及	11.1		✓	✓
拉多斯，尼日利亚	10.9		✓	✓
北京，中国	10.7		✓	✓
马尼拉，菲律宾	10.7		✓	✓
莫斯科，俄罗斯	10.7		✓	✓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处，《世界人口展望：2005年修订版》（2006）。

为有效的实施。

由于提供更多能够在中学和大学教书的受过教育的人，因此城市的教育系统可能更为发达。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入学率要比乡村的高很多，甚至在城市的贫民窟，其入学率也都要超过乡村地区。同样，在城市人口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要比乡村平均高出35%。更多的城市卫生保健工作者和更为专业化的医疗活动——这些可以给健康保健上的投资带来更多的回报——使得城市居民的身体状况通常好于他们在乡村中的亲人。

在很多城市中，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都相对较低，因为当父母都外出工作时，照顾孩子的代价相对较高，城市生活费用更为昂贵，在城市家庭劳动中儿童的价值更低，以及在城市中计划生育和生育健康服务更容易获得。孩子较少的家庭能够更好地集中资源，使每一个孩子得到更好的抚养，为孩子的今后生活提供更为坚实的经济保障。

第二，乐观主义者认为，城市化在国家层面上带来的积极效果。在从低产出的农业向高产出的工业和服务业发生转变的过程中，城市化是其自然产生的结果之一。城市吸引了很多的商业，带来很多就业机会，工业和服务业的集中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也有一些其他的途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随着劳动就业种类的增加（因为更高的人口密度和工业化带来的不同类型的工作机会），特定领域的行业间专业化分工变得更为可行。城市中的企业能够从同行和供应商那里学习到更多的东西，能够与他们的市场贴得更近，这样就能够更加快捷的应对需求的变化。相对廉价的交通运输能够使客户和供应商更为接近，使得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时，在城市中聚集了很多受过教育和有创造力的人们，从而可以孵化出很多加速经济增长的新的创意和技能。而且，城市生活能够降低出生率，从而可以使人们享受涵盖整个社会的所谓“人口红利”——因为出生率降低以前出生的那一代人在其首次生育年份承担了更少的赡养子女的负担，从而可以更多地从事有报酬的工作，并且能够有更多的节余。

第三，乐观主义者主张，城市化能够带动乡村的发展。那些移民到城市的人们经常给他们在乡村的亲人们汇款。他们的移民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的规模，从而使得农村劳动报酬得到提高。有关证据显示，城市化对降低贫困程度的作用在乡村要比在城市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乡村贫困人口移民到城市地区以后，增加了城市地区的贫困人口比例。（详见15页“都市的贫困”）。

然而，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否能够带来人均GDP的增长，关于这一点还不能确定。如图4所示，当把1960年和2004年国家层面的有关人均实际GDP增长

与城市人口比例的数据进行联系比较时，我们会发现，在国家层面上，收入和城市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如图4所示（上半部分）。但是这种随时间螺旋式上升的相关关系显示，与每一级城市化水平相对应的收入水平，在2004年都要比在1960年更高。而且，在发展水平较低时，曲线的斜率变化也较为缓慢，这一事实与在发展水平较低时，城市化和收入之间的联系较弱的观点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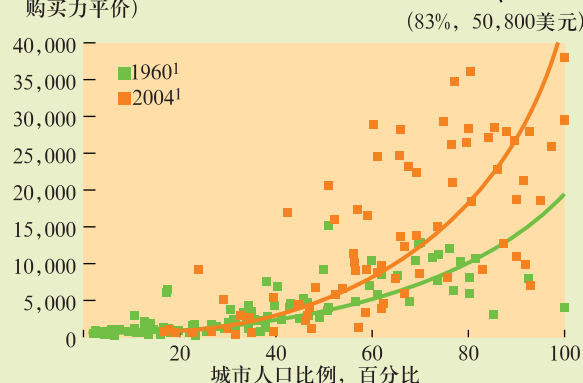
而且，如果城市化对人均收入有着重要影响的话，那么在那些城市化进程更快的国家或地区，伴随而来的应该是更为急剧收入增长。然而与过去45年来非洲城市化进程相伴的只是经济的缓慢增长，在亚洲，在同样的城市化水平情况下，经济却有了较快的增长（见图4，下半部分）。这种比较并不排除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所存在的相互联系——例如，如果没有城市化，非洲的经济增长会更慢——但是，这的确表明了除了城市化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利用1960年到2000年国家间面板数据进行多元分析的更为深入

图4

是否变得更为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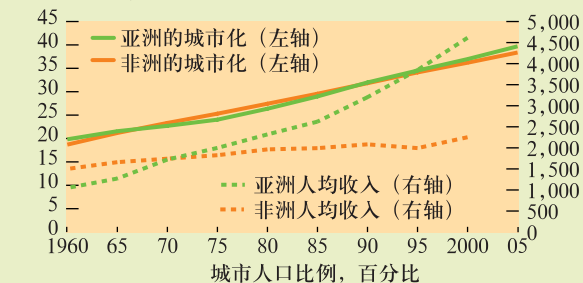
城市化能够带来相应的收入增长…

（人均实际GDP，2000年不变美元，
购买力平价）



…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微弱的。

（人均实际GDP，2004年不变美元，
购买力平价）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7）；Penn世界表格6.2。

1. 样本规模：1960年N=97；2004年N=79。



孟买一列拥挤的火车。



纽约时代广场灯火通明。



的研究,对城市化是经济增长主要决定性因素提出了进一步的质疑。

而相反的,最近一项世界银行研究结果提供的证据(Ravallion、Chen 和 Sangraula, 2007),与城市化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进而带来贫困的减少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一分析从新的、恰当的角度考虑到了城乡之间生活成本的差异,并且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证据表明,城市化能够促进城市和乡村中绝对贫困率的降低。但是,作者并没有直接分析收入的增长,因此,这种因果关系仍然是未经证明的。

城市化是如何阻碍发展的?

那些认为城市化在发展中国家是有害的观点,通常会矛头指向城市化对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由于交通拥挤、过度工业化和垃圾处理系统的缺乏等造成的影响,因此环境污染在城市通常比在乡村表现得更为严重,而且常常会超出当地吸纳废弃物的能力——从而对人们的健康状况造成了损害。城市对土地、水和自然资源的需求过高,这种需求与其区域面积,以及由于高收入和高消费所带来的人口规模不成比例。

虽然城市化能够带来收入的增长,但是随着全球城市贫困人口增长率超过全球城市人口增长率,因而城市化也跟城市贫困增加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不均衡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有品质保障的城市住房相当昂贵,城市中的穷人们都居住在贫民窟,在那里水资源和卫生设施都很缺乏,生活条件拥挤而且常常不利于健康。据联合国估计,到2007年,生活在贫民窟的人数将会超过10亿,到2020年则会达到13.9亿,尽管在地区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见图5)。在亚洲,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人数是最多的——南亚的问题最为严重,在那里近一半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之中。但是从百分比来看,萨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保持

着领先地位:该地区大约有72%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贫民窟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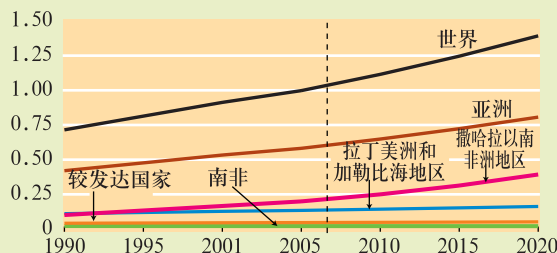
在许多这样的贫民窟当中,随地大小便经常发生,对健康和伦理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城市贫民窟当中,营养不良的比例要比城市非贫民窟地区高出很多。例如,联合国居住状况报告显示,在贫民窟中,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达到47%,而在城市其他地方,该比例仅为27%。与城市非贫民窟地区相比,城市贫民窟的儿童死亡率相对较高,而小学入学率则相对较低,而且贫民窟居民更容易遭受环境灾难和污染的伤害。

这些不平等通常会带来其他一些,有时是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犯罪和激烈的冲突等。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数量的增长。联合国人口基金预计,到2030年,在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中,60%的人口年龄在18岁以下。年轻人口的比例在贫民窟中特别高,而那里的工作机会却非常有限。年轻和贫困相结合就会带来较高的犯罪率。有些人口统计学家预测,大城市人口密度的增长会导致可以影响

图5

贫民窟的增长

在7个人当中,现在有一个人以上居住在城市贫民窟。
(贫民窟人口,十亿)



数据来源:联合国居住状况报告,全球城市观察数据库(2005)。
注:1995年的数据是由1990年和2001年数据估计得来,2005年的数据是估计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被包含在较发达地区之列。



拉多斯商业街旁的行人和交通。



开罗在市场中购物的妇女。



通过墨西哥城的高速路。

城市地区和整个国家的巨大冲突。

城市化的未来

尽管城市化能够带来很多被人们公认的好处，仍然有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城市化，特别是当它的速度很快时，可能对发展造成障碍并且使环境问题变得更为恶化。不管城市化在经济发展中是否发挥主要的作用，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能够被很好地进行管理，在促进更为良好的健康和状况过程中，城市化是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因素的。城市化是一种福利还是一种毒药，将取决于不同群体之间适当的权利分配，这些群体包括国家和地区政府、公众社会和私人财产的合法拥有者（见第20页“大，还是太大？”）。然而，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大（见24页“在管理大城市方面什么是最大的挑战”）。

联合国对发展中国家所做的最新调查显示，只有14%的政府决策者对本国人口的城乡混合表示满意。而在那些不满意的决策者中，大多对本国正在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表示无可奈何。在对调查进行回应的政府当中，大约有73%的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来减缓城市化的速度，而只有3%的政府已经制定政策来加速这一进程。

在以减缓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当中，大多是试图通过乡村就业计划和拒绝对刚刚来到城市的移民提供服务等措施，来限制或者是扭转人口从乡村到城市流动的趋势。然而，这种移民快速增长的现实表明，其中存在着巨大的需求。至少在短期内，相关政策是不会使这种需求减少的。通过制止人口流动来剥夺移民应有的创造更好生活的机会，将会使他们更加贫困而且更加怨恨，并且也将侵害他们的权利。这些政策也将使农村地区来自城市的汇款中受益的可能性降低。而且这些政策也将是徒劳的。无论有多少障碍，移民都会千方百计地寻找途径来到城市，并且在城市中生存下去。

既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增长大多来自城市现有人口的增加，而不是来自于城乡人口的流动，最好的措施是实施一些能够为妇女们争取权益的计划，例如在城市实施的生育健康计划等。更好的教育，有性别倾向的劳动法律，以及能够增加妇女就业机会的政策等，这些政策措施对于降低出生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些妇女有很强工作愿望的家庭更希望保持较小的人口规模。计划生育和生育健康服务将会使得妇女们更容易达成这个目标。当然，这些政策不会仅仅带来出生率下降的好处，而且可以解决妇女贫困问题，并且可以提供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状况，从而改善城市生活条件。

对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进行规划，并且加以适应（尽管现在这些方面还做得很不够），而不是试图对其进行限制，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进行城市规划并不是一种奢侈浪费，而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要解决健康和环境问题，尽量利用城市所带来的经济机会，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是非常必要的。这也许要有很大的花费。据亚洲发展银行估计，仅仅在亚洲，为赶上城市化进程的步伐，需要花费数以万亿美元来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

城市规划在很多情况下也需要更多的技术革新和制度变革。以交通问题为例，有些城市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创新体系。在伦敦和新加坡，交通拥挤地区开车需要交纳额外的费用，这项措施有助于减少交通拥挤和污染情况。印度城市德里通过使用自动人力车以及在公交车上使用天然气从而将空气污染程度降低一半。曼谷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巴西的库里提巴正在推行一项措施，在一些繁华的地段上设计线路来使用超大型的公交车，这项措施已经被基多和波哥大所效仿。这种做法只花费较少的费用，就创造出一种类似轨道交通的运输系统，从而使得库里提巴的交通，在人口还在持续的增长情况下，变得顺畅起来。

还有个例子是关于建造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在中国，建设者正在上海附近建造一座所谓环境友好型市区

——他们声称该市区几乎不会产生碳化物的排放。尽管建设完成以后,这座名为东滩的市区对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城市化和环境问题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它将成为建造绿色城市的一种新模式。即使在私人建筑的层面上,也应采用一些新的设计来抵消城市扩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东京为例,名为 Roppongi Hills 的房地产项目将居住、商务和文化功能融合在同一空间,表明私人公司可以在城市空间规划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规划者也应该致力于为城市土地交易提供完善的市场条件。在发展中国家,许多正经历快速城市化的都市都缺少一种完备的正式的产权制度,或者虽然有这样的制度,然而该制度却正在受到官僚主义的困扰。相应的,穷人通常只是寄居没有正式授权的土地上。缺乏合法的所有权,使得穷人不能将他们的房产抵押以融通资金,来开展商业活动,进行较为宽松的消费,或应付紧急的支出。著名的秘鲁籍发展经济学家 Hernando De Soto 指出,通过授权获得土地的正式所有权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为了鼓励对土地的授权,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放宽土地使用制度的某些条件,正如亚洲发展银行所建议的那样。或者政府可以通过对低收入家庭的信贷或补贴,使每一个低收入家庭都有机会获得自己经济能力可以承受得起的土地。授权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它的日益盛行将刺激相关信息的传播,这对运作良好的城市土地市场的建立是十分必要的。

建立一个城市规划团队

我们应该依赖什么样的人进行必要的城市规划?联合国居住状况报告认为,权力的分散是非常必要的。中央政府通常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所在的首都,而忽视那些小城市的城市化进程。Vernon Henderson (2002)指出,在城市化的初期,某一城市地区的集聚对于产业来说有助于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因为这样可以促进适当的制度、基础设施和熟练劳动力的产生。但是,到了城市化后期,城市间的交通和通信方面的投资,地方政府提高税收的分散授权,以及以增加其他城市就业机会为目的的相关措施,可以将主要城市所承受的城市化的压力分散到其他城市,并且使得城市化的进程变得更加容易控制。当然,这需要在地方层面上加强能力建设,同时也需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权衡。

有些国家已经发展出一些地方监管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英国有地区性的开发机构,能够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资金,并且可以无偿地投资在一些他们认为可以促进本地区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项目上。还有些国家,例如中国,之所以建立经济特区,部分原因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分散都市人口。这些特区拥

有较其他地区更为自由的法规和税收环境,从而帮助它们吸引投资,进而有助于为城市移民提供就业机会。

对城市化进程做出决策或者至少可以给这些决策提供建议的权利,同样必须下放到地区政府以下的层面。如果要想使基础设施和其他一些改善措施的实施变得更为有效,必须鼓励一些下层的社会团体,包括贫民窟,积极地参与。毕竟,市政当局和地区政府要比中央政府更加了解城市人口的需求。当地企业同样拥有非常有用的本地知识,并且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一些地区,由于其政府运作能力较弱,因此在对控制资源的较大团体进行分散授权成为现实之前,制度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同时也必须作为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

政府试图阻止城市化进程所做的徒劳尝试或许是一种非常好的证明,发展中国家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是不可避免的。对城市人口增长所做的失败的规划,将会给城市带来包括环境恶化、健康状况低下和过度拥挤等诸多负面影响。相反地,积极的规划可以使城市从那些由雄心勃勃的年轻劳动者组成的新生人群中获益,并且对那些已经在城市居住的人群、移民和农村群体产生正面的影响。不同利益群体的参与对于可持续的城市规划是十分必要的,中央政府也应该及时向这些群体公开决策过程,或者在这些群体没有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也至少要向他们征求意见。

David E. Bloom,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Clarence James Gamble 教授; Tarun Khanna, 哈佛大学商学院 Jorge Paulo Lemann 教授。

参考文献:

Becker, Charles M., 2007, "Urbanization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forthcoming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 by Amitava Dutt and Jaime Ros (Cheltenham, United Kingdom, and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Henderson, Vernon, 2002, "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17, No. 1, pp. 89-112.

Montgomery, Mark R., Richard Stren, Barney Cohen, and Holly E. Reed, eds., 2003, Cities Transformed: Demographic Change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O'Meara, Molly, 1999, Reinventing Cities for People and the Planet (Washington: Worldwatch Institute).

Ravallion, Martin, Shaohua Chen, and Prem Sangraula, 2007, "New Evidence on the Globalization of Poverty,"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Washington: World Bank).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07, Stat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2007: Unleashing the Potential of Urban Growth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 UN-HABITAT, 2007,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06/7 (Nairobi).

For references to additional papers cited herein and a short bibliography, see this article on the Internet at www.imf.org/fandd.

城市贫困

穷人正在向城镇移居吗？是的，但速度可能还不够快。

孟买的一处城市贫民窟。

Martin Ravallion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一些观察家将其视为引起新的贫困问题的不受欢迎的先兆，如在拥挤的城市里不断出现的城市贫民窟。然而，随着经济逐渐由农业转向能够获得更高收益的活动，如其他部门收入更高的工作，其他学者却将城市化视为减少贫困的推动力。

上述事实说明了什么？是否世界大量的贫困问题这个历史上成为农村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已转移至城市地区？从消除贫困的角度看，城市化是好还是不好呢？

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的数据在过去20多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遍布世界的各国统计机构，这些机构经常得到援助界和国际开发机构的支持。目前，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们可以找到设计巧妙并已得到很好实施的家庭调查。尽管仍有许多数据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修正，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关于世界贫困问题的知识有了进一步增长。

在世界银行，我们通过家庭调查和其他来源建立了一个数据集，旨在搞清贫困在多大程度上已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城市现象，以及总体而言城市化在减少贫困过程中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调查采用了90个国家的超过200户家庭的调查结果，代表发展中国家90%以上的人口（Ravallion、Chen 和 Sangraula，

2007）。

我们的调查表明，尽管存在一些显著的地区差异，发展中国家75%的穷人仍旧生活在农村地区。但生活在城市地区的穷人比例正在逐渐增加，而且快于世界总人口的增长。我们认为，通过促进经济全面增长，人口城市化将有助于减少整体贫困。然而，城市化进程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要比对城市贫困的影响大。

城市和农村贫困的度量

为什么新的数据集如此重要？因为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统计（见专栏）首次被分解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并考虑到城市穷人所面临的更高的生活成本。最可能获得的关于穷人生活成本差异的数据，似乎是世界银行的国别贫困评估，世界银行已对100多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评估。这些报告也是世界银行国家层面的分析工作的核心要素，描绘出每个国家的贫困程度和贫困原因。

新的数据集使用了国际上“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并将其用于基于调查得出的农村和城市地区贫困线（可见于世界银行的贫困评估中）差异的国别评估，该评估主要反映一国的消费和收入分布情况。例如，以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每人每天1.08美元相当于1.53元人民币，等于按1999年价格计算的2.42元。

这是适用于 1999 年中国家庭调查数据的农村贫困线。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贫困评估所采用的贫困线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地区存在着 1.37 元的差异，因此 1999 年城市贫困线为每人每天 3.32 元人民币。

通过对主要数据各方面的评估，我们已获得比其他大部分分散收集的数据更大的内部一致性。但是，当然一些相似的问题尚未得以解决。例如，不同国家对“农村”和“城市”有不同的定义。用于创立农村和城市贫困线的方法同样因国家而异。而且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生活成本可能因收入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世界银行有关中等收入国家的贫困评估的不同的报告中采用“每天 1 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该贫困线主要基于低收入国家普遍的贫困现象而得出。

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

这些数据给出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变化的新实证，并使我们得出 4 个主要发现：

农村地区绝对贫困的发生率较高。平均而言，城市地区的贫困线比农村地区高 30%。在较贫穷国家，城市贫困线与农村贫困线的比率要高于中等收入国家。随着国家平均收入层次的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和内部市场一体化通常会有所改善。然而，即使考虑城市地区穷人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农村地区 2002 年按“每人每天 1 美元”贫困线衡量的贫困率（约 30%）仍然是城市地区贫困率的两倍（见表）。同样，2002 年 70% 的农村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 2 美元，而城市地区生活费不足 2 美元的人口占城市地区人口的比例却不到上述数字的一半。约 75% 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仍生活在农村地区。

跟踪记录贫困动向

世界银行在度量贫困时，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制定了两个国际贫困线标准，即以 1993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生活费 1 美元和每天生活费 2 美元，或更准确地说，每人每月 32.74 美元和每人每月 65.48 美元。每天 1 美元的贫困线是一种相对保守的贫困定义，主要用于低收入国家。较为富裕的国家自然倾向于采用更高的贫困线标准。如果以最贫困国家中等贫困水平为标准来计算贫困人口，人们不会有理由认为世界上的贫困人口比较少。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更多采用每天 2 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但较好的做法是同时采用这两种标准，或者事实上，在任何国家都采用更大范围的贫困线标准。

这样计算的目的是保持不同国家间的一致性：确定国际贫困线的初衷是使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能用同样的真实价值来衡量其贫困程度。国际贫困线通过采用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来将 1993 年的消费转换成本国货币计价，并采用每一国家最可能获得的消费价格指数随时间的推移而加以更新。以本国货币计算的贫困线，被应用于该国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家庭的人均消费或收入的调查数据，以确定在每个国家有多少人低于每天 1 美元和每天 2 美元的贫困线。

贫困情况的变化

尽管城市地区穷人的生活成本较高，但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明显高于城市地区。

		穷人数量 (百万)			发展中国家低于 各贫困线的人口 所占百分比			城市贫困人口 占全部贫困 人口的比重 (百分比)
		城市	农村	全部	城市	农村	全部	
每天 1 美元	1993	236	1036	1272	13.5	36.6	27.8	18.5
	2002	283	883	1165	12.8	29.3	22.3	24.2
每天 2 美元	1993	683	2215	2898	39.1	78.2	63.3	23.6
	2002	746	2097	2843	33.7	69.7	54.4	26.2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 和 Sangraula（2007）。

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地区穷人的比例正在增加。1993—2002 年，在每天生活费不足 1 美元的贫民中，城市地区人口所占比例由 19% 上升至 24%，在此期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38% 上升至 42%。然而，出现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穷人生活在城市地区的情景，也许还要经历几十年时间。

穷人城市化的速度要比总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快。这反映出城市地区的减贫速度低于平均值。1993—2002 年期间，城市地区有超过 5000 万的人口加入到每天生活费不足 1 美元的贫困人群中。然而，由于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总数减少 1.5 亿，总贫困人口还是减少了 1 亿。

地区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穷人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是拉丁美洲地区，在该地区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见图 1）。相反，东亚地区生活在城市地区的贫困人口不到 10%，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贫困人口城市化的总格局仍存在地区例外的情况；事实上，在中国、东欧和中亚地区，也出现了贫困人口农村化的迹象。

新的证据表明，2000 年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 1 美元的人数新增 1.3 亿。我们同时发现，与过去所做工作相比，目前整体减贫的步伐有所放缓。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城市地区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城市地区减贫速度放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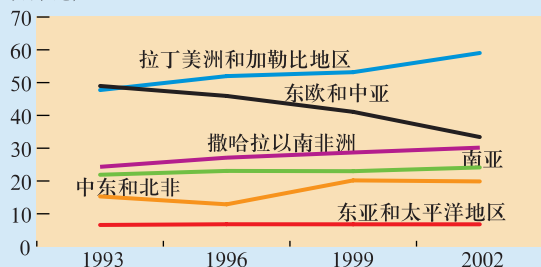
一般而言，城市化对于整体减贫是一种积极因素。不可否认，在贫困和迅速城市化的国家出现了新的城市问题。然而，各个国家的经验通常验证了这样的观点，即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所占比重增加对于整体减贫发挥了积极作用，惟一例外的地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众多国家的情况和数据表明，城市人

图1

较大的地区差异

几乎60%的拉美地区穷人居住在城市地区，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

(在城市地区生活的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穷人所占比重，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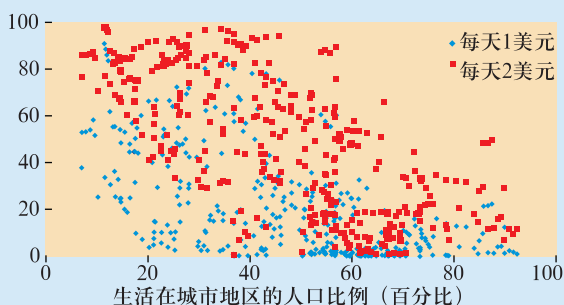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和Sangraula (2007)。

图2

一种好的作用

更快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贫困率趋于降低

(贫困人口数量指数，百分比)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和Sangraula (2007)。

注：人口数量指数为生活在消费或收入低于规定贫困线的家庭的人口比例。

口所占的比重越大，整体（包括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贫困率越低（见图2）。而且，城市人口所占比例的更快增长通常与整体迅速减贫相联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大体上讲，城市人口增加有助于减少贫困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首先，城市化会导致平均收入增加，即使相对于平均水平而言收入分配没有变化，城市化也有助于减少贫困。第二，即使经济只有很少或没有增长，城市化也会带来分配的改善。有证据表明，第一个因素比第二个因素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换句话说，人口城市化和减贫主要是通过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许多经济力量显然构成了城市化和减贫之间的联系的基础。一方面，城市经济增长为那些迁移到农村以外地区居住的人口提供了新的机会，一些人正是通过这一过程而得以摆脱贫困。另一方面，城市化对那些仍旧生活在农村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产生重要的间接

影响。那些迁移到城市地区居住的人们通常会向农村汇款，尤为重要，留在农村地区竞争既有工作岗位的人更少，从而对减少贫困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这样也会带来消极因素，例如人口从农村地区大量外流，会导致农村社会的物质和人文基础设施的长期恶化。

通过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积极的间接效应似乎比通常所认为的更重要。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与减少城市地区贫困人口相比，城市化更有助于减少处于“每人每天1美元”贫困线的农村贫困人口。在具有较高城市化水平的国家，农村贫困水平降低得更快。城市化对于城市人口似乎有组合效应，新迁移到城市的居民比老的城市居民更穷。毫无疑问，这减缓了城市减贫的步伐，即使对农村地区 and 全部人口而言，贫困人口已有所减少。

对政策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鉴于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贫困人口仍旧生活在农村，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世界银行，2007）。但同时这些学者的研究指出，城市政策对于农村减贫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化进程带给穷人（包括农村穷人）的好处，部分取决于城市政府的行动，如提供服务和法律保护、改善交通、强化土地征用的监管和土地所有权。

然而，城市政府通常只对城市选民负责。一个城市的政府可能自身只投入非常少的资源，以致于不能对边远的农村地区产生溢出效应。而且许多城市政策（包括土地使用、住房制度、服务保障）可能会影响城市化进程。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考虑到城市化对农村地区的外部效应，是否这些政策对于社会是最优的。事实上，一些担任一定职务的城市居民可能认为，那些旨在吸引农村移民的政策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因此，过去城市政策经常忽略移民的需求，甚至在他们身上增加额外的负担（包括金钱和非金钱上的），就不足为奇了。

底线是什么？是的，穷人日益向城镇和城市迁移，但更快的减贫可能需要更快的城市化，而不是放慢城市化步伐。发展政策的制定者需要促进这一进程，而不是阻碍它。

Martin Ravallion，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主任。

参考文献：

Ravallion, Martin, Shaohua Chen, and Prem Sangraula, 2007, "New Evidence on the Urbanization of Global Poverty,"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199 (Washington: World Bank); <http://econ.worldbank.org/doc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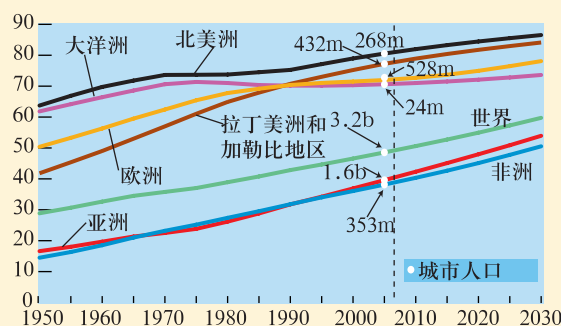
World Bank, 200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 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未来的一年将成为里程碑式的一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尽管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发展中国家中最具城市化的地区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其中 77% 的人口，或 4.32 亿人生活在城市中。但亚洲拥有最多的城市人口，大约 16 亿人，尽管该地区只有 40%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

20 世纪中期以前，北美洲和欧洲最为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在世界城市人口中占主要份额。自那时起，城市的演变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到 2030 年，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城市人口份额有望超过世界城市人口的 80%。

未来一年，世界的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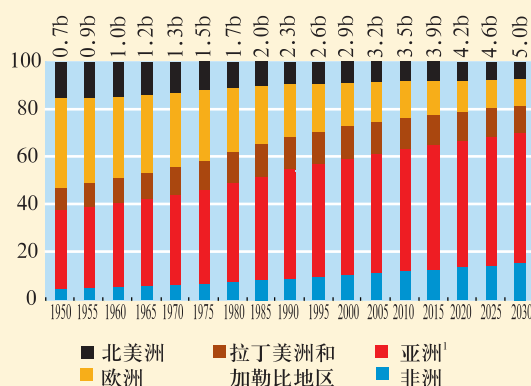
(城市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处，《世界人口展望：2006年修订版》(2007)。
注：m表示百万人，b表示十亿人。

发展中地区目前占世界城市人口的近75%。

(世界城市总人口中的地区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处，《世界人口展望：2006年修订版》(2007)。
注：b表示十亿人。数据为指定年份的全球总人口。
1. 包括大洋洲，占1%或更少。

毫无疑问的是，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这些国家的城市发展通常由其最大的城市所带动。例如，博茨瓦纳的哈博罗内市的人口由 1971 年的 1.8 万人增长到今天的超过 18.6 万人。

总之，世界不会在出现 20 世纪中期那样快速的城市发展。实际上，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在过去 50 年中已经在下降。但在非洲和亚洲这两个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城市化依然保持着较快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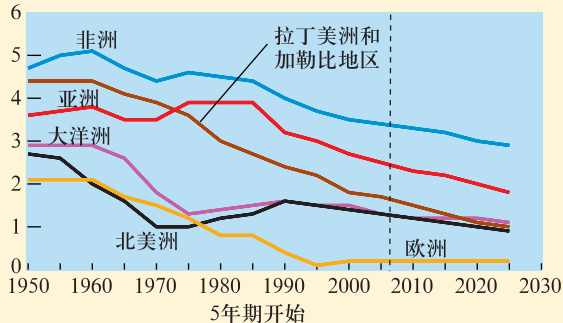
在过去 25 年中，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是中低收入国家。

	城市人口 1980	城市人口 2005	百分点变化， 1980-2005
总的百分比			
博茨瓦纳	16.5	57.4	40.9
佛得角	23.5	57.3	33.8
安哥拉	24.3	53.3	29.0
加蓬	54.7	83.6	28.9
阿曼	44.3	71.5	27.2
印度尼西亚	22.1	48.1	26.0
冈比亚	28.4	53.9	25.5
马来西亚	42.0	67.3	25.3
菲律宾	37.5	62.7	25.2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33.5	58.0	24.6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处，《世界人口展望：2005年修订版》(2006)。

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有望减缓，但在大多数地区依然保持在1%—2%。

(城市人口年增长率，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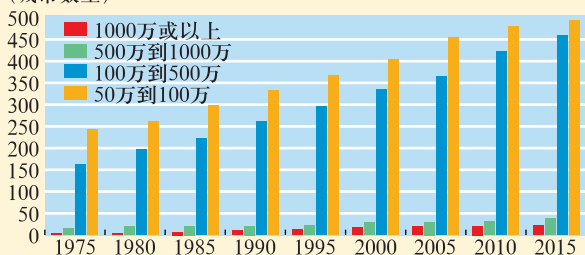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处，《世界人口展望：2006年修订版》(2007)。

演变

超大城市（那些拥有 1000 万人口或更多人口的城市）的迅猛发展没有像先前预期的那样成功。今天，世界城市人口中的大部分生活在中小城市。只有 16% 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过 500 万人的聚居区。

大多数城市人口生活在中小城市。

(城市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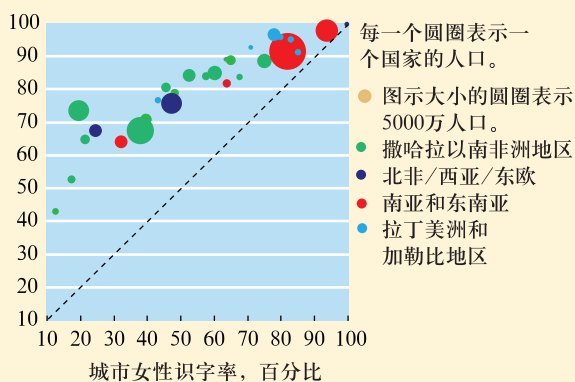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处，《世界人口展望：2005年修订版》（2006）。

城市贫民遭遇到的卫生不便利的情况在棚户区最为明显。在那里缺乏管道自来水、卫生设施、垃圾收集以及排水系统。城市户外空气污染每年大约造成 300 万人死亡。目前，全世界每三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生活在棚户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这一比例要翻番。

城市地区中有关生活质量的人口统计指标（像医疗、教育以及环卫）要高于农村地区。例如，城市居民中的女性识字率远高于农村居民，因为城市化倾向于促进女孩接受教育并推动对女孩受教育权利的文化认知。但城市富人的识字水平要远高于城市贫民。

城市人口中的女性识字率比农村人口平均高35%……

(城市女性识字率，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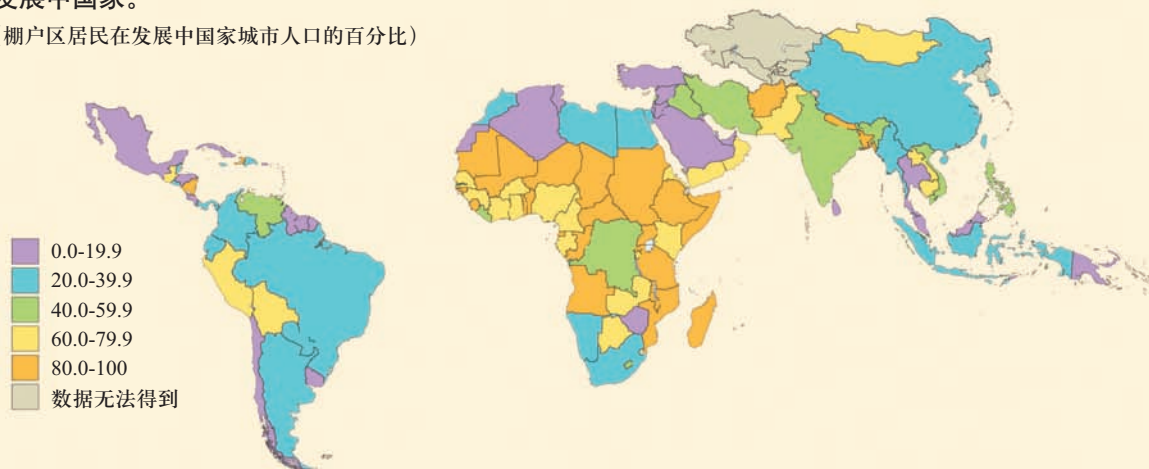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ORC Macro (2007)。MEASURE DHS STAT 编制。<http://www.measuredhs.com>，2007年6月11日。

注：如果识字率在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中是一样的，圆圈的位置将与图中斜线相一致；圆圈高于斜线表示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拥有更高的识字率。

……但到 2007 年，世界上超过 30% 的城市人口（10 亿人）生活在棚户区，90% 的棚户居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棚户区居民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UN-HABITAT DHS；也可查询 www.devinfo.info/。

本文由哈佛大学的 Patrick Salyer 和 David Bloom 撰写。

大， 还是 太大？

超大型城市在公共治理、融资和服务提供方面也面临一些特殊问题。

Ehtisham Ahmad

城市通常主要在于规模经济。成功的城市是商业和创新的中心，能够吸引有才能的人和技术人才进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城市人口相当可观的消费能力带来了市场和机会，从而使得城市成为吸引人们居住的地方。

但是，当城市持续膨胀并发展成为大城市时，人口超过1000万，更大的问题随之产生。人口的集中一方面可以给城市带来活力，同时也带来了交通的拥挤，环境恶化，住房短缺，形成一些限制性的区域。不断延伸的大城市地区在管理上也变得复杂和困难。

伴随着大城市的发展，不管是由于移民、当地人口的增长或者乡村和城市之间人口的重新界定，与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和必要服务的提供相关的困难将会变得更加明显。没有明确开销责任以及城市直接控制的不足的收入，可能会限制城市的管理当局对所采取措施所担负责任的范围。缺乏城市资金的及时信息必然会带来责任问题，同时也会带来宏观经济难题和潜在的政治经济两难问题。例如，在很多情况下，首都拥有太多的政治权力，

从而就会给周边带来压力。例如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尽管拉巴斯不是超大型城市，但是在它与正在形成的自治区El Alto之间的紧张状态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区域人们通过示威游行等方式使得政府管制出现瘫痪。

大城市不仅拥有较大的消费需求，而且也拥有比其他城市更大的税收基础和人力资本。因而，似乎对于这些城市来讲，相比其他相对低一些级别的政府机构，拥有更大的开支责任，被分配更多的权利来进一步增加资金融资。这就是著名的不对称联邦主义（见 Congleton，2006）。

本文考察了大城市和一个国家其他地区在职责分配和政府权力上的不对等，伴随着大城市地区的形成而产生的财政上的挑战以及用以提高公众服务、解决城市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而可能必须要修正的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





上海：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权力和城市

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2008年是人类发展的转折点。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将居住在城市,从而城市人口将第一次超过乡村地区。到2030年,城市人口比例还将会增加,从而超过世界总人口的2/3。尽管在大城市的人口比例仍然相对较小,但还处于增长之中,这种向大城市的大规模的转移将会给大城市带来很多管理上的和财政上的挑战。

很多大城市面临着巨大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聚集在一起的综合管理将成为新世纪其中一

个最关键的挑战。中央政府不太可能有效地规划这些地区的规划以及这些地区所需要的资源。相对于其他行政区域,这些地区是否应该被赋予更多的支出权利和税收权利?

不同的国家赋予了大城市不同类型的被赋予的权利。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大城市比其他行政区域拥有更多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在一些情况下,它们赋予了州或者省市一些职能和权利,而且是比较独立的自治权利,而其他情况,则是权利下放很少,责任还不明确。

大部分权利下放。在中国,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拥有两种地位——市政职能和责任(除了省份职能和责任之外)。这种不对等的处理方式同样也认可了上海所拥有与其他省份或者州同样的政治权利。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更多的支出和税收权利,这是“一国两制”的政治安排最主要的部分,以解决1997年香港从英国政府手中归还给中国政府。

这种不对等的安排有利于当地社会政策和公共投资的贯彻执行,这样就带来了大城市经济令人印象深刻的飞速增长。相对于中国的其他行政区域来讲,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特别是根据不对等的责任,中国政府需要确保大城市全部的贷款要与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这样,在中国大城市中,进一步明确支出责任和提供适当的激励和责任透明度应该成为关注点。

部分权利下放。在拉丁美洲,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正在进行一项有趣的尝试(见Fainboim,即将出版),通过实施一系列相关的措施,大大提高了大城市提供公众服务的质量。这些措施包括,批准给首都额外的权利(在20世纪90年代批准给予一些特殊的地位资格),市长的选举——产生出富有朝气和活力的领导者(例如1992—1994年的Jaime Castro,1995—1997年和2001—2003年的Antanas Mockus),通过适当地增强税收征收效率和在消费上的透明度,城市的金融实力也在不断增强。这些措施的实施部分弥补了哥伦比亚地方政府部门由于责任的不清所产生的长期困难。

小部分权利下放。相比波哥大,实行了不对等权力的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墨西哥城,世界上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0.19亿。其能够成为特大型城市主要来自于内部的移民(Graizbord和Santillán,2005)。但是,支出运行仍然是不明确的,提高当地税收的能力仍然像其他自治区一样受到限制。

尽管墨西哥城在该国拥有比其他任何大城市地区都多的税收收入。但是其税收收入水平仍然低于其他新兴的市场和发达国家。一些关键的地方职能,例如

教育和医疗卫生,仍然被联邦政府通过特殊的方式直接管理。同样,主要的社会安全网络,例如“Progresal/Oportunidades”(见Levy和Rodriguez,2004),关键的教育项目和医疗卫生项目仍然与直属的省份共同分享,或者由联邦政府提供大部分资金。然而,这种可

“财政职能的下放程度不同国家将有所不同,这通常反映了现存政治力量和制度力量的平衡。”

能给墨西哥城带来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权利和资源的不对称,仍然只是被意识或者是被关注。墨西哥其他的城市和地区,仍然被限制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范围内,甚至更多地依赖于转移支付。

权力下放,并被清晰地区分开来。需要更大的责任心和好的治理能力,权力的界定和分离依然排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优先政策目录中较为靠前的位置。

大城市的管理和政治权力相互影响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伦敦,大城市的权利被简单地从地方层面分离开来。1965年,在工会基础上建立了大伦敦委员会,并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拥有相当大的权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保守派政府废除了大伦敦委员会,一些职能被分散到大的城市,还有一些归还给中央政府。布莱尔政府重建了伦敦委员会,但是赋予其更多的战略性和协调性功能,其中包括为交通、政策、紧急事件规划及发展职能提供战略指导和协调。这种在大城市层面的协调功能要与纯粹的地方政府职能相区别,例如基础教育和基本的医疗卫生等仍属于地方政府的范畴,自治市区也拥有这些职能。

还有些国家,资金被分配到的城市,例如里约热内卢、卡拉奇和芝加哥,部分可能是为了与中央政府相分离,为城市地区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他目的还有开放内地贸易区(巴西利亚)和增强安全设施(伊斯兰堡)。

责任和权利

清楚的是在大都市拥有的责任和其拥有的政治权力是直接相互影响的。在赋予权利的同时树立其必要的责任将是最有助于提升服务质量和减少贫困。但是如何能够获得更大的权利?

关键的因素就是要明确不同政府层面所应该拥有的权利。在很多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不同的政府层面,权力是相互重叠的,甚至是那些在世界上其他

国家都能够很清楚地界定的权利。

基础教育就是一个例子。在一些安第斯国家,市政当局只需要为学校提供必要运作和维持费用,在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工作的小时来证明。教师的雇佣通常是管理的中间地带,为了学校的利益,通常由中央政府支付教师的薪水。而很多时候,没有哪个具体的管理部门为基础教育的结果负责。这就是一个不完全地方分权和责任不清的例子。

大城市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享用其自己的税收收入。这能够为其自己的权利增加资金,而不再依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这些转移支付经常被中央政府用作特殊的目的。能够自由的使用税收收入对于在大城市的层面建立一个较为坚挺的预算是很有帮助的,同时也有助于确保城市的借款和投资决策不会给中央政府带来困难。

开支和业绩

明确并且简化不同政府层面的责任,特别在开支方面,是世界上很多政府间对话的中心问题,包括中国、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一些国家以及上面提到的安第斯地区的国家。这项努力通常通过交换某些特定成果的合同来实施的(见Spahn,2006),为这个政策结果负责而制定预算账单逐渐被称为“业绩预算”。

业绩预算是有效的,清晰的表示在合同中或者合同以外,清晰的界定城市管理者和开销机构为之负责的资金等。但是,这种权利要求这些资金首先是被专用的、有成本的并且是被监管的。在某一阶段,也有些额外的资金,被用作政府基金,但是二级政府部门在这项政策上并没有优势,因为其资源和能力受到限制。甚至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业绩预算的引入需要更加认真地规划和及时地实施。

对于大城市来说,这可能具有优势的,因为能力的限制通常不是问题,因为大城市不缺乏工人和技能人才。而且,对于一个相对灵活的、有责任的政府机构来说,相对于中央政府层面,在城市层面上就行政、管理和信息系统进行调整更为可行。在波哥大犹太人的管理体制强调政府资金必须有效的、负有责任的、并且是透明的,对于行政者来说必须要有相应的权利。自从2000年,大城市可以实施预算,有时候甚至超出中央政府所能够做到的。

大城市能够建造一些基础设施来管理政府财政,相比在小一些的行政区域,这些资金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新加坡拥有一个比巴西政府更为先进的政府资金管理系统。建立这样一个系统,信息流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政府职能的、经济上的,包括项目上

的规范的完整的信息都需要提供,包含投入的成本和产出的效益和成果等。IMF提供的2001年政府经济统计年报提供了世界公认的经济和职能预算的标准。这个信息包括在各个层面的政府部门,合法的公民,有详细的记录花费多少,目的是什么。

发掘收入源

通常,大城市拥有重要的税收基础,其中一些是需要与中央政府共同分享的。它们也有潜力根据经济规模建立一个现代的税收管理部门,通常与国家的标准相匹配或者超过国家的标准。

在税收领域,通常留有一些空间通过给与地方当局来完善地方税收,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地方财政收入。例如,波哥大的行政管理部门 Mockus 在财政税收总额上获得很大的成功,通过运用个人财产的现代评价机制,这个机制隶属于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评价机制。

如果要承担更为广泛地责任,仅通过城市自身的财政税收可能是不足的。例如墨西哥城,如果更多的一些职能被分散出去,那么征收全国40%的税收收入而没有中央政府的拨款,是可以应付的。墨西哥城还是有增加财政收入的潜力,例如在附加税上增收附加费,或者对在不同时候的收入增收个人所得税。在其转移支付体系和当前的权力责任体系下,给定权重和激励,感觉就没有必要施加这样税收了。

通过借款,大城市通常都会有一个安全的资金来源。除了必要的税收来源和公众财政管理体系以外,大城市通常是需要一些其他的设施条件以便于这种不对称方式进行借款。他们包括信贷机构的运作,政府运作的信息关于为需要机构借款提供便利条件。

但是,一些预期的谨慎的限制条件和借款信息都是重要的,对于诸如政府间的公众与私人的合作管理产生的风险需要识别到并且记录下来。尽管市场规律是适合的,应该被鼓励,但是仍然需要一些与市场规律相一致的措施,包括财政的规则和行政管制共同发挥作用。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有的政府部门间的大额借款都是被严格关注的。例如,在阿根廷和巴西地方政府间的债务危机严重地破坏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平衡。

权利的转移

大规模的都市集聚和大城市的形成,这种趋势给

政府政策实施以及减贫带来了挑战。大城市也带来了压力和风险,但是这些是能够通过机制和额外的资源相平衡。

对大城市战略规划,特别对整个基础设施、金融体系的规划的需求显示出在这些城市中负有责任的决策是必要的。但是决策制定者越来越远离当地居民的真正需要,大城市大量的消费需求都会增加财政风险。同时,国家的目标,例如地区间的平衡和经济稳定的需要,将会限制大城市财政支持其他的地区或者通过限制贷款和投资计划来保证整体经济的一致性。

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大城市,如果探索出能够清晰界定的责任,同时具有带来额外税收收入进而提升管理水平的能力,那么就能够获得潜在的收益。财政职能的下放程度不同国家将有所不同,这通常反映了现存政治力量和制度力量的平衡。但是,标准的信息流以及透明度对于拥有责任,保证整体经济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大城市的数量已经开始呈现出责任的不对等性,但是仍然有很多方面需要从亚洲、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的经验中来学习,以便制定出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发展战略。

Ehtisham Ahma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顾问。

参考文献:

- Ahmad, Ehtisham, and Giorgio Brosio, eds., 2006, *Handbook of Fiscal Federalism* (Cheltenham, United Kingdom;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 Ambrosiano, Maria Flavia, and Massimo Bordignon, 2006, "Normative Versus Positive Theories of Revenue Assignments in Federations," in *Handbook of Fiscal Federalism*, pp. 306–38.
- Congleton, Roger, 2006, "Asymmetric Federal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centralization," in *Handbook of Fiscal Federalism*, pp. 131–53.
- Fainboim, Israel, forthcoming, "Fiscal Success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 The Case of Bogotá," in *Emerging Issues in Fiscal Federalism*, ed. by Ehtisham Ahmad, Maria Albino-War, and Maria González.
- Graizbord, Boris, and Marlon Santillán, 2005, "Dinámica demográfica y generación de viajes al trabajo en el AMCM: 1994–2000," *Estudios Demográficos y Urbanos*, EDU 58, Vol. 20, No. 1, pp. 71–101.
- Levy, Santiago, and Evelyn Rodríguez, 2004, *Economic Crisis,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overty Policy Reform: Mexico's Progreso/Oportunidades Program* (Washington: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Spahn, Paul Bernd, 2006, "Contract Federalism," in *Handbook of Fiscal Federalism*, pp. 182–97.
- Ter-Minassian, Teresa, and Jon Craig, 1997, "Control of Sub-National Government Borrowing," in *Fiscal Fede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ed. by Teresa Ter-Minassian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点在管理大城市方面什么是

3 有关不同处事方式的三个观点

一份最新的联合国报告显示，不出明年，全球的城市人口数量将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数量，其中75%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好消息是，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城市化进程如果把握得好，很可能会给人们带来更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更高品质的生活。然而，事情糟糕的那一面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如果处置不当，城市化不仅会阻碍经济发展，而且还会使城市贫民窟的规模扩大。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在世界范围内，如今已经有接近1/3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中。决策者们肩上承担的责任是如此之多，他们肯定需要一系列解决问题的好办法。《金融与发展》杂志邀请了三位相关专家来为决策者们出谋划策。这三位专家分别来自亚洲和非洲，这是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两个地区。

1 提供庇护所

Matthew Maury，国际人类栖息地组织非洲和中东地区副主管

在非洲，城市贫困人口快速增长给城市管理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殖民地时期的大多数城市规划政策都力图把穷人赶出城市。在各国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新的地方政府掌管了城市以后，城市的大门慢慢打开，穷人开始涌进根本没有做好迎接他们的准备的城市。最近几年，这种人口迁徙变得像洪水一样泛滥成灾。如今，非洲已经成为全球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而且这种快速发展的趋势在接下来的10年还会继续保持下去。联合国人居署报告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72%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民窟中，这里聚集了仅次于南亚中部的世界第二多的贫民窟人口。而在可以预料的将来，这种贫民窟人口的聚集只会愈演愈烈，因为大部分的城市化进程中都会涌现大量经济弱势群体。

规模巨大的贫民窟在整个非洲大陆滋生。没有哪一个大中心城市不受到非正式定居点和贫民窟的困扰。非洲最大的同时也最为拥挤的贫民窟是内罗毕的Kibera，有50万到100万人住在其中。国际住房联盟指出，在非洲的许多城市，只有不到10%的人口居住在拥有规范建筑物的正式居民点。联合国人居署给出的让人震惊的数据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在赞比亚，74%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中；在尼日尼亚，80%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中；在苏丹，这个比例是85.7%；

在坦桑尼亚是92.1%；马达加斯加是92.9%，在埃塞俄比亚，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让人吃惊的99.4%。

为什么如此多城市的发展进程因贫民窟的兴起而草草收场？毋庸置疑，这里面有各式各样许多原因。但几乎所有这些城市都面对同一个根本问题：缺少一个合适的城市规划。而且，我确信，非洲大城市的管理者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是否有能力为正在快速迁入城市的低收入人群提供足够的空间、住房以及服务。

在横穿非洲访问草根阶层时，我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面对数量快速增长的低收入人群而具有局限性的城市规划使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变得复杂。对于许多市政当局而言，由于穷人没有能力取得土地、获得住房贷款、获取必要的服务，也无力驾驭复杂的而且往往过时的监管环境，城市规划缺失所造成的后果变得更加恶劣。这些监管部门常常设置一些条件，妨碍那些合适的、价格可以接受的建造工艺的使用。例如，一些过时的殖民地时期的建筑法规居然强制要求热带地区建筑物的屋顶要达到造价不菲的积雪承重要求。

大多数政府不再使用操作不正规的强制拆迁手段来解决城市贫民窟问题。事实上，大多数城市已经有一些限制，尤其是一些融资项目来升级现有的贫民窟。但只有极少数城市从事情的另一端着手去解决问题，即通过事先规划把城市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规模来预防将来贫民窟的涌现。由于缺乏这种前瞻性的策略，政府将承担新增贫民窟的大笔费用，尽管事先预防贫民窟的形成比事后去升级改造、重新安置花费要少得多。

最大的挑战

预防贫民窟的形成

决策者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认为，针对穷人的适宜的住房需求计划应该包括为他们留出有足够使用期限的土地。之所以是合适，是因为把远离城市中心的土地分配给贫困家庭并不是什么好主意，除非那里拥有完善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并且比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接下来，我将讲述一些值得学习借鉴的成功案例。

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南非投入了大量资源来确保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像样的住所。这个保障计划包括许多方面，其核心是每个公民都有资格申请一次的住房津贴制度。最近，对提供必要基础设施的开发商实行补助的措施也被纳入计划之中。尽管整个体系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这种为城市贫民提供空间、住房和服务的努力绝对是值得人们称道的好榜样。因为从90年代初期开始，它帮助改变了成千上万的城市家庭、半城市家庭的生活。

尽管城市化程度不如其他一些国家，马拉维还是在诸如首都利隆圭这样的城市中为低收入家庭住房计划预留了足够的土地。此外，在制定新的住房计划时，政府邀请了一些直接为穷人工作的利益相关人士来对新政策发表意见，并评估其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努力在城市中找寻像样住所的贫民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没有哪个城市当局可以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贫民窟问题。这个难题要想得到有效解决需要私人部门、市民团体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因为贫民窟不会自动地迅速消失。相对于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寻求土地建造工厂的企业，穷人们没有向城市管理者 and 规划者优先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也无法发出那么响亮的声音。但是，如果不对穷人们的住房要求给予足够的重视，人们会付出沉重代价：像 Kibera 这样的贫民窟将越来越多。

2 获取恰当的平衡

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城市化是无法阻挡的。全球化加快了自由市场和现代技术的传播，促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到明年，将会有 33 亿人——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居

住在城市。对于所有地区的城市而言，如何应付这种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入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不同的城市所将面对的具体问题会有所不同。

亚洲即将拥有数目可观的特大城市群。在2005年到2020年之间，中国将占据全球增长最快的30个大城市中的10个，印度则占据8个。包括上述中国和印度的大城市在内的一些亚洲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他们应付近来的城市移民浪潮创造了具有相当竞争力的有利条件。但是，亚洲各个城市也都热切盼望自己能够成为像伦敦、巴黎、纽约那样的国际化大都市，热切盼望像这些大都市一样拥有先进的交通运输体系，全球性的多元文化氛围，大量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及大型企业，发达的媒体，可以举办大型赛事的体育场，洁净、健康、优美的城市环境，让人过目难忘的建筑，清洁的空气、水，漂亮的公园等等。

要想成功地变身为世界性的大中心城市，亚洲的城市必须设法在花气力发展“硬件”还是花气力发展“软件”两者中取得适当的平衡。但很少有城市意识到了这个平衡的重要性。

硬件部分单调乏味但至关重要：它包括一个现代化的排水系统，稳定而值得信赖的电力供应系统以及保养良好的桥梁和道路。无力建造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也许是亚洲城市在由美世咨询公司评选的全球生活质量最优城市50强中仅仅占据了4个席位的重要原因。这些入围的亚洲城市分别是新加坡（34）、横滨（38）、神户（40）和大阪（42）。新加坡之所以在亚洲排名第一，是因为它拥有全世界最棒的城市规划。而纽约仅仅排在第48名则说明由于糟糕的城市维护，像纽约和伦敦这样的第一世界国家城市的基础设施比一些第三世界城市好不了多少。2007年7月曼哈顿地区的污水池泄露事件便是明证。

即使是最顶尖的亚洲城市也没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跟上潮流，这可能得归咎于城市管理者们在硬件升级方面节衣缩食而把省下来的经费投入软件环境建设：因为他们认为文化活力可以为城市吸引来大量高级人才。孟买这个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每平方公里29650人）基础设施支离破碎，极其落后，而且几乎没有眼光长远的城市规划。但这里的文化氛围充满活力。它的电影工业——宝莱坞在世界很多地方都留下深刻印记，影响力遍及从印度尼西亚到摩洛哥的广大区域（也许还包括新泽西州郊区）。上海的基础设施

看上去要好得多，至少从表面上如此——随处可见又新又宽的道路，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但一些具体细节仍应该引起更多重视，比如说，它的排水系统就不是世界一流的。尽管如此，上海的文化活力和孟买一样引人入胜，这主要得归功于上海的管理者们集中精力建设了一批魅力工程（剧院、图书馆、博物馆——计划在未来四年建设上百个上述三种文化场所）。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伟大的文化复兴潮流呢？最简单的答案是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亚洲青年开始相信21世纪将属于他们。亚洲青年们共同拥有的这种自信得到了高盛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的印证，这份报告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最大的四个经济体将有三个出现在亚洲，它们是：中国、印度、日本。这种乐观主义精神甚至感染了在贫民窟里居住的穷人。一位美国外交官最近告诉印度作家，《印度的崛起：从贫穷到繁荣的转变》一书的作者Niranjan Rajadhyaksha，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贫民窟中，他通常看到的是犯罪、绝望、毒品、城市黑帮，但在孟买的贫民窟中，他的感受完全不同，这里的人们充满了活力和自信。根据《时代》杂志的统计，Dharavi这个臭名昭著的全亚洲最大的贫民窟，GDP居然达到了惊人的10亿美元。

然而，如果亚洲城市不能在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两者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他们可能转而变成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没有能力将在全球流动的人才吸引到自己城市来工作的经济体是无法获得成功的。那些充满能量的金融神童、管理顾问、文艺表演者、媒体明星为一个全球性大都市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发酵剂”。好消息是，尽管亚洲城市还存在许多缺点，但那些天才们已经开始慢慢地向这里迁徙了。



向市民咨询

Ramesh Ramanathan 和 Swati Ramanathan

联合发起人 Janaagraha 公民权与民主中心

我们的意见局限于在印度城市获取的经验。问题中的用语本来是“管理”，但我们更喜欢使用“治理”，因为后者不仅仅包含了管理这层涵义，而且还将其置于一个更宽广的背景之下。

在大城市管理中要面对的问题绝不是微不足道的。这里面有技术问题，如城市规划，大型交通体系的设计和管理，水、电等资源的供应、定价和输送等。这里面也有公共财政问题，如何确保城市有能力获得必要的资源来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这里面还有区域定位问题：如何与城市所在的大地区相联系，以及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等等。

解决问题的诀窍是设计一个可以处理所有这些复杂事务，同时也能贴近市民，高效率地为他们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挑战，不能靠联合式的援助来解决问题。

此外，我们还认为在系统化的城市管理办法中需要引入民主程序。否则，公共服务的提供会显得过于组织严密而死板，就像在一些独裁政体中发生的一样。在那样的情况下，城市居民仅仅是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或者消费者，而不是对自己城市有很强归属感，能为自己城市带来生机和活力的公民。

这些想法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我们在印度班加罗尔实施的旨在增强参与城市治理的措施在过去几年中，有超过125000人参与到各式各样的市政管理活动中来，超过7000名志愿者提供了接近600万小时的服务。我们发现，如果没有一个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系统化的解决办法，城市治理中的变革根本不能持久。下面，我将给出两个例子：

我们最初所开展的一项活动是让市民参与用于地区发展的市政资金的分配计划。超过5000名市民参与了 this 实践，大约占总额22%的本地预算的使用由市民自己投票决定。这一尝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由于立法中没有市民参政的正式规定条款，这次尝试是不可复制的。之所以获得成效，主要是因为采取了平民化的解决办法。他们中的一些人与那些愿意支持这项活动的民选代表共同工作，还有些则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来为活动提供帮助。但这些有利因素是不会一直都存在的。

在印度选举委员会的支持下，我们所开展的第二项活动是查对城市的选举人名册。让人震惊的是，选举人名册的错误率超过了50%，这说明过去整个选举体系充满了欺骗。腐败的政客也确实利用选举授予他们的合法地位，利用政府公职谋取个人利益——这让民主更加远离了市民，让市民们不再为民主的念头所着迷。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市民们有时候宁愿选择一个仁慈的独裁者而不是一个机能不良的民主政府。人人参与城市治理的举措可以成为一个动力十足的引擎，能在整个民主进程中给市民以政治启蒙教育，并培养他们的自主意识。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说，“国家不该为了民主而民主，而应通过民主变得民主。”在漫漫民主长河的行程中，印度还只走了很短的一段。因此，我们还不能享受到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所带来的好处。尚在民主进程途中的我们，会回过头去用羡慕的眼光向后打量民主长河一岸高效的独裁政权，也会用钦佩的目光往前张望民主长河另一岸成熟的民主体制。我们必须在前进的道路上保持谨慎，正如一则古老谚语所说，要“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再平衡行动

北京王府井一家百货商场外的购物者和行人。

Jahangir Aziz 和 Steven Dunaway

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为世界GDP贡献了大约2万亿美元，创造了1.2亿个新的工作机会，帮助了4亿人脱贫。这是一笔巨大的数目——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经济规模与葡萄牙相当的经济体；每年创造的新的工作机会与澳大利亚总就业人数相当；脱贫人数相当于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几个国家的总和。近些年来，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都保持在10%以上，而通货膨胀保持在3%以下。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

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海内外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却越来越担忧。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家总理温家宝就警告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更笼统地来讲，或许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增长步伐是不是可持续的，或者说经济机制中的不平衡是不是会减缓增长。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开始期望能使经济实现再平衡，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使增长的原动力更多地依靠于消费的原因。

这种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应该如何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不仅对中国而言，对世界上其他众多依靠中国繁荣而繁荣的国家同样重要。因为当中国的经济增长时，它对很多国家的经济影响都会扩大，无论通过巨大的贸易不平衡、汇率问题或者对资源和食物的巨大且不断增长的需求。有很多关于中国应采取各种政策来平衡经济的建议——甚至有意见认为作为市场力量的结果，再平衡会“自然而然”的发生（见“解开中国再平衡的谜团”，本刊第32页）。我们认为再平衡不会自动实现，它有赖于货币政策、价格放开、金融市场改革以及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的改变等众多努力。

如何开始的

中国的自由化通常被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1984年和1999年的三次改革——每一次改革都促使经济进一步开放。1994年的改革有三个方向：官方与市场汇率统一，并取消了对货物、服务贸易和收入在支付方面的限制；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了出口部门；国有企业（SOEs）改革。前两项改革促使出口部门转变成经济增长强

中国的经济奇迹可能处于危险中，除非可以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

有力的推动机，而第三项改革释放了国内的企业家精神。

外国企业，包括外资和合资企业中的外方，利用中国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将沿海地区变成了“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供应链上重要的一环。与此同时，国内企业因为不再负担高成本的社会责任，也不被要求和政府共享利润，从而开始投资新技术，快速扩张，并找到新的市场。国内的私人企业也开始发展。中央和当地政府的激励措施甚至过多——包括减免税收，审批提供廉价土地和超低的公共品价格等多种形式——这些鼓励政策有助于产品维持低成本，刺激企业将利润再投资到进一步的扩张中。

对资本的控制和不发达的资本市场限制了人们的投资选择，中国巨大的储蓄资本不得不作为廉价的融资资源，通过国有银行系统提供给这些企业。正因为此，在投资和出口的刺激下，中国取得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消费增长尤其地不能与迅速增长的投资带来的生产能力的增幅保持一致。因此，在投资在GDP中占比增加时，消费的占比却在下降，下降的比例正是贸易顺差增加的比例（见图1）。

增长加速，失衡进一步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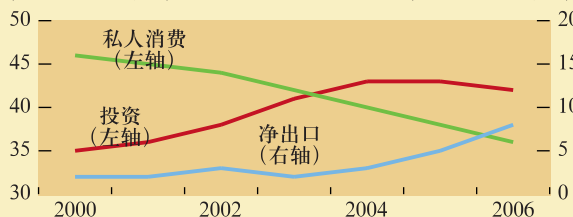
关键是，如果生产能力的继续扩张最终导致价格下降，进而造成利润减少，债务拖欠增多，投资者信心挫伤，中国的快速发展势必会减缓，甚至于大幅放慢。随着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出现这种发展趋势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如果与此同时，全球的经济增长放缓，其他国家的竞争力上升，中国的企业就会发现，如果不大幅降低价格，就很难将产品销售到国外。此外，中国的贸易伙伴采取保护主义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形势会进一步恶化。

图1

脱离平衡

消费没能与持续增长的生产能力同步增长，增长要靠贸易顺差的增加来维持

(占GDP的百分比) (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CEIC数据公司；中国官方数据；IMF工作人员估计。

但是，今天很多经济成功增长的国家难道没有在这段时间内持续使用这种发展策略吗？事实上，以大量的国内储蓄和投资做支撑，建立在出口基础上的增长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是适用的。这种战略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自1990年，中国变化巨大，当时的中国只是一个刚刚开放的小的经济体，它为西方国家而进口技术先进的零部件，然后将这些组装成消费品出口到西方国家。而现在，中国25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组装业务占不到10%。中国的出口业务已经延伸到新的、更先进的产品领域，而这些产品中，国内制造的生产资料的组成比例在进一步加大。中国已经成为很多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但是，以前扩大市场份额相对比较容易，而现在，如果要进一步扩张，中国的企业很可能必须降低价格。如果降价的幅度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生产能力的增长，那么目前的很多投资就变得不可行，会进一步演变成未来的债务拖欠。

投资为什么高？这并不难理解。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公司的利润大幅增加，这说明投资回报非常具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因为关键的生产投入成本很低——包括能源、公共资源、土地价格以及污染成本。但是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资金的低成本。投资在中国GDP中所占比例接近45%，其中90%是在国内进行的融资（国民储蓄率是GDP的55%）。外国直接投资在GDP中的占比不足5%。国内银行贷款和企业利润的再投资资金满足了融资的大部分需要。而且，因为政府规定的存款利率较低，银行贷款利率也很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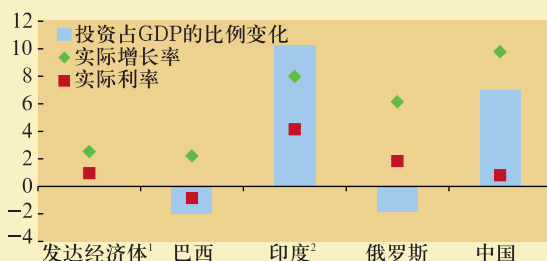
自从企业改革开始，政府不再从国有企业获得利润分红，甚至包括那些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需要向私人持股者派利的国有企业。对这些企业而

图2

对投资强有力的刺激

投资成本与实际GDP增长之间的巨大差距说明投资在总产出中占较大的份额。

(百分比，2001—2005年平均)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和IMF工作人员估计。

1. 如《世界经济展望》的定义。

2. 2004—2005年平均。

消费水平严重滞后

中国的消费明显低于其他经济体。

(占 2004 年 GDP 的百分比)

	家庭可支配收入	个人所得税 ¹	家庭消费 / 可支配收入	劳动收入	个人消费	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政府支出	调整后的消费 ²
美国	74	9	95	57	70	10	80
英国	66	10	98	56	65	12	77
意大利	67	...	90	42	60	12	72
澳大利亚	58	12	103	49	60	11	71
印度	84	2	76	...	67	4	70
德国	66	9	88	51	57	6	63
加拿大	58	12	96	50	56	7	63
法国	62	8	90	52	56	6	62
日本	59	8	96	51	57	5	61
韩国	54	3	95	44	51	5	56
中国	60	1	69	56	41	3	44

资料来源：OECD；CEIC；IMF 工作人员估计。

注：...表示数据无法得到。

1.2003 年的数字。

2.个人消费和政府在教育上的支出。

言，利润要么再投资，要么放在企业户头上，而这种存款账户的利息很低。企业存款的增加正是中国总储蓄额增加的主要原因。企业存款与普通个人存款基本相等——占 GDP 的比例大约在 23%—24%。银行贷款的低利息和留存利润使得投资基金保持了低成本。尽管中国实际 GDP 增长平均为 10% 左右，投资的实际成本却一直在 1%—2% 左右浮动。而在发达国家，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微乎其微的。在很多新兴市场，这种差距也是存在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两者之间的差距像中国这么巨大（见图 2）。所以中国的投资增长如此之快，投资占 GDP 的比例成为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并不令人惊讶。

资本成本不仅仅是低；尽管中国有大量的劳动

力供给，相对工资而言，资本成本还在下降。因此，就像经济学理论预测的那样，生产快速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倾斜，就业机会的增加速度开始减慢。在多数国家，3%—4% 的 GDP 增长通常会带来 2%—3% 的就业机会增加。但是在中国，10% 的 GDP 增长只创造了大约 1% 的就业增加（见图 3）。另外，汇率低估以及投资者普遍抱有的货币将会升值的预期会促使投资倾向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这会进一步促使贸易顺差增加。

为什么消费会低？尽管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消费一直以 8% 的实际增长速度增长，但是远远落后于 GDP 的增长。家庭消费占 GDP 的比例下降超过 12 个百分点，仅占 GDP 的大约 40%，是世界上最低水平国家之一（见表）。在中国，家庭存款额高，近几年这一比例也有些微的增长，这解释了为什么只有约 1 个百分点的降低。几乎所有的下降都是因为分配到家庭的国民收入比例在下降，包括工资、投资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的收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工资比例在下降，但是在多数国家，总家庭收入还是适当有所增加，因为红利和利息收入的增加弥补了工资比例的下降。但是在中国，家庭的投资收入从 90 年代中期 6% 以上的 GDP 占比下降到目前的不足 2%，这主要是因为存款利率较低以及对家庭资产所有权的限制（直接或是通过机构投资者）。而且，在很多国家，国有企业的利润上交政府，政府以这些利润为公众提供消费商品，例如医疗卫生和教育，以及提供给家庭的收入转移。但是在中国，政府得不到红利，因此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和在卫生及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在减少。

图3

就业机会太少

尽管 GDP 快速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却很慢。
(就业增长，百分比，1992—2006 年平均)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和IMF工作人员估计。

1.如《世界经济展望》的定义。

2.1993—2006年平均。

为什么再平衡不能自动发生

解决不平衡的办法看起来非常简单：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消费。有些分析家会质疑这是否是很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正常的商业循环周期会再次平衡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上升过程中，企业进行投资和扩张，对诸如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等的需求增加。这会增加投入成本，削减利润，抑制投资。低生产能力的公司退出会使经济增长放缓，价格趋于稳定。

“最明显的办法是同步地提高贷款利率下限、提高存款利率上限，并且允许汇率更快上升。”

但是套用在中国这个例子上，这种论点是有缺陷的。商业周期通常发生在比较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市场发展完善，价格能较早地提供市场信号，从而允许企业和家庭顺利地进行调整。在中国，市场发展不完善，价格不是主要市场供给和需求情况的真实反应。事实上，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响。因此，再平衡需要政府的参与和行为，改变政策和进行改革。政策变革和改革都需要做些什么？有四个主要的步骤：

首先，提高资本成本。在不久将来，利率和汇率将成为抑制投资快速增长和银行贷款利率联动增加的关键。抑制投资是过去3年中宏观政策调控的主要目标。中国政府也曾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和“指导”银行贷款多项举措直接控制投资，但是这些不是长久之计。中国必须加强依靠货币政策，通过提高资金成本来抑制投资和信用增长，这是投资迅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政府也担心，如果通货得到严格管理，利率的增加会刺激资本流动，从而增加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这又要求进一步提高利率来化解这些影响。中国政府不仅设置了存款利率的最高限，同时也规定了贷款利率的最低限，并对外汇汇率进行严格管理，尽管2005年中国政府对外汇机制已经进行了改革。

最明显的办法是同步地提高贷款利率下限、提高存款利率上限，并且允许汇率更快上升。这会为紧缩性货币政策达到效果留下余地。这不仅会使资本的财务成本上升，从中期来看，强势通货还有助于抑制向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的投资，同时增加家庭收入。经济政策的目的应该是使利率和汇率都更多地

可以由市场决定，所以正确的价格信号应该提供给投资者和家庭。

其次，放开价格。降低投资增长不只是要求货币紧缩。经济中的其他主要价格也必须反映市场状况和基础性的资源成本。在过去的几年里，政府开始提高工业用地、能源、石油的价格以及更重要地，开始引入严格的环境标准，更好地实施污染控制。政府的目标是在接下来的5年里，使单位GDP的能源使用节约20%，这一目标不仅有助于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减少污染，还能通过提高商业成本抑制投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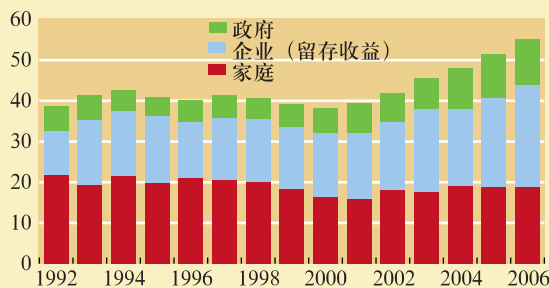
在税收方面，政府正在统一企业所得税税率，但是还必须削弱那些过去20年内大量采取的税收和其他鼓励投资的措施，尤其要削弱是地方的鼓励程度。提高资本成本同时还要求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更好的法人治理，包括要求盈利的企业上缴红利作为财政预算的一部分。政府制定了一个试点计划，要求2008年一些国有企业向财政支付红利，红利从1994年开始算起。这是迈向正确方向的第一步，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推广，尤其应该包括上单企业，他们应该向政府派分和私人股东一样多的红利。

第三，改革金融市场。一方面政府的法人治理不严使得国有企业累积了大量的储蓄，另一方面私人企业，尤其是中小规模的私人企业，由于不发达的金融媒介限制了他们从银行取得贷款，同样积累了大量的储蓄（Aziz, 2006）。21世纪初期，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银行改革计划，在清理拖欠贷款、调整银行资金、向外国机构和竞争对手开放金融市场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由此而来的是，银行开始变得保守谨慎——因为脆弱的内在风险管理和风险定价体系——它们牺牲了私营和个人的利益，继续向拥有大量现金的国有企业放贷，贷款数额甚至

图4

对金融改革的需求

私营企业和家庭的投资和主要支出正不断转成储蓄。
(储蓄，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CEIC；中国官方数据，IMF工作人员估计。

更大。因为资本市场——债券和股票——同样脆弱，企业融资或个人存款都没有别的选择。因此，作为一种替代，企业只好依靠内部储蓄进行投资，而消费者同样只能依靠储蓄来支付几乎所有的大额支出——教育、医疗卫生、养老金、住房贷款和耐用品（见图4）（Aziz 和 Cui, 2007年）。能够更方便的获得贷款，允许以更多的形式建立基金可以降低企业保留大量储蓄的积极性。同样，如果能够更方便的获得信用、保险和私人养老金的话，私人储蓄也会减少，消费会增加。

因此，建立更好的金融中介成为政府应首先考虑的问题。当局正努力争取在银行的商业运作、内部控制和监管方面取得进一步的业绩。他们还应该提高存款利率的上限，这不仅能够提高资金成本，还能促进规模较小，但是积极进取的银行与大型国有银行之间更好地竞争，刺激大银行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中国同时也在争取扩大国内其他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和产权市场。但是，政府对债券和股票发行的控制对这些市场而言是非常严重的障碍。增加家庭消费不仅要求提高国民收入中家庭收入比例，还要求减少那些促使人们保持较高预防性储蓄的不确定性。对第一点来说，关键的解决办法是提高家庭投资性收入——通过较高的存款利率和更积极的参与股票市场，以及直接或间接地扩大共有基金和养老基金。过去几年里产权市场的改革促使日趋萎缩的股票市场获得新生，但是产权供给需要继续增加。

第四，改变政府支出格局。政府在这次再平衡行动中有着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加强主要社会性服务的提供，尤其是教育、医疗卫生、养老金（见图5）。减少这些供应的不确定性能够从实质上降低人们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提高人们增加消费的信心。1994年，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医疗卫生、教育和养

老的提供从企业转给了政府。但是，总体而言，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履行这些新的责任。因此，家庭不得不承担医疗卫生和教育增加的那部分成本。拿医疗卫生来说，中国家庭需要自付大约80%的医

“中国目前的高增长和低通胀以及世界经济的良好发展可能会使人们形成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中国还有时间按照其节奏完成这些改革。”

疗卫生成本，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之一。此外，他们还面临着养老金的巨大不确定性，因为这一领域的改革还没有形成一个新的、可行的养老系统，尽管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口的老龄化，增加了对存钱防老的需要。虽然政府在这几年的财政预算中增加了在教育与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但是非常有限。实际上，家庭采取了“自我保险”的方式来防御养老、医疗和教育相关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的储蓄明显高于如果风险由社会共同承担时人们的储蓄。

政府事实上不是为了提供一些快速的定论，而是采取了一些正确的决定来平衡经济，包括多方位地进行基础性改革，将强烈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依赖消费。中国在很多项改革上已经取得了进展，很多分析家也同意这种战略的基础原理。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高增长和低通胀以及世界经济的良好发展可能会使人们形成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中国还有时间按照其节奏完成这些改革。而事实不是这样。虽然未经核实，但是中国的不平衡会继续加剧，随之而来的进行巨大调整的可能性也在增加，这会构成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的重大威胁。

Jahangir Aziz, IMF 亚太部处长, Steven Dunaway, IMF 亚太部副主任。

参考文献：

Aziz, Jahangir, 2006, "Rebalancing China's Economy: What Does Growth Theory Tell Us?" IMF Working Paper No. 06/09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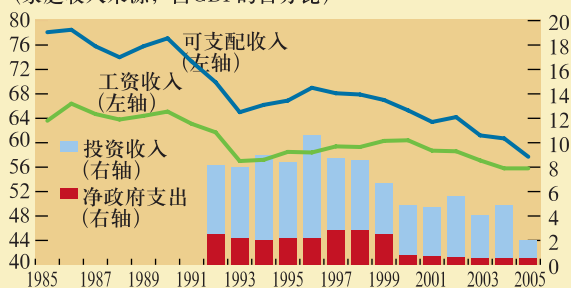
——, and Li Cui, 2007, "Explaining China's Low Consumption: The Neglected Role of Declining Household Income," forthcoming IMF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图5

转向个人承担

政府用于家庭医疗卫生、教育和养老金的支出一直较低且不确定。

(家庭收入来源，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CEIC；中国官方数据，IMF工作人员估计。



解开中国再平衡的谜团

市场力量会遵循“自然”轨迹。

中国中部湖北省的市场上工人正在运送钢管。

Jonathan Anderson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球经济事件的观察家们一直在谈论一个罕见的现象，东道国美国内阁的官员和他们的中国伙伴打着“中美经济对话”的旗号，开始了一系列更具吹捧意味的会议。这一官方项目涵盖了很多主题，包括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出口控制和投资担保；但是，准确地讲，这一项目的实际议程是一直以来存在的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和中国大陆在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并且还在加剧的贸易顺差问题。换句话说，代表团讨论的重点是中国经济的再平衡问题，这个话题也是很多中国观察员近几个月一直在提出的问题。

但是“再平衡”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何才能取得“再平衡”？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独特和令人难解的经济体之一——此外，如事实发展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按常规的思路思考可能会被误导。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一方面，在过去的3年里，中国的贸易和经常项目的顺差快速增加——2007年上半年大约是GDP的10%，2004年只有3%，2000—2003年大约是2%。另一方面，投资总额占经济的比重在同

期内也有所上升，从本世纪初占GDP的大约35%增加到43%，创下历史新高。

这是50年来经济学家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通常来讲，投资比率的急剧增加会导致经常账户赤字：拿东南亚的例子来说，急剧增长最终造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反之亦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和中国台湾省大量的贸易顺差主要归咎于内部投资比例的减少。这种规律性在世界上很多新兴市场一遍又一遍地得到验证，但是除了中国。在中国，投资率增长和经常项目顺差的飞速增加同时发生。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根据理论，如果两者比率都在增加，那么国内储蓄率势必增长得更快，这意味着接下来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就会降低——而且还是急剧下降。果真如此，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总的消费支出从本世纪初占GDP的60%以上降到今天的50%左右，家庭消费创下了仅占GDP的37%以下的记录。这是整个亚洲最低的比率，也可能是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低的。

很明显，事情不仅仅是这个充满活力、快速发展的大陆国家出现了一点小“紊乱”，从上面陈述的现象中我们可以得出明显的结论，疲软的消费是造成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这意味着，要解决中国国内和外部的不平衡，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来推动消费支出，这是恢复平

衡发展的惟一推动因素。

简要地说来，这是由不同事件得出的一个共同看法。但是，如事实表现的那样，还有很多很好的理由来质疑这种看法，如果更仔细地研究宏观经济数据，事实上可以发现真正的问题出在别的地方。在本文中，我会说明家庭消费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事实上，大量的过度储蓄来源于中国企业在世界其他市场上“抢夺”来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而且，这种不平衡现象是暂时性而非结构性的问题，经济已经开始了自我调整。当然，在消费者金融领域和社会安全网络方面，中国仍需要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但是，这些不是解决目前周期性不平衡的办法。

其他的三个谜团

怎样做才能实现再平衡？我们可以先从考虑以下三个额外的经济谜团开始：

第一，如果家庭支出如此疲软，为什么感觉不到呢？官方的GDP数字显示消费远远滞后于经济总的发展速度，但是能实质上证明消费疲软的也就只有这些数字。自2002年起，零售的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农村消费支出随着食品价格的增长也在飞快上涨，而年度城市小汽车销售量增加了两倍。中国消费者好像也并非处在“受制于杠杆”的状况下，从前10年之初开始，抵押贷款和汽车融资的增加就明显导致了家庭总债务大量增加。

第二，如果中国存在如此之多的过度投资，那为什么利润没有下降？有关投资的数据同样引出了刚才的疑问：投资比率的快速增长连同消费的减少，应该导致企业利润的削减和下降，但是过去5年的官方行业数据却表明企业具有很强的盈利能力。2004年以来，行业边际利润虽然有所降低，尤其是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但是与中国历史水平相比仍旧很高。

第三，如果消费者储蓄暴涨，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这些存款？到目前为止，对这个共同观点的大多数最主要的评论来自储蓄一方。毕竟，真实的消费可能高于官方GDP数字所显示的，而投资可能低于这些数字——但是过去几年内经常项目顺差的急剧增加仍意味着储蓄的巨大增加，任何关于中国经济不平衡的合理解释都必须说明这些储蓄从何而来。

我们只能解释的是，这些储蓄不是来自家庭。银行系统的数据显示，自前10年开始，家庭在存款总额中的比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企业存款比例的上升。这一点得到了基金流量估算值的证实，同时这一估算值也表明，尽管家庭和政府储蓄率普遍较高，但过去5年里，两者比率的变化都非常微弱。实际上，推动中国近几年来“储蓄潮”的实际因素是企业。据估计，自前10年开始，企业总储蓄率暴涨近7个百分点（见图1）。

企业，而非家庭

我们是说过去几年里中国不平衡的突显——贸易顺差的大量增加以及相对于中国大陆已经很高的投资水平而言的国内储蓄隐性的急剧增长——不是疲软的消费引起的。事实上，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国企业和法人机构存款的增加是诱发这些问题的根源。

从理论上讲，企业总存款等于总利润——准确来说，是企业赚取的可用于投资或向所有者分配的所得——企业边际利润依然很高，但是在过去的5年里相对稳定，甚至有所下降。然而，企业边际利润和经济中总的利润额有很大的差别，后者说的是不同的问题。自2002年以来，在关于大型中国工业企业的边际利润和总利润额在GDP中的占比两者的相对评价上存在明显的分歧。总利润额占整个经济的比例飞速增加（见图

图1

新的储蓄大户

企业的总储蓄大幅增加。
(占GDP的比例，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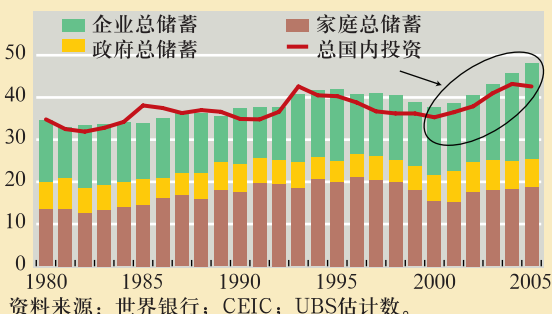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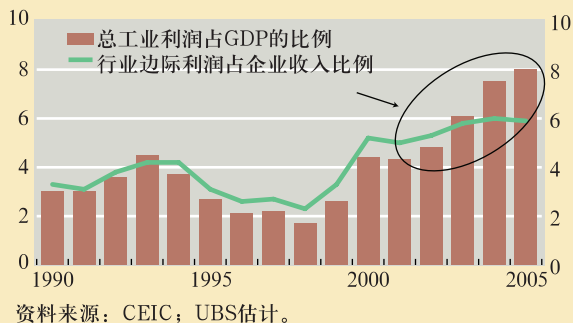


图2

不断增加的利润

大型工业企业的总利润在增加，尽管边际利润并非如此。
(百分比)



2)。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制造企业和服务业的利润,很容易发现企业如何导致了中国的储蓄的暴涨。

是什么导致了过去几年里企业边际利润和总利润的脱节?答案是行业销售量的猛增。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中,产业销售收入和GDP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系,但是,自2002年起,产业销售收入占GDP的比例突然开始猛增,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经从90%增长到令人惊讶的140%(见图3上部分)。更有甚者,这还不是跨境增长;事实上,这种增长几乎全部集中在重工业部门。

重工业生产的增长明显快于国内对工业品需求的增长(见图3下部分)。当然,中国轻工业产品和电子产品的贸易顺差也有所增长,但是对贸易顺差的增长起最大作用的单一原因是重工业部门,像钢铁、原材料、机械和化工这些行业贸易地位的突然转变。

真实情况

就像我们解释的那样,中国经济不平衡的真实状况与消费基本无关,几乎全部是因为大规模的储蓄从国外转移到了中国大陆的企业。因为创造了过度的国内生产能力,重工业企业通过在国内和海外两个市场抢得巨大的市场份额来有效地利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储蓄。所以,与其说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不平衡的反应,还不如说是周期性循环带来的震动来得更准确。

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从2001年到2005年,中国在建筑和机械相关行业的投资方面经历了一个高度繁荣的时期。2004年,随着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国内需求开始下降,按常理来讲,这会刺激这些部门的生产减少,利润降低,但是这些行业的主要企业却能够通过“抢夺”在本地市场海外供应者的市场份额,或者提高他们本身的出口量来消化生产能力的增加。这样一来,进口增长率会大幅下降,而出口会飞快上升——也就是说,贸易顺差会快速增加。发展过热的几个部门的边际利润的确在下降,但是市场份额的增加使得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利润总量上创下了新高,边际利润也比其他方式可能创造的边际利润大,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整个经济中整体企业边际利润份额增加。这揭示了第二个大谜团:尽管投资与GDP的比率创下了新高,但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收入和利润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净出口对总体增长水平罕见的推动作用也是与国内需求相关的GDP上升的原因,从而也“人为地”降低了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这有助于理解第一个谜团:为什么各种消费指数在上升而官方公布的家庭消费比例在下降。

解决再平衡问题的一些通行方法

所以,简而言之,以下就是中国宏观经济不平衡的运行模型:重工业部门周期性的投资过度,通过贸易调整增加市场份额,最终导致国内企业的储蓄上升。现在,以这个模型为基础,可得出多种不同的解决不平衡问题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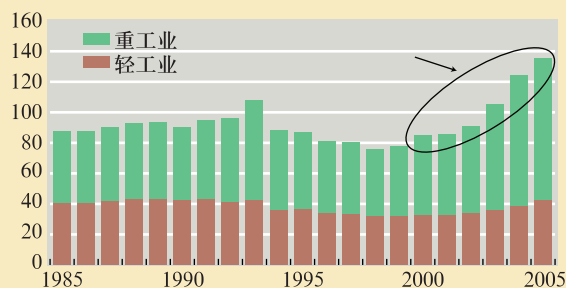
促进家庭更多的消费。这种观点可能是中国分析家和金融出版物中最普遍可见的一种解决方法。但是,这未必就讲得通。以国际的标准衡量,中国家庭的平均储蓄率的确较高,但是较高的结构性储蓄和周期性过度储蓄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较高的结构性储蓄部分是由于家庭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性投资和增长速度较高的主要推动因素。在经济周期中,储蓄率降低将会使平均投资率降低,进而提高结构性的资金回报率,但同时它也将抑制GDP和收入的增长。对中国来说,这是否是最理想的结果,还有待商榷。而且,周期性的过度储蓄更多是企业法人事务而非消费者的事情,现在简单地通过刺激消费来减少贸易顺差,而没有解决目前不平衡的根本影响因素,则会使已经发展

图3

重工业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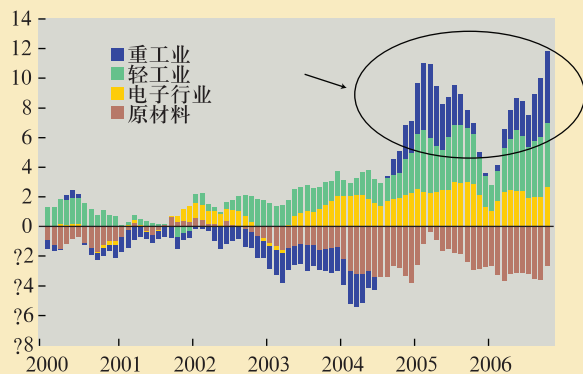
重工业造成了销售量的大幅上涨……

(工业销售额占GDP的比例,百分比)



……这促进了贸易顺差的增长。

(对贸易余额变化的贡献,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CEIC;UBS估计。

过热的经济偏离正常水平。

减少企业和政府储蓄，重新将资金转向家庭。很多经验丰富的经济专家认识到这些误解，并将关注的重点转向解决中国经济不平衡的系统性问题上：减少中

“从理论上讲，大规模进行重新估价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么做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国源于国有企业红利支出带来的过度投资这种结构性倾向，通过银行体系的市场改革引入更加严格的预算审批限制，指导将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剩余资金投入为中国家庭设立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中（见“中国再平衡行动”，第27页）。这才是真正的再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仅可以将政府和企业的储蓄转向家庭，同时也减少了会促进不恰当行为的系统性因素。以上所有办法都已经逐渐被提上了正式的政策议程。但是，还有一个小问题。这些政策本质上都属于长期措施，它们的目的更多是为了防止下一轮周期性储蓄和投资的失衡，而非解决目前遇到的失衡问题。

合并重工业。政府应该立刻采取措施，通过关闭边缘企业，选择一些重工业进行合并的手段来削减行业性生产能力过剩吗？通过减少与需求相关的国内供给和扩大进口，这种方法可以降低企业储蓄水平，并促进贸易平衡。虽然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好主意，但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执行起来没有效果。中央政府曾试图限制新的投资，并将钢铁、铝、水泥、汽车以及其他一些行业中现有的厂商合并起来，但是过去的三年里，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成功的迹象，也没有任何现象表明继续下去会有根本上的变化。

让人民币自由浮动。汇率在中国不平衡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目前理论政策研究中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最普遍的一种观点是，汇率调整作为一种再平衡的手段，中国大陆的外部盈余无疑使其作用变得微乎其微。如果严重的贸易平衡问题反映了结构性的消费疲软和家庭过度储蓄，那么依靠人民币升值来解决不平衡问题的效果就不是很明显。另外一种解释是贸易顺差是因为明显的货币低估造成的，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种解释总的来说也无法合理地说明结构性的货币低估如何导致总的国内储蓄突然大幅的增加。

与这两种看法相反，将不平衡的原因集中在周期性生产能力过剩所起作用的观点解释了中国贸易调整的速度和规模以及总储蓄的大幅增长的原因，同时还阐明了汇率起到的作用。货币低估与过度投资和生产

能力增长的关系不大——但是，人民币的坚挺在促进政府面对目前所处的贸易顺差而进行分析调整时，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促使大家购买海外重工业产品供应商的东西，加速与进口产品竞争的制造商中那些利润较低的厂商的退出，并通过此过程，减少国内企业储蓄。

从理论上讲，大规模进行重新估价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么做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到目前为止，名义汇率的逐渐坚挺没有对贸易平衡或企业边际利润带来任何可见的影响，政策限制也是阻止人民币汇率发生大规模变动的主要障碍。

自然的再平衡

因为不可能实行快速的汇率调整，所以只剩下“真实的”短期再平衡。目前的趋势是未来几年内企业收入和贸易顺差极可能回复到更加可持续的水平，这种趋势意味着生产能力的过度增长将慢慢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净进口需求的恢复，整体GDP增长将放缓。这也就取得了真实的短期平衡。

首先，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在慢慢结束。这不是因为政府政策的缘故，而是正常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利润靠不寻常的强势市场份额在支撑，但是一些重要的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如汽车、钢铁和工业原材料行业的利润仍旧不断下降，从而导致这些行业的投资支出开始下降，这有助于阻止过去5年里启动的建立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的势头。

就像目前发生的那样，贸易顺差应该已经到达了顶点，并最终开始下降，甚至在上面列出的某些行业，中国已经转变成一个净进口国。中国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或替代本土的进口市场份额时会遇到很多限制；多数成功的行业是类似的、商品化的原材料行业，像钢铁、水泥和铝；而另外一些行业，像机械设备，投资和利润受国内条件的影响程度相对较深。

最后一个含义是GDP增长速度的减缓。多数人实质上会赞同这种观点，随着消费的增加，国内支出的增长速度也会加快。但事实是，没有任何一种可行的方法能维持中国GDP以10.5%或11%的增长速度平衡地发展。中国结构性上可持续的实际增长率大约是9%，中国经济必须回复到这一水平。真实的再平衡过程涉及更多的是投资的减少和净出口的下跌，而不是城镇消费的进一步增加，这也是目前为止本世纪最初十年结束时最可能出现的情景。

Jonathan Anderson, UBS（瑞士联合银行）亚太经济主管。

中国的 改革路径

胡晓炼，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快速的经济
发展是以保
持稳定的长
期目标为基
础的。

中国正在发生着一些令人惊叹的事情。仅仅在几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里，城市就变得面目一新，让人认不出了。快速的工业化正吸引着成亿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在传统的春节前后，他们会挤进火车站和汽车站，回家看望自己的家人。而且，中国正迅速地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例如，无数企业如雨后天春笋般在中国东部的各个城市出现，其中许多是外国投资的，它们生产服装、鞋帽、电子设备、玩具和其他许多出口到全球的商品。

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过去30年间，中国的13亿人口享受到了高达9%的年平均GDP增长率，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6年在3.9%的全球经济增长中，中国贡献了0.5个百分点。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有多达4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的束缚。

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世界其他国家自然要十分关注中国是如何应对诸多挑战的，如何确保持续而稳定的发展，如何解决诸如失业、收入差距扩大、投资与消费失衡、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问题的。中国政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政策——重视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加以吸收——并一直密切跟踪全国的发展进程。

可持续发展是首要任务

对中国而言，经济政策所要考虑的首要事项是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普遍繁荣的关键。中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近年来也一直在努力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结果，大大降低了经济的波动性。

2001—2006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9.8%，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农村居民人均净收入年均增长6%。在城镇地区，新增了560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政府增加了在农业、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中国的中央银行通过维护货币的稳定，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货币稳定是其货币政策目标。面对着投资和信贷的过快膨胀，过去一年中央银行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来紧缩银根。自2006年以来，中央银行已经九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五次提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提高存款基准利率。货币政策的频繁微调抑制了信用增长的过度膨胀，并避免了过快收回流动性会产生不良紧缩后果。

更好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改革开放进程,从那时起,政府在很多领域始终如一地开展了多项改革。但是,过去两年,中国的对外失衡,特别是其经常账户盈余,不断增加。为什么会如此呢?问题涉及许多方面。由于中国不充分的社会保障网络、不完善的医疗、教育和住房制度,中国国内的国民储蓄率较高;近几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制造能力的随之扩大也推动了企业出口增加,而国内需求仍然低迷。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主动、可控和渐进的方式向前推进。”

作为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开放的结果,许多年来,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这使得中国在许多方面成为跨国公司的一个重要加工出口基地。2006年,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量在中国全部外贸额中占58.9%,在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占51.4%。此外,领先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表现为长期的低储蓄率、高增长、高消费和高负债,也推动了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这些因素主要是长期性的和结构性的;它们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落实结构调整来逐步予以解决。

在这方面,中央银行已经在以下三个领域采取了多项措施。第一,通过努力发展消费者信贷、完善融资渠道和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进一步加强了金融活动在促进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2001—2006年期间,消费者信贷创纪录地达到年均增长28%。

第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主动、可控和渐进的方式向前推进,提高了市场在确定人民币汇率方面的作用。2005年7月21日,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过去两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9.4%,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资料,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6.3%。

我们启动了多项改革,在人民币汇率确定方面给予市场更大的作用。这些措施包括,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和场外交易;通过引入远期和

掉期交易提高外汇产品的多样性;在银行间现货外汇市场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每日浮动幅度,从0.3%提高到0.5%。

第三,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得以加速,以逐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的可兑换。我们采取了多项措施鼓励企业和个人持有并使用外汇。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使国内金融和资本市场以有序的方式实现自由化。我们还采取了各种手段鼓励资本输出,鼓励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为了铺平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道路,我们已经加强了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控。

路径强调稳定

在实施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中国采取了一种强调稳定的、有序且渐进的路径,这反映了中国需要一定时间去完善市场制度的基础设施这样一个事实,包括法律和规章制度框架、银行制度、会计标准、专业技能和机构能力。

引入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率结构。整体改革战略在改革之初即已确定:首先应放开货币和债券市场利率,随后是逐步放开存贷款利率;在放开存贷款利率的过程中,改革措施应先外币、再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存贷,后短期小额存贷。

自1996年以来,银行间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以及政府债券和政策性金融债券的发行利率已经放开,已经解除了对外币贷款和大额外币存款利率的管制,人民币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已经逐步扩大。2004年,我们引入了中央银行贷款浮动利率制度,取消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今年年初,我们启动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目的是为货币市场确立基准利率。

因此,利率自由化改革以有序且渐进的方式向前推进,这与中央银行提高宏观管理能力、改革金融制度和发展金融市场的目标相一致。这种路径有力地保护了金融制度的稳定,并促进了推进金融部门改革深化的有利环境的建立。

总之,中国将继续通过吸收已有的改革开放经验教训来完善其发展战略。中国将继续努力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以保持可持续的、快速健康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 出口 迅猛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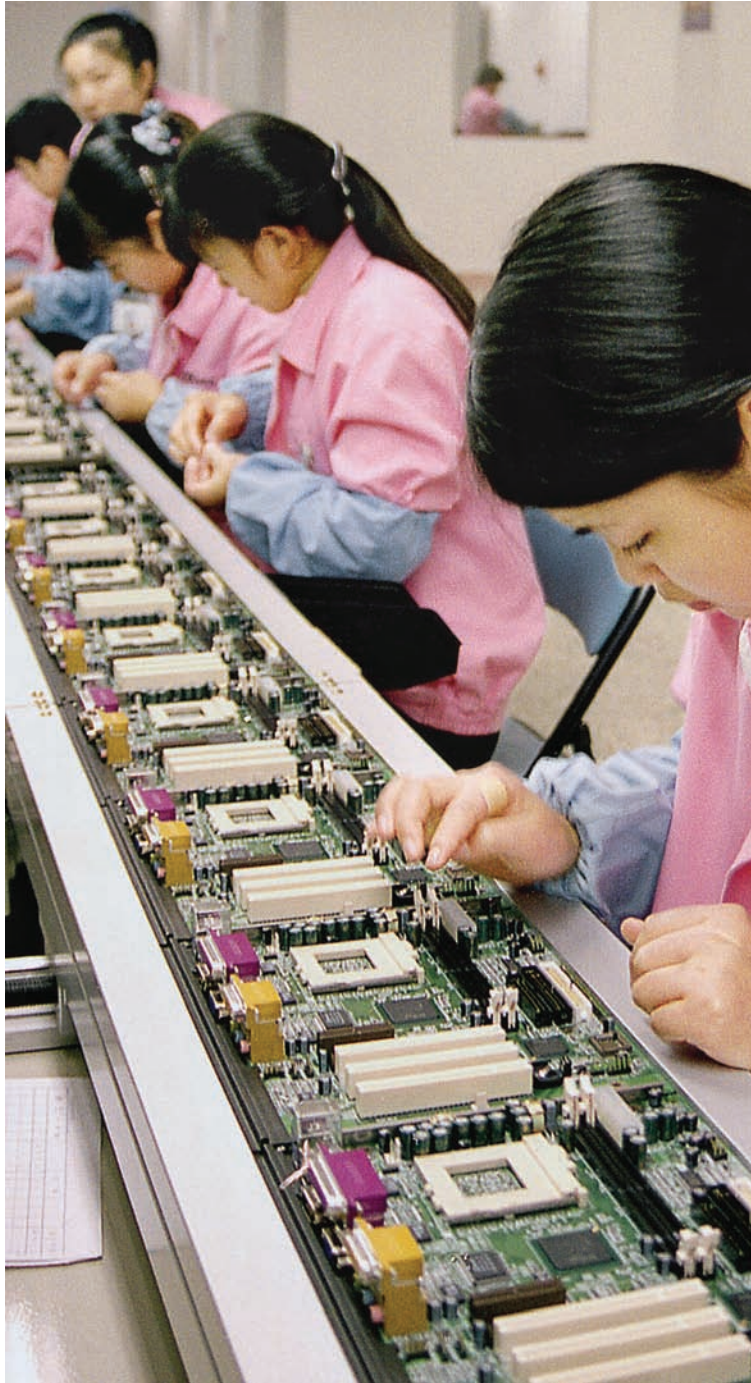
数据显示，中国的出口势头正急速地转向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

Mary Amiti 和 Caroline Freund

过去 15 年间，中国的出口增长了十倍以上，远远超过同一时期世界贸易增长了三倍的速度。结果，2004 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出口国，仅次于德国和美国。这一增长吸引了媒体、学术界和决策者的极大关注，这是不足为奇的。洞察这种增长背后的驱动力将有助于确定中国和其他国家如何从中最大可能地受益。而且，那些希望仿效中国成功之路的国家可以从中发现值得借鉴的经验。

中国是如何实现如此显著地出口增长的呢？最近的一些研究强调了中国出口的复杂性、产品组合的多样化和新产品的增长。如果这些出口产品在生产力上有较高的增长，那么复杂性可能是重要的。通过减轻对特定部门的冲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通过为新的出口机会提供便利条件，多样化可以推动出口的增长。出口新的产品可以促进出口的快速增长，同时降低出口产品的降价压力。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机制，最近我们进行了一项研究，用几种新的方式分解了出口增长。我们的研究显示，尽管出口产品明显从农产品、服装和纺织品



自 1992 年以来，中国出口产品中电子消费产品的份额不断提高。

转变为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中国整体的出口结构变得更加专业化了，而不是多样化了。中国出口产品复杂性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加工贸易——即组装免税的中间投入品。

跨部门再分配

首先，我们比较了 1992 年和 2005 年中国出口部门的情况，以考察中国的出口构成是如何变化的。我们发现，自 1992 年以来，中国的出口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型。农产品和软制造品，如纺织品和服装的份额大幅下降，而硬制造品，如电子消费品、设备和计算机的份额提高了。



我们又将结果作进一步分解，考察了制造业内部的变化。特别是，我们考察了所有重要部门的贸易份额是如何调整的。这些重要部门合计占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70%左右。我们发现，出口产品明显从纺织品、服装、鞋袜和玩具，转变为机械、电子设备和通讯产品（见图1）。

变得更加复杂

转为出口电子和通讯产品，是否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产品技术密集度更高了呢？在过去几年间，一些研究（Rodrik, 2006; Schott, 2006）强调了中国出口产品令人惊讶的复杂性。这些研究显示，中国的出口品更像工业国家的出口品，而不像中国这样收入水平国家的出口品。中国出口品的复杂性与中国强劲的收入增长联系在一起，使得Rodrik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国出口什么产品会影响其未来的增长。其观点是，生产高生产率的产品要比生产其他产品，更好地推动经济增长——计算机芯片好于薯片。

为了弄明白过去十五年间，中国出口增长的技术含量是否提高了，我们考察了中高档技术型出口产品所占的份额——这类产品是技术密集度高于最末20%的那些产品。由于无法获取中国过去有关工业技术水平方面的

资料，我们基于印度尼西亚的资料进行技术密集度评级——印度尼西亚是另一个拥有类似技术的新兴市场国家（我们还使用了美国关于技术评级的资料，结果几乎一样。）我们发现，1992年，45%的出口产品是中高技术产品，而到2005年，这些产品在出口产品中的份额上升到68%（见图2，左柱）。

但是，考虑到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巨大份额，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可能归因于中国进口了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投入品，之后再行组装出口。事实上，当我们不包括加工贸易（见图2，右柱）时，中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份额要小得多。这种结果在较高技术水平产品方面甚至要显著得多，加工贸易占了高技术产业贸易份额增加的全部。

我们还考察了中国进口投入品模式的变化，来

确定加工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是来自国外生产阶段还是国内生产阶段。比较加工贸易所进口的制造业输入品技术含量的变化与非加工贸易所进口的输入品技术含量的变化。我们发现，加工贸易进口输入品技术含量的提高要大得多。这种结果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很可能是由于这些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进口投入品技术含量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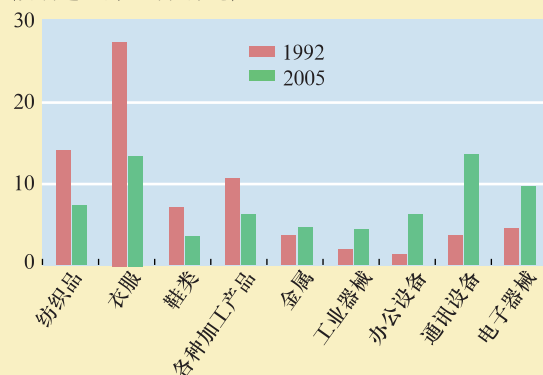
变得更加专业化

近年来，许多政府开始推进更为多样化的出口结构，以期抵消重要部门中的潜在负面冲击。这种方法与一些经济学家，如Hausmann和Rodrik（2003）

图1

趋向电子产品的出口

1992—2005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构成中，高技术产品的份额不断提高。
(占制造业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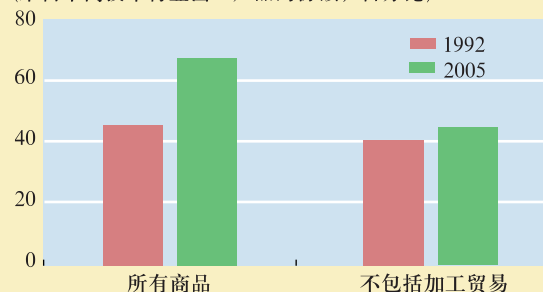
注：如果1992年及/或2005年，一个部门在总贸易额中所占的份额高于3%，则该部门就被定义为重要部门。重要部门大约占制造业出口产品的70%。

图2

提高技术含量

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进口了技术含量更高的投入品。

(来自中高技术行业出口产品的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北京。

的思想相一致。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多的企业家和潜在更大的多样化程度将有助于生产者确定和扩大新产品的生产，而这会使其更具全球竞争力。同样，Imbs 和 Wacziarg (2003) 发现，生产多样化的提高与收入从较低水平的提高并肩发生，这意味着它是一个重要的增长阶段。但是，传统理论强调把专业化的加强作为从贸易中受益的方式：如果每个国家出口具有成本比较优势的产品，世界的产出和福利水平将会提高。

为了确定中国是沿着更加专业化还是更加多样化的方向前进，我们考察了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分布情况。我们发现，尽管中国的出口产品总量在提高，但专业化程度只有略微提高。级次最高的产品的增长尤其显著。前十项出口产品现在大约占总出口额的 25%，而 1992 年前十项产品仅占总出口额的 10%。同样，前 100 项出口产品占贸易额的 54%，而 1992 年仅占 45%。这些结果意味着，如果有什么原因的话，那么正是专业化的提高促成了出口的增长。这与 di Giovanni 和 Levchenko (2007) 近来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他们发现，很多国家的贸易增长伴随着专业化过程。

有利于现有产品

中国现在正在出口新产品吗？近来的研究显示，各国出口产品数量与其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 (Hummels 和 Klenow, 2005)。这意味着，收入增长会导致新的多样性的发展。这与新贸易理论相一致。该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产品数量随着经济体规模的扩大而提高。此外，新产品多样性的提高还有利于出口商，因为它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因产品的世界供给水平提高而产生的出口产品降价压力。相反，传统理论仅考虑随着收入增加，现有出口产品数量上的提高。

为了考察新产品的重要性，我们利用国际产品编码对 1992—2005 年的中国出口增长进行了分解。这是最详细的分解，且跨期可比。由于这些数据太过集中，不能完全确定新产品——到 1992 年，中国的出口产品占这些分类的 90% 以上——我们把 1992 年的出口产品按价值划分为十组，再计算 2005 年他们的出口份额（与 Kehoe 和 Ruhl 2003 年使用的方法一样）。如果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新产品的多样性，低层一组将会有快速的增长，1992 年这一组的贸易额为负。数据显示，按贸易额计算最末 20% 的那些产品在 15 年间翻了一倍以上，而其他组的产品缩小或大体保持不变（见图 3，上部分）。

利用这种计算方法评价新出口产品多样性的重要程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出口产品往往是高度偏斜的——最小的两组占了产品类型的绝大多数，因此认为这两组呈现高增长是很自然的。由于这一原因，我们通过按 1992 年贸易中产品类型的数量把出口产品划分为十组，来更详细地评价这种再分配。例如，当产品按价值排列时，第十组是那些前 10% 的产品价值最高的产品类型。最高一组份额的下降，显示了有相当规模的贸易再分配，但受益的并不是那些低层 50% 的产品。最高组贸易份额的下降，80% 以上是由仅次于最高组的下面四组贸易份额的上升所填补了（见图 3，下部分）。总之，这些结果意味着，出口产品明显再定位的产品是那些按价值排列属于最低 20%、而按产品级次排列属于中高档的那些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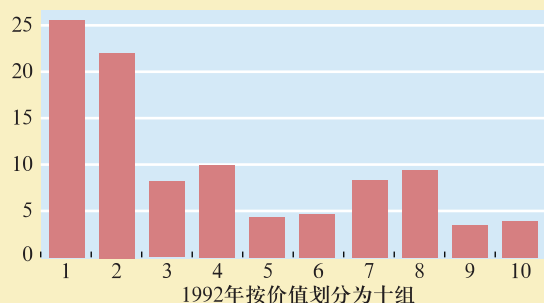
我们还利用来自美国的海关资料做了进一步分析。美国的资料要细化得多，有超过 16000 个产品编码。我们的结果显示，出口增长的大部分——至少 80%——来自现有产品。这意味着出口的增长是由 1992 年已经被出口的那些产品所驱动的。

图3

新产品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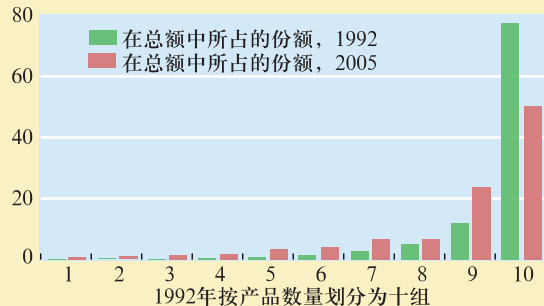
后20%的贸易产品显示了最大增长……

(2005年在总额中所占的份额,百分比)



……但是，在扩张期间出口产品的重新洗牌主要发生在中高档产品中。

(在总额中所占的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北京。

注：HS6位数据，包括5000多种产品编码。

降低出口价格

随着中国对世界市场产品供给的增加，这有可能对这些产品的世界价格产生降价压力，并由此导致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由于我们发现中国出口增长的绝大部分来自现有产品，这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如果新产品不是现有产品很好的替代品，那些产品的区别可能会弱化价格效应。

利用中国在1997—2005年期间向美国出口的那些产品（这组产品的价格数据是可获得且可信的），我们构建了一个平均出口价格指数。它是各类产品价格增长率的加权和，其中权重是各类产品在总价值中所占的份额。我们发现，这期间中国的出口价格指数是0.87，标志着按当期美元计算价格下降13%。相反，同样这些产品从世界其他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出口价格指数为1.06，标志着价格上升6%。因此，这期间中国快速的出口增长似乎伴随着出口价格的下降。

“在中国成立企业的成本是平均人均收入的9.3%，而在拉丁美洲以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要在40%以上。”

中国出口价格的下降与贸易效应的负面性相一致，出口产品的增多压低了出口价格。不过，这也可能与中国生产力的提高、利润空间的下降、或者汇率的变动有关。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展望未来

通过分解自1992年以来中国超过500%的惊人出口增长，我们有许多发现，其中一些可能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帮助。

第一，过去15年中国出口结构的明显转型表明，中国的企业环境相对灵活，使其可以进出不同的部门。在就业弹性方面，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全球商业环境报告》，中国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相当，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包括那些包含工业化国家的地区。此外，在中国成立企业的成本是平均人均收入的9.3%，而在拉丁美洲以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要在40%以上。在这方面，那些试图仿效中国的国家可以学习的一条经验是，必须允

许出口部门随其增长而变化。

第二，我们的结果指向了一个利用中国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并利用目前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正在进行的产品区分加剧的出口部门。加工贸易数量的增加使中国可以通过组装高质量的免税进口输入品，出口更为复杂的产品。在此过程中，许多产品的出口大幅提高，这导致了专业化的加强。这是一个与传统政策建议相一致的传统故事。降低贸易成本，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调整价格，很可能会促进资源流向其生产率最高的地方。实际上，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992年的45%左右下降到今天的10%，这当然也促进了这种转型。

第三，我们发现，中国快速的出口增长伴随着出口价格的下降。这意味着全世界的消费者从较低的价格中获得了更多的实惠。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和收入增长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出口的增长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而出口商的利润最终会受损。未来出口商可能会通过扩大新产品生产并使其产品不同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来抵消出口价格的下降。

Mary Amiti，美国联邦储备局的高级经济学家；Caroline Freun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的高级经济学家。本文所表达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并不必然反映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或联邦储备系统的观点。

参考文献：

- Amiti, Mary, and Caroline Freund, 2007, "An Anatomy of China's Export Growth," forthcoming in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 ed. by Robert Feenstra and Shang-Jin Wei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Di Giovanni, Julian, and Andrei Levchenko, 2007, "Trade Openness and Volatility" (unpublished;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Hausmann, Ricardo, and Dani Rodrik, 2003,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72 (December), pp. 603–33.
- Hummels, David, and Peter Klenow, 2005, "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June), pp. 704–23.
- Imbs, Jean, and Romain Wacziarg, 2003, "Stages of Diversifi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March), pp. 63–86.
- Kehoe, Timothy, and Kim Ruhl, 2003, "How Important Is the New Goods Margi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search Department Staff Report No. 324 (Minneapoli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sota).
- Rodrik, Dani, 2006,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94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Schott, Peter, 2006, "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217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中国不断增长的 对外依存度

Li Cui

中国的经济繁荣与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快速增长的外贸成为中国过去30年骄人经济表现的关键，不过传统的观点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大体是国内驱动的。按照这一观点，中国利用其充裕的劳动力，把进口的投入品组装成低技术含量的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这使其成为世界工厂。

这种加工贸易通常很少对国内经济增加价值，因为出口品中的进口比例较高。结果，有观点认为，全球需求的变化或汇率的变化将几乎不对该经济的贸易平衡或增长产生直接影响——出口的任何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被进口的变化所抵消。

那么，贸易如何促进增长呢？答

案是通过先进技术的转移。对中国贸易的这种讽刺性描述成为许多正式分析和政策讨论的基础，甚至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Shu和Yip (2006)发现，相对价格的变化对中国的出口和贸易平衡效果较小，这种结果促成了中国作为加工中心地位的形成。

但是，对中国经济的这种解读并不能反映当前的现实。尽管它可能描述了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经济，当时中国国内缺少技术知识，不得不依靠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用于生产和出口（见Lemoine和Ünal-kesenci, 2002），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显示，

图片说明文字：上海的一个集装箱港口。

近年来这种描述可能已变得不那么准确了（Cui 和 Syed, 2007）。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比例提高了，其产品变得更加复杂，这部分是由于大量的投资和技术升级，它们已经扩大了该国经济的生产能力。

地区纵向一体化的进展（一家公司拥有其上游供应商和下游购买商的程度）已经促进了全球供应链中中国国内增加值的扩大特别是在非尖端行业。这些发展与产品构成的转变（这种转变可能使出口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更为敏感）一起，意味着，中国贸易平衡和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和汇率变化的反应，比通常我们从历史平均数据所认为或估计的要更为敏感。这种趋势有可能随着中国贸易结构的不断演变而继续。

近观贸易顺差……

过去4年间，中国的贸易顺差猛增，2006年已达到了2180亿美元，占GDP的8%以上，而2000年至2004年期间平均只占GDP的3%左右。这种贸易顺差是由制造部门顺差的猛增所推进的。特别是，机械、电子产品和运输设备占贸易顺差的一半以上，仅仅几年前这些部门还是相当大的逆差。

贸易顺差的扩大主要是由进口的显著下滑所造成的，2005年初进口下滑开始大幅拖累进口增长。相反，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进口与出口的增长通常是同等的，这与中国作为加工中心的地位相一致。中间品进口（包括零部件和半成品）下降得最大，这解释了2003年至2005年期间总进口一半以上的下降，且占了进出口增长率差距的最大部分。这种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并可能正在改变中国在地区生产链中的地位。尽管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继续增长，但过去两年它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传统上是一种抵消，在缩小。这已引起了一些亚洲经济体的关注，特别是那些对中国出口是其近来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经济体。

由于中国国内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其有能力更多地依靠国内来源获得中间产品，进口的下降发生在投资大幅增长期间（见图1）。在一些部门，如钢铁和化学原料，由于商品价格的攀升，2003年和2004年期间投资激增，这产生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而在其他一些部门，如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外国直接投资（FDI）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反映了全球生产网络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更多的生产阶段转移到了中国。例如，仅从中国台湾省转移进来的电子部门的直接投资就从1999年的5.38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4亿美元。许多部门的最终产品出口继续增长强劲，

这反映了国内生产能力的提高——尤其是家用电器、常用机械，以及较弱一些的高技术产品，如精密仪器——尽管其生产中所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的进口近来有所下降。

“随着国内供给的扩大，中国正逐步从简单组装业务转向更大范围地使用国内投入品的业务。”

这些发展凸现了中国在地区加工贸易中地位的变化。加工贸易类型从本质上是由中国海关官员基于税收目的而定义的贸易类型，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它并不限定在低附加值的组装业务上，即所有原料由外国供应商提供。公司可以选择从海外进口全部或部分中间产品（例如，原材料、零部件、附件和包装材料），从国内供应商那里获得剩余的中间产品，并把最终产品再次出口，其中进口的投入品免税。是进口还是从国内获得的决策取决于不同市场中产品的可获得性和相对价格，这类似于常规进口品的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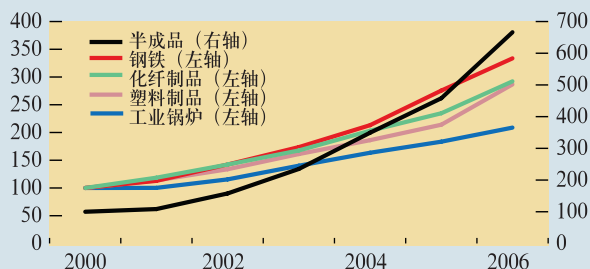
随着国内供给的扩大，中国正逐步从简单组装业务转向更大范围地使用国内投入品的业务。简单组装业务的份额急剧下降，2006年仅占加工贸易顺差的10%左右，而20世纪90年代末曾高达30%以上。相反，后者的重要性却提高了。而且，其边际收益——定义为每出口一美元产品的国内附加值，或者贸易顺差除以出口额——从20世纪90年代的百分之十几提高到去年的40%左右，这与出口品中国内比例的上升相一致（见图2）。

图1

扩大范围

中国增强着其国内生产中间产品的能力。

（国内生产指数；2000年=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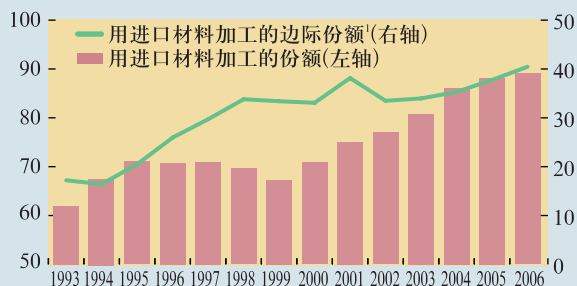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CEIC；中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估计。

图2

更高的国内比例

中国在其加工业务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国内原料。

(在加工贸易总量中的比重, 百分比)



资料来源: CEIC; 中国政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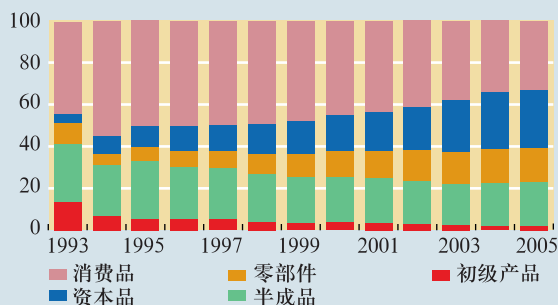
1. 每出口一美元产品的国内附加值, 或者贸易顺差除以出口额。

图3

出口结构转变

中国大幅增加资本品和零部件的出口。

(在总出口中的比重,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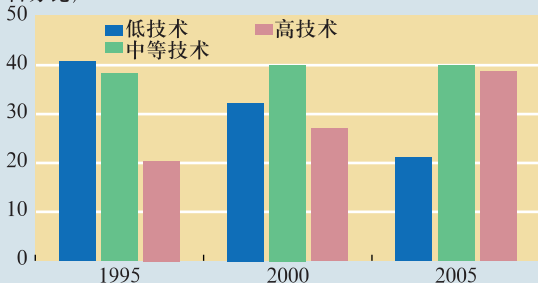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CEIC; 中国政府; 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估计。

图4

技术升级

过去十年间, 中国的出口产品变得更为复杂。

(按复杂性划分的出口产品份额, 在总出口中的比重, 百分比)



资料来源: CEIC; 中国政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估计。

……及贸易构成

对资本品的大量国内投资、可观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以及技术升级, 也已经改变了贸易的产品构成。尽管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包括服装和玩具)一度在中国出口中占据首要地位, 过去十年这些产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20个百分点以上。资本品和零部件出口显著提高, 在总出口中占40%以上, 而十年前仅为10%—15%(见图3)。这种变化指出, 中国的贸易和生产结构正转向更高的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产品。

更广泛地讲, 过去十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明显变得更为复杂了(见图4), 进口产品也是如此。贸易复杂度的一个有用的测量标准是“Rodrik指数”: 每种产品的指数是通过计算该产品各出口国的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值而得出的, 其中的权重是由每个国家所显示的比较优势而确定的。之后, 总体贸易的复杂性指数由各产品的复杂性指数加权平均而得, 其中权重由贸易份额确定(见Rodrik, 2006)。中国进口产品的复杂性要高于其出口的产品, 其出口与进口复杂性之间持久的差距表明, 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国内生产继续依赖于进口(尤其是高技术产品)。

贸易平衡的敏感度

在考察出口产品中国内来源的提高和产品复杂性提高对贸易平衡应对外来冲击的敏感度的影响时, 产生了两个问题。

进口是否已经不与出口相联系了呢? 即人们是否已经预期, 国内生产能力的提高会弱化中间产品进口与最终产品出口之间传统上非常紧密的联系呢? 我们使用分解的贸易数据来考察电子、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中一组分部门的这种联系。样本量大约占中国零部件进口的一半左右。经过专门小组的估算, 通过控制其他一些代表这些最终产品国内需求、以及投入品相对于中国价格的世界价格的变量, 每个行业零部件的进口回归于该行业最终产品的出口。全部样本(1994—2005年)又被分为两个相同的期间, 以评定进口与外国需求之间、以及进口与中国国内需求之间的联系强度是否发生了变化。

结果显示, 全部样本期间, 零部件的进口正相关于同一行业最终产品的出口, 但在统计上, 这种联系仅在这十年的前五年较强。与近年来零部件进口脱钩于最终产品出口这一假设相一致, 后五年在统计上也没有明显的联系。这十年的后半段, 进口投入品

更强地与国内需求联系在一起，这表明中国进口的零部件更多地用于满足国内生产需求（该需求随着国内生产能力的扩大而增长）。

因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要作用是作为组装中心的传统观点不再像以前那样适用了。外部冲击可能会对中国的贸易平衡和国内经济产生更大的潜在影响，因为出口的减速并没有被相当程度的进口下降所抵消。同时，中国的进口受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而不是被直接用作出口产品的投入品。

复杂性是否影响了贸易的敏感度？即产品特征——特别是其复杂性的提高——是否已经影响了贸易流量对总体冲击的反应？我们再次使用分解的贸易数据来捕捉行业内部的潜在产品差异，这与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专业化程度要比行业水平好得多的观点相一致（参见 Feenstra 和 Rose, 2000; Schott, 2004）。用于检验该假设的统计框架是标准贸易模型的扩展，它把进出口与外部和国内需求以及实际有效汇率相联系（参见“为什么是实际汇率？”第46页），同时允许贸易弹性按产品复杂程度不同而不同。

结果显示，在出口方面，如果一种产品的复杂程度越高，那么该产品的出口随国外需求增加而增长的幅度越大，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而带来的出口下降幅度也会越大。在进口方面，如果一种产品的复杂程度越高，其进口随国内需求增加而增长的幅度越大，不过随着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而产生的进口增长幅度会越小。因此，复杂程度的提高也意味着，中国出口和贸易平衡对需求和价格波动的敏感度比过去更高了。

转变角色？

近年来，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这反映在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迅猛的增长。上述分析表明，这种提高的很大部分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其出口产品的国内比例提高。而且，这里描述的两个关键趋势意味着，与通常所认为的状况相比，中国变得更易受到外部冲击的攻击，诸如实际汇率升值或外部需求的下降。这强调了需要尽快调整中国的增长模式，从依靠潜在不稳定的净出口转向由国内需求带动的更具持续性的发展路径。

中国的结构变化也对亚洲内部的贸易流量和地区生产网络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区域性影响。近年来，

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在推进地区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同样十分关键，特别是通过跨国公司作为跨境产业链的组成部分，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发挥作用。事实上，过去十年，中间产品几乎占了亚洲内贸易增长的3/5。但是，随着中国开始在生产链的更多环节实现专业化，中国从该地区进口的中间产品可能会开始下降。

“与通常所认为的状况相比，中国变得更易受到外部冲击的攻击，诸如实际汇率升值或外部需求的下降。”

从亚洲各国的角度来看，这些趋势可能为降低地区间的贸易联系。但是，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张潜力为该地区的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机会，例如生产那些中国在近期不可能由国内生产的高技术产品。这些发展凸现了该地区经济体促进技术创新和推进质量链条的需要。同时，考虑到中国比较优势的演变以及作为结果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东南亚的低收入国家可以取代中国在这些网络中的低端位置。

Li Cui,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的高级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 Cui, Li, and Murtaza Syed, 2007, “The Shifting Structure of China’s External Trad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thcoming IMF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Feenstra, Robert, and Andrew Rose, 2000, “Putting Things in Order: Trade Dynamics and Product Cycl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2 (August), pp. 369–82.
- Lemoine, Françoise, and Deniz Ünal-Kesenci, 2002,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e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Process,” CEPII Working Paper No. 2002–02 (Paris: Centre d’é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ations internationales).
- Rodrik, Dani, 2006,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94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Schott, Peter, 2004, “Across-Product Versus Within-Product Speci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9, pp. 646–77.
- Shu, Chang, and Raymond Yip, 2006,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Movement on the Mainland Economy,” China Economic Issues No. 3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为什么是实际 汇率？

Luis A.V. Catão

如何确定一种货币是否根本上被低估或高估呢？这也是国际经济学、许多贸易争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监管工作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乔治·索罗斯曾于1992年对此问题给予了回答。他成功地对英镑投下了10亿美元的赌注，从而开启了一个大规模货币投机的新时代。索罗斯和其他货币投机商认为英镑被高估，在他们的阻击下，英国货币崩溃，最终导致英国退出“欧洲汇率体系”——欧洲共同货币“欧元”的前身，并从此再也未能重返。

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索罗斯与其“志同道合”的货币投机商再也未能重演这次“漂亮的行动”，而且经济学本身缺少一种确定货币汇率是否合适的有效方法。这一事件发人深思，并使人们认识到在经济运行中，汇率是一种重要的价格，而有一种措施可能能够回答这一问题并有大量数据证实：实际汇率。

到底值多少钱

大多数人对名义汇率非常熟悉，即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的比值，通常以其国内价格来表示外国货币。因此，如果一个美元持有者用1.36美元购买1欧元，那么从欧元持有者角度来看，汇率就是0.735。但名义汇率并不能解释事情的全部。个人或公司对于收购货币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感兴趣。他们持有美元好还是欧元好呢？

这就是引入实际汇率的原因。在名义汇率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实际汇率用于衡量一国商品相对于另外一国、一个国家集团或世界其他国家商品的价值。

人们可以用一种有代表性的单一商品来衡量两个国家之间的实际汇率，如“巨无霸”汉堡包——在许多国家麦当劳餐厅都有售的几乎完全一样的汉堡包。如果实际汇率是1，在以同一种货币表示价格的情况下，这种汉堡包不管在美国还是德国的价格都应该是一样的。可

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巨无霸”在美国需要1.36美元，在德国需花费1欧元。在单一产品国家（价格与汇率相当），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和欧元相当并且实际汇率为1（见专栏）。在此情况下，经济学家称为绝对购买力平价。

但如果汉堡包在德国售价1.2欧元，那就意味着在欧元区购买该汉堡包将多花费20%，表明欧元相对于美元被高估20%。如果实际汇率不正常，即当价格为1.2欧元时，名义汇率将面临调整的压力，因为在一个国家能够比在另一个国家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同样的商品。

这使收购美元更划得来，在美国以相当于1欧元的价格用美元购买汉堡包，然后再以1.2欧元的价格卖出，利用这一价格差赚钱被称为套汇。套汇者期待美元会升值，名义汇率会增加，因此收购美元购买汉堡包，然后在德国进行销售，直到德国汉堡包的价格和美国相当，即实际汇率重新变为1。

在真实世界中，会有许多成本问题妨碍直接的价格比较，如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但基本观点是，当实际汇率偏离时，货币将面临调整的压力。如果货币被高估，那么将面临贬值的压力；如果货币被低估，将面临升值的压力。如果政府政策阻碍了正常的汇率均衡，事情将变得更为复杂，这是在贸易争端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高估还是低估？

当一个国家不只销售一种产品时，如何比较购买力呢？为进行比较，经济学家们通常会根据“一篮子”商品来度量实际汇率。由于“一篮子”商品的价格通常采用指数形式，如消费价格指数（CPI）——该指数不仅包括商品价格，还包括服务的价格，因此实际汇率一般以指数表示，这一指数可作为所选取任意时间段的基准。再以美元和欧元为例，如果实际汇率指数为1.2，相对于选择的基准而言，欧洲的平均消费价格比美国高

20%。指数不能度量绝对价格（如“巨无霸”汉堡的价格），但能够度量整体价格相对于基准年的变化情况。例如，如果2000年指数为100，2007年指数为120，那么2007年的平均价格比2000年高20%。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一段时间内各国之间的实际汇率没有改变，我们称为相对购买力平价。

两国之间的实际汇率指数是重要的。美国对中国巨额的贸易逆差已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汇率定值不当是否是导致美国对中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仍是争论的焦点。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度量货币整体上定值是否准确时，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更关注实际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是一个国家和它每一个贸易伙伴国之间双边实际汇率的平均值，以各自占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份额来度量。作为平均值，当相对于一个或更多贸易伙伴货币被高估，而相对于其他国家被低估时，一个国家的有效汇率可能是“均衡”的（未显示出整体上定值不当）。

为了解货币何时被错误估计，以及如果被错误估计了，错误了多少，可以通过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粗略的评估。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汇率均衡，不管是绝对购买力平价还是以相对购买力平价计算，实际有效汇率都不会发生变化。但由于消费模式将比市场统计员所假设的变化快，因此贸易政策、关税和运输成本所造成的实际有效汇率偏离并不一定表明定值不当。

然而，尽管运输成本和关税在过去一个世纪急剧下降，而且国家的消费篮子日益趋同，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加剧。一个世纪前，发达经济体的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保持在30%的幅度内，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却达到80%左右，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

经历。

坚决呼吁

但并非所有大幅度的实际有效汇率波动都应被视为定值不当的标志。一些大幅度的实际有效汇率调整非常平稳，这表明除运输成本、检验和关税之外的其他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使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保持在正常的浮动范围内。

导致一般贸易商品（可贸易商品）生产率增长的技术进步，被认为是这些因素之一。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并导致生产率水平更高国家的类似可贸易商品的价格降低，并通过国际竞争使各地可贸易商品的价格进一步降低。但并非所有商品都是可贸易商品。非贸易

易部门，如房地产和许多私人服务业所面临的国际价格竞争最小，因此相对于那些非贸易商品，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将下跌。非贸易商品在国家消费篮子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国家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相对于国际消费者篮子将有所增加，因此

其实际有效汇率将有所上升。这一机制通常被称为“Balassa-Samuelson效应。”大量关于实际有效汇率在不同国家间变化的理论和数据，能够解释非贸易商品相对于可贸易商品的价格波动，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贸易条件（如石油生产商通常经历的）的不断变化以及财政政策、关税甚至金融发展上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实际有效汇率在各国之间存在差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分析家在评估“均衡”实际有效汇率时，将实际汇率的基本原理考虑进去。事实上，在没有出现定值不当的情况下，真实的实际有效汇率将围绕均衡实际有效汇率波动。

评估均衡实际有效汇率可能较为困难，这是因为价格在短期内是固定的，而名义汇率则并非如此（至少在那些由市场决定汇率的国家是如此）。因此，实际有效汇率在应对新的和混乱的贸易活动时，通常表现出相当短暂的不稳定性。并不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许多市场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使事情变得更糟，从而导致错误定值，并造成灾难性后果，如1992年的ERM危机。尽管实际有效汇率可能并不完美，但在面对许多即将到来的金融危机时，实际有效汇率对大幅度汇率高估发出了信号，这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监控双边实际汇率和多边实际有效汇率的机构非常重要。

Luis A.V. Catão, IMF 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

“尽管实际有效汇率可能并不完美，但在面对许多即将到来的金融危机时，实际有效汇率对大幅度汇率高估发出了信号。”

实际汇率是什么？

两种货币之间的实际汇率是名义汇率（如美元和欧元的比价）和两国价格比值的乘积。其核心公式是：实际汇率 $=eP^*/P$ ，在我们的例子中， e 是欧元和美元的名义汇率， P^* 是欧元区商品的平均价格， P 是美国商品的平均价格。

在“巨无霸”汉堡的例子中， $e=1.36$ ，如果在德国的价格是2.5欧元，在美国的价格是3.4美元，那么 $(1.36) \times (2.5) \div 3.4=1$ ，即实际汇率为1。但如果德国的价格为3欧元，美国的价格为3.4美元，那么实际汇率为 $1.36 \times 3 \div 3.4=1.2$ 。

帮助全球经济 保持健康

IMF采取了新的框架以监控各国经济业绩

Carlo Cottarelli 和 Isabelle Mateos y Lago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说，一个国家不可以成为孤岛。一个国家的决策往往会对其邻国产生影响。而大国所施行的方针政策更是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如今，这种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不断增强，资本市场具备了以非同寻常的速度放大和跨国传播经济动荡的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动态过程是良性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经济力量的威力，它完全有能力造成跨越国界的大范围浩劫。危机像野火一样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而那些受到牵连的国家在一开始总以为自己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直到灾难真正降临。尽管已经意识到这种全球性的动态变化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国家决策者应对这种动态变化的能力却先天不足。

这就是IMF应运而生的原因所在了。IMF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经济大萧条是二战爆发的根源），试图利用该组织来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该机构创始人尤其热切希望能够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正是这种恶性贬值加剧了危机，并使其在全球范围传播。直到今天，预防竞争性货币贬值这个基本目标仍然成立，汇率又一次成为国际社会争论的热门话题。而为了应对国际金融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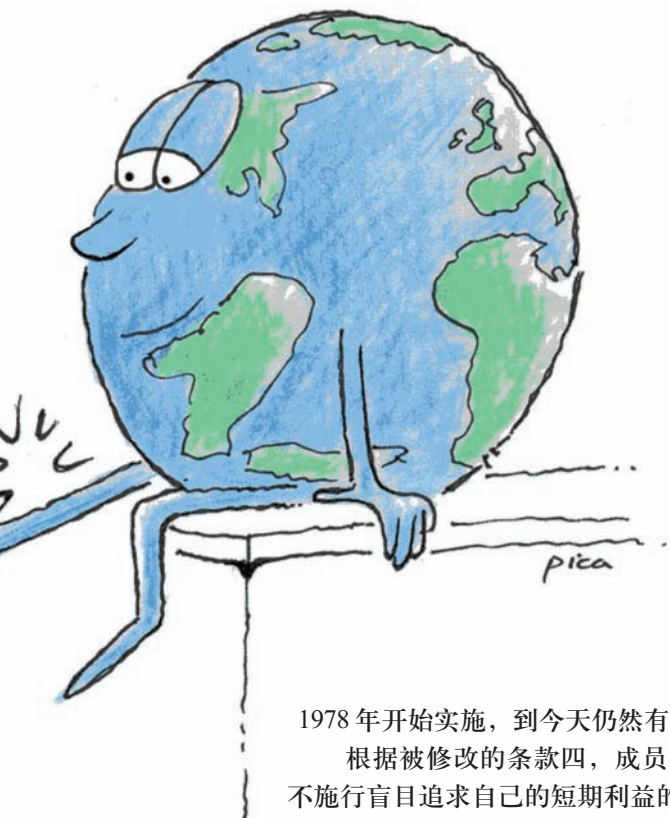
贸易新形势，IMF用以促进全球经济稳定的手段也有了新的发展。

在最近几十年，IMF一直被看作全球金融的救火队员或者强心剂。但是，对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已经是最后迫不得已才会使用的手段。如今，IMF的运作模式正在经历全方位的重新检验，以保证能够继续履行其维持国际金融稳定的核心任务。

一条通用的行为准则

1945年，IMF的工作重点是防止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造成了巨大损害的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再次发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个目标是通过相对固定但可以调整的汇率来实现的。这种汇率制度是成员国加入IMF时被鼓励去遵循的原始行为准则的核心部分。只有得到了IMF的允许，汇率平价才能发生10%以上的变动。当美国于1971年打破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了。因此，必须重新协商出一套新的行为准则。商议的结果就是修改IMF协定的第四条，这条被修改的条款于





1978年开始实施，到今天仍然有效。

根据被修改的条款四，成员国承诺不施行盲目追求自己的短期利益的政策，不漠视所采取政策对邻国以及自身长久稳定的影响。特别是，新的行为准则鼓励成员国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合理的价格稳定和金融环境的有序化。新准则还要求成员国不能为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而操纵汇率，比如说通过货币贬值来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新准则同时还号召成员国执行与维持国内外稳定目标相协调的汇率政策。

至于IMF自身的职责，修改后的条款四要求IMF评估各成员国的政策是否与行为准则相一致，并对它们的经济政策给出建议。这个过程被看成国家之间的相互监督，而且不论国家的大小及其经济健康状况，对于各成员国都适用。条款四同时也要求IMF监视国际货币体系的机能，以保证它的高效运转。这种要求被看作是一种多边的监督。

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通过其监督职能，IMF可以提供有关成员国经济运行状况的专业评估报告，并识别出可能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稳定的风险。这些分析被打包成政策建议并写成报告，在与各成员国决策层进行高级别会谈时传达给他们。这些报告大多数都可以从IMF的官方网站上获得。当然，也还有许多其他来源的评估报告和政策建议，但是IMF提供的报告和建议具有其独特的比较优势。这些优势包括能够接触到各经济体的决策层，能够获取进行透彻分析的所需要的所有数据；具有一个不存在国别、

政治、商业偏见而且反映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视角；有能力吸收利用大量相关知识，这些知识不仅仅包括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全局把握，而且还包括185个成员国多年经验的积累，而这些经验能帮助人们决断出哪种政策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能取得最佳效果。

这个监督过程给了成员国彼此间评价对方经济政策的机会，而成员国们显然都能够从相互提意见的过程中得到好处。IMF执行董事会中的24个执行董事代表了所有185个成员国。执行董事会的见解和观点会在每次执行董事会会议结束后传达给各国政府。

聚光灯下的监督

一般来说，相对于外部融资一揽子计划和附加在某些贷款上的惹人争议的政策条件性条款而言，IMF的监督工作较少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在最近几年，各国的外部融资需求减退了，从而把监督职能推倒了聚光灯下。人们在仔细审查了IMF的监督职能以后，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共识：IMF的监督职能在其效力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其中一些挑战是长期存在的，而有些则是最近才出现的。

劝导。IMF的监督职能基于对成员国的劝导和说服，这种劝导是通过对话和施加适当压力来实现的，而不以进行处罚为手段。因而，这种监督缺乏“杀伤力”，以致IMF支持的计划会受到政策条件的制约。许多观察家都质疑，在合适的执法机制缺失的情况下，IMF的监督职能是否真正有效。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杠杆作用。IMF还受到人们一种看法的困扰：IMF对一些成员国提供的帮助比另外一些成员国更大。这种偏袒既反映在不同国家求助于IMF时，获得帮助的可能性大小不同；也表现在不同国家对IMF给出的关于它们未来进入金融市场的建议具有不同的敏感度。同时还存在这样一种相关的顾虑，IMF不能在大成员国和小成员国之间做到公正平等，一视同仁。不管这些看法是否合理，这些看法的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本身对于该机构的效力就是一种挑战。

更高的期望值。世界发生了改变，IMF的监督职能必须跨越更高的门槛才能获得更大的价值。比如说，它不再在提供宏观经济分析和建议方面具有垄断地位。如今，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活跃在市场上，决策者们手里拿着新鲜出炉的经济发展报告，身边围满了一群随时可以提供建议的专家。尽管在20年前，许多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必须依赖于外部建议。但是，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发展起了自己的智囊团。此外，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数量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如欧洲联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这两个组织允许其成员国在许多来源不同的多边政策建议中做出选择）。世界经济本身

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革,其中最为显著的发展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巨大扩展和随之而来大量资本的跨境流动。尽管世界经济的发展为各国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但同时也给经济稳定带来了许多新的风险。由于这些风险本身的复杂性再加上缺乏足够的相关数据,它们很难被清晰地诊断出来,因而也很难得到有效化解。

采取行动

所有这些挑战都增加了IMF调整监督职能以适应21世纪新形势的紧迫性。让监督变得更有效率是IMF中期战略的核心目标。这个中期战略由IMF总裁罗德里戈·拉托于2005年4月提出,它涵盖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改革的范围包括从内部管理到对外贷款等等多个领域。而与监督职能有关的改革集中在如何确立更清晰的目标,如何提供更好的建议,如何更有效的提供咨询等方面。

更清晰的目标。IMF第一批改革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正反映了最近几年许多国家在进行公共部门改革时所提出的理念,那就是,清楚地阐明希望实现的目标有助于提高效率和责任感。这种提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把精力集中在那些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二,允许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监控改革的进展状况。具体到监督职能的改革,这种明确发生在以下几个层面:

- 在最高的层面上,IMF在不久前通过采用一套新的双边监督决议来代替已经使用了近30年的旧协议,完成了对其政策框架的更新(那套旧协议曾经与条款四一起为IMF的监督职能提供了主要的法律基础,见专栏)。IMF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其行使监管职能过程中的最佳做法,包括其中的内容进行了清晰而具体的阐述,这份阐

述文件得到了其所有成员国的签字认可。

- 在较低的层面上,IMF一直在考虑引入对在一定时限内优先实现的监管目标的陈述(以三年为限已经作为一种可能性被提出),以便能够集中精力,明确责任,更好地将双边监督和多边监督融合在一起。这些优先实现的目标将既包括业务目标(如提升IMF对汇率问题的分析能力),也包括经济目标(如致力于缓解当今全球发展不平衡状况)。

- 在国家层面上,IMF最近提出了几项监管议程,一份需要在以后三年通过监督措施来帮助实现的优先目标目录,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工作计划。

更好的建议。第二波改革旨在提高IMF在一些核心领域的分析能力,所谓的核心领域包括汇率政策与发展、跨境溢出效应、金融部门监管以及对新兴市场国家弱点的评估等等。多项先导措施已经开始施行了。

汇率分析一直是IMF关注的焦点。IMF下设的独立评价办公室组织的一项研究于1999—2005年之间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里识别出了一种效力差距。这种效力差距指的是对于汇率水平不够完备的分析、在讨论实际汇率制度时尚待提高的清晰度、对溢出效应和协调问题的关注不够充分等等。中期战略还将注意力集中在汇率分析能力的提高上。而事实上,在独立评价办公室的报告发布的时候,IMF已经开始着手在上述这些需要改进领域加强对汇率的监管了。

许多努力都已付诸行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用以评估汇率定值不当的程度的分析工具的加强。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从基于一种多边分析框架的汇率评估体系中受益。

其他领域也在不断取得新进展。分析工具越来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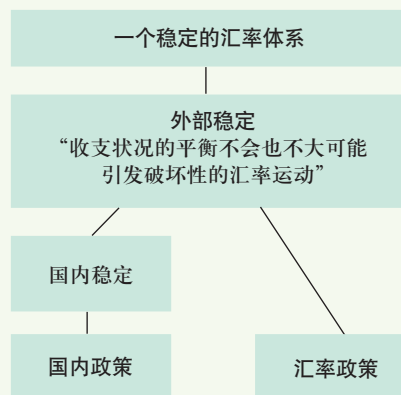
一个新的监督框架

作为强化其监督框架行动的一部分,IMF执行董事会于2007年6月通过了一项关于双边监管的新决议,以取代30年前生效的旧决议。

这份新决议第一次全面阐述了IMF的监督政策。通过阐明最佳监督手段的预期目标,这份新决议确保了IMF与其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对话更富有针对性,更富有成效。新决议为各国对自身经济状况进行常规的“健康检查”提供了一个最新的更全面的框架,并鼓励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国家。新决议再次申明,对各国的监督要聚焦在评估各国政策是否能促进外部稳定上。新决议还清楚地说明了在制定汇率政策这个问题上,哪些做法是可以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哪些做法是不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这些说明包括给出了汇率操纵的明确定义,指明了在哪些情况下成员国需要与IMF进行协商。

明确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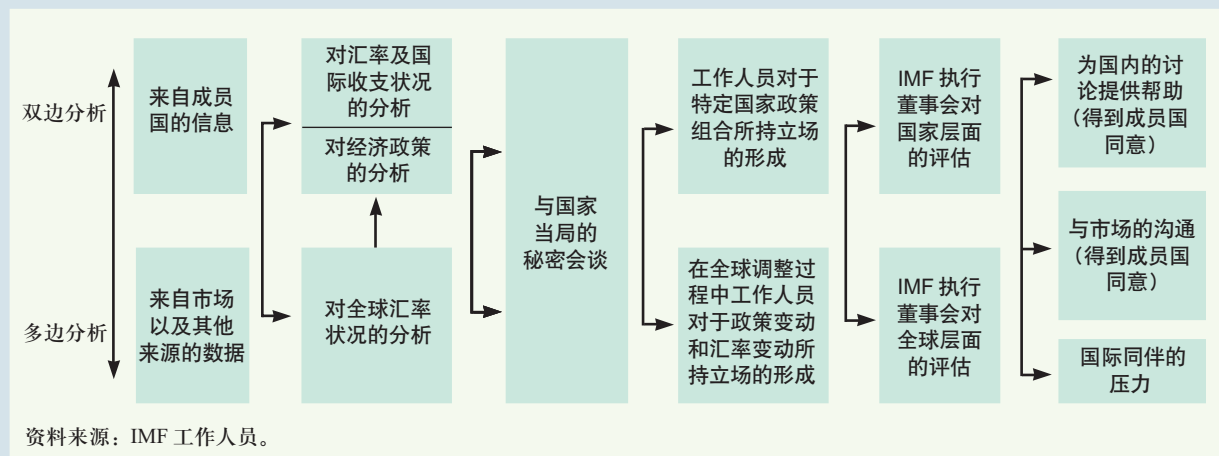
新协议清楚地说明了各成员国应该如何运行其经济政策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

如何运作

IMF 对其成员国政策的分析既会从全球整体状况出发，也会考虑到各国特殊情况。



地被应用于反映跨国溢出效应——一个国家的政策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另一个国家。分析工具同时也被改进，以便更好地把针对金融部门、资本市场的分析融合到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评价中去。这些新方法使得IMF在评估金融部门对整个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时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同时也使它有办法评估来源于地位日益突出的金融部门的多方面风险。此外，IMF工作人员用以评定新兴市场潜在缺陷和风险的方法论基础也得到了修正。

更好地提供咨询建议。改革的第三项涉及IMF与各国决策层之间的互动。这项改革目前最大的进展是引入了多边磋商机制。IMF以前就拥有多边监督工具，包括半年出版一次的《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这些主要都基于IMF自己的研究，而并没有包括与各成员国针对具体政策所进行的深入探讨。但是，一些问题和它们的解决手段会同时牵涉到许多国家。

这个多边磋商体制为各国商讨涉及全球或地区利益的事务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论坛。这些对话增进了各国对于世界所面临的难题的理解，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IMF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为讨论提供便利，并给予技术支持，包括鉴别不同成员国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和矛盾之处。第一次多边磋商于2006年举行，议题涉及全球收支不平衡问题和中国问题。这次磋商的成果是2007年4月各参与国签署的一项共同声明。在声明中，各成员国都承诺实施一系列政策来缓解全球收支不平衡状态。IMF也保证加强其常规监督工作的执行力度，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另外一些相对比较普通但在实践中同样重要的改革也正在进行当中，它们将影响到通过IMF的成员国进行的监管。通过和各国官员的闭门会谈，IMF增强了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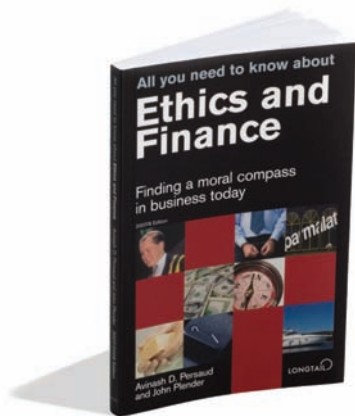
影响力和沟通能力，确保了监管信息通过各种各样可能途径渗入到成员国国内政策商讨过程中去。在一些更有针对性的磋商会议中，各参与国深入讨论数量很少的几个议题，以求得到一个更为透彻的分析结果。

结 论

各个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当中，以使IMF的监督职能可以适应当前形势，并确保IMF能够继续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作用。这些改革能让IMF的监督职能具有解决世界经济中的所有难题，保持世界经济长久稳定的能力吗？当然不能。不管其给出的分析和建议多么高超微妙，IMF都不能掌控最终决定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政策杠杆。但毫无疑问，这些改革是十分及时的——全球经济环境处于良性状态，这给了IMF退后一步重新思考其运作方式一个难得的机遇。

这一系列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是IMF处理事务方式上发生的改变已经清晰可见了。我们希望，这些改革最终能够有助于使IMF提供的建议保持很高的针对性，并广受追捧，我们也希望IMF的声音能被人听见而且予以重视。倘若IMF能调整自身来适应全球经济的需求，并保持对最高标准分析能力和沟通能力的追求，其监督职能必定能够在促进世界经济更为良性运转方面做出独一无二而且至关重要的贡献。通过以上这些，IMF可以使其成员国继续保持对多边主义精神的信赖——而正是这种信仰的力量在当年推动了IMF的建立。

Carlo Cottarelli, IMF 政策制定与检查部副主任；
Isabelle Mateos y Lago, IMF 政策制定与检查部副处长。



Avinash D. Persaud 和 John Plender

道德规范与金融

寻找当今经商的道德规范

Longtail 出版公司, 伦敦, 2007年,
215 页, 19.95 英镑 (平装)。

金融市场经常沉湎于这样一种境界: 任凭利己行为的主宰, 而参与者只认同一个价值——金钱。每一个投资人都想得到最高的回报, 每一个银行都想得到最高的股利, 分析家和商人都想得到最高的奖励——每一个人都想这么做, 而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然而, 金融市场犹如社会本身一样, 都要依存于共享的道德标准。尽管总体上说人与机构应自愿进行自我约束, 但书面的法规及其执行仍然是必要的。即便在机会难得之时, 人们也不该做那些连自己都感到不道德的事。

Persaud和Plender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操作指南, 它鼓励投资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去遵守道德标准, 去认识什么行为会引起道德冲突。作者含蓄地避免了哲学家式的抽象, 直接指出道德行为本身既非常重要, 也是市场运作的基础。作者还认为, 道德行为也符合金融机构和涉身其中的个人利益。尽管道德规范和赚钱之间的

矛盾短期来看是尖锐的, 但如果用长期的眼光——即道德行为中包含的信誉风险以及维护在市场参与者中的高度信任的重要性——来看, 这种矛盾就不那么尖锐了。

Persaud和Plender用不同的章节来论述具体的道德冲突, 这种冲突可能会产生于投资者保护、投机活动以及会计等领域。作者还在不同章节中讨论了独立主管人、审计师和管理者的作用。作者关注于金融市场中的道德规范, 而并不致力于解决诸如雇员待遇等相关的问题。他们通过引证金融市场中众所周知的有关不道德行为的最新案例, 详尽阐述了他们的观点, 并引证了一些摘要以及金融市场参与者可能时而自我提出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在此类书中这还是第一次。的确, 作者在字里行间要说明的似乎是这一观点, 即只要采取恶劣行径的人哪怕稍稍停止一下这种想法, 许多恶劣行径都是可以避免的。

“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都必须认识到用规章制度取代道德规范的危害。”

作者主要关注的并且明晰地传达的信息, 主要是对利益冲突的关切。在这种利益冲突中, 一个行为主体利用了他或她必须为之服务的人的优势。他们提出了衡量道德行为的其他标准, 诸如其他人是否被置于一个谋划好的劣势中, 或者是否遭受未加防范的危害等概念。这些概念在本书中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除此之外这本既没有浮华的辞藻又不流于

过于简化的著作对其他观点的阐述都很清晰。我所理解本书提出的方法是, 金融市场参与者不应该给那些并不关心交易, 或者不能合理地通过自我保护来避免危害的人带来较大的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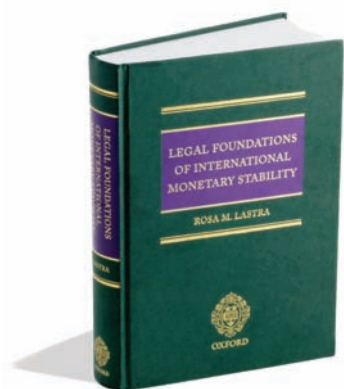
本书向决策者, 尤其是金融部门的规章制定者和监管的决策者传送了一些信息。首先, 规制者自身必须通过诸如避免或明或暗的“操纵”规章制度以维护道德标准。也就是说, 他们不应从监管部门的利益出发而应从大众的利益出发来行事, 从而不必感激那些制定规章制度的人。

其次, 规章制度制定者必须下大力气确保金融机构内部的激励手段符合所承诺的道德规范。许多道德失误产生于金融机构的雇员受到会带来利益冲突的激励(或者出于他们自己的动机)之时。尽管涉及公司董事会或高管层的不道德事例令人震惊, 但也有些地位较低的雇员受到激励去欺诈顾客的事例。

第三, 而且也许最成问题的是, 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都必须认识到用规章制度取代道德规范的危害。新增加的规章制度一般都是涉及不道德行为的丑闻所催生的产物。这不仅将会增加规章制度负担, 而且也会使市场参与者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规章制度以及公司负责道德规范的官员, 而不是依赖他们对于是非对错的感觉行事。金融市场的玩家喜欢抱怨“规章制度过头”, 但是, 只要他们对自己的道德行为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就没必要制定那么多规章制度。如果这本书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就达到了一定的目的。

Daniel Hardy
IMF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
副处长

佳作欣赏



Rosa Maria Lastra

国际货币稳定的立法基础

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2006年，600页，199美元（精装）

Rosa Lastra 写出了一部有关国际金融管制的精辟的、可读性极强的著作。本书值得律师、经济学家、金融部门的专家、决策者以及也许所有那些对不同的行为准则的相互关系感兴趣的人们一读。

本书的结构考究。第一部分聚焦于国家层面，论述了国家中央银行货币职能和管制职能的发展。第二部分转向欧洲地区层面，分析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包括欧洲区域内的欧洲中央银行和国家中央银行的复杂结构。第三部分聚焦于国际层面，尤其是IMF的作用，从历史背景着手，用Lastra在本书每一部分中所使用的同样的方法，强化了对比分析，然后转而对机构框架进行了深入分析。从金融监管、管制和危机控制的角度，对金融架构的评价使本书达到了高潮。

中央银行权利的局限性

本书各个部分的出发点都是值得注意的。在第一部分，Lastra

大胆地从这一认识着手，即尽管中央银行的法定目标包括稳定价格，但银行还肩负着管理职能，尽管这个职能最好是通过使其业务最大限度地（但理念上不应完全）独立于政治影响来履行。对问题的这种提出方式为论述这样一个主题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其责任性之间表面上势不两立的紧张状况，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个过时的论题。但是，尽管作者力图将发展中的和新兴市场的经验引入到讨论的某些方面（例如在她论述到货币局和银行业危机时），读者可能会从更系统性地对这些经济体中央银行的实务比较中获益更多。

在第二部分，Lastra描述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是如何在欧盟的宪法和行政管理背景下运作的。她通过利用货币发行来进一步展开货币主权这一主题，为引导她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分析基准，否则的话读者可能要面对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制度框架所面临的挑战。

理解IMF

本书的第三部分聚焦于IMF。Lastra熟练地驾御着在对涉及到IMF的立法与规章管理框架进行解释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IMF)独一无二的性质，它的大多数职能与业务的经济特性，它的业务活动和金融结构的风格而不是所使用的术语的晦涩……以及为理解这些业务活动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传统上只有IMF的法律顾问和极少数敢于冒险来研究IMF的学者才具备这种知识），说明了处理公共国

际货币法律中的复杂问题的学说体系还相当薄弱。”

“Lastra的著作确实传递了有关IMF角色演变的争论的信息。”

尽管IMF在过去20年中在出版内部文献方面走在了前面，但外部人士对其法律框架的了解至少仍然较为粗略。作者利用与IMF法律部长期进行的专业协作的优势，耐心地引导读者越过了一些为普通人所误解的法律问题：例如，IMF及其成员国在监管方面的法律义务，为什么备用安排不是契约，IMF融资条件的法律基础。值得注意的是，Lastra历史性地阐述了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从“汇率稳定”的国际监管者到“汇率稳定体系”的引导者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与最近修订的IMF监管成员国汇率政策的业务框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Lastra的著作确实传递了有关IMF角色演变的争论的信息。

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的机构制度的法律基础固然重要，但是人们常常忽略了货币和规章体系职能方面的问题。《国际货币稳定的立法基础》由于深化了我们对这些关系的理解而取得了巨大成就。

Thomas Laryea
IMF法律部副总法律顾问

加勒比道路的经济意义

Courtney Blackman 爵士

经济管理实务：加勒比视角

Ian Randle 出版公司，2006 年，448 页，50 美元（精装）

S.B.Jones-Hendrickson 博士

东加勒比国家经济组织 (OECS) 论文集

iUniverse 有限公司，2006 年，328 页，24.95 美元（平装）

有关东加勒比国家的经济学文献很少见，所以这两本反映该地区现实状况的著作的出版极受欢迎。由巴巴多斯中央银行的第一任总裁 Courtney Blackman 撰写的《经济管理实务》在宽广的政治背景下做出的清晰而简要的描述，反映了加勒比地区的经济问题。S.B. Jones-hendrickson 的《东加勒比国家经济组织论文集》则反映了该地区从 1980 年至今经济的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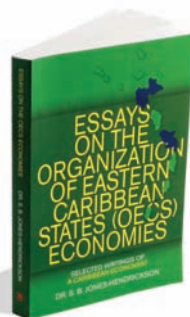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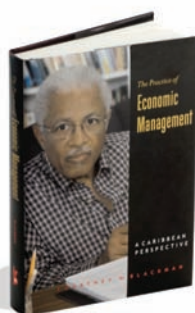
两位作者都向读者提供了深

入的见地，有助于我们观察加勒比国家经济的特性和决策者在帮助促成其国家的发展形势中所起的作用。在 Jones-Hendrickson 看来，20 世纪 80 年代

初东加勒比国家之间紧密的联合在为其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而 Blackman —— 他将诸如社会和历史学科融合进了他的分析中——则认为，加勒比地区的经济部分是由其历史和文化，即经济管理普遍薄弱所驱动的。

Blackman 认为，加勒比国家所经历的许多经济问题是决策者管理失误造成的。这些决策者常常显得过分地关注于选民短期内的安全需求，而不太关注财政改革和支出控制等较长期的问题。他的论文内容大大受制于许多拟议的政策规范，有时还与经济决策中使用的更为传统的规范相左。

Jones-hendrickson 论述的思路



与 Blackman 相似。他认为，东加勒比国家政府追随昂贵的财政政策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他们试图迎合选民对公共货物日益增长的需求。其结果是，财政失衡日益加重，债务气球日益膨胀。但是与之相反，Blackman 在定义小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几乎完全屏弃了主流经济学的观点。鉴于人力与技术能力、文化道德和国家的历史（尤其是其过去的殖民地历史）在决定经济结果时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对经济失误的指责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其归结为管理薄弱似乎过于简单化。

Thomson Fontaine
IMF 非洲部经济学家

关于
全球化的
消息和分析，
全球化对
世界各
经济体的影响。

IMF 调研

访问 IMF 调研在线杂志，
请登录

www.imf.org/imfsurv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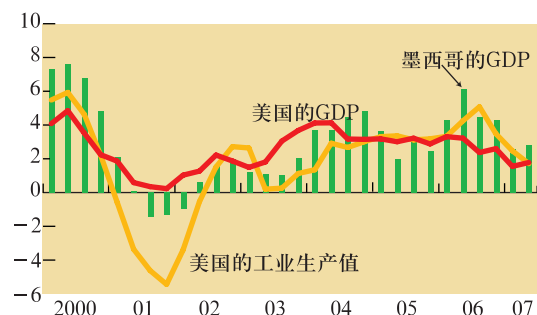
墨西哥



由于得当的经济政策，墨西哥获得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稳定。该国目前的挑战就是实施进一步的改革，以加速经济增长，削减贫困，进而弥补石油收入可能出现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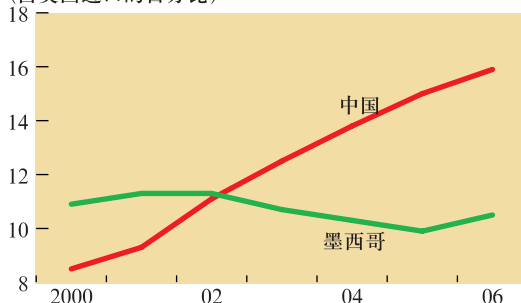
自2000年以来，墨西哥的增长平均在3%左右，其商业周期与美国商业周期的联系日益密切。

(与上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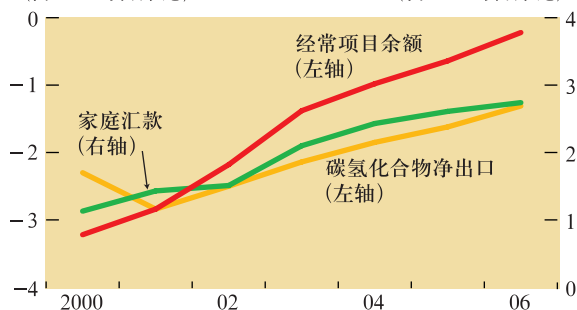
由于近一些年中国出口的激增，墨西哥出口出现下降之后，在其最为重要的市场——美国的进口份额已经稳定下来。

(占美国进口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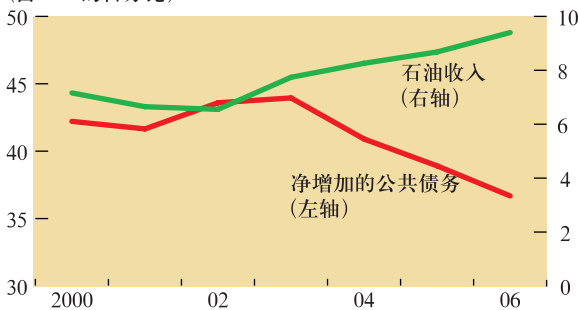
由于不断上涨的油价和日益增长的国外汇款，经常项目赤字基本消失。

(占GDP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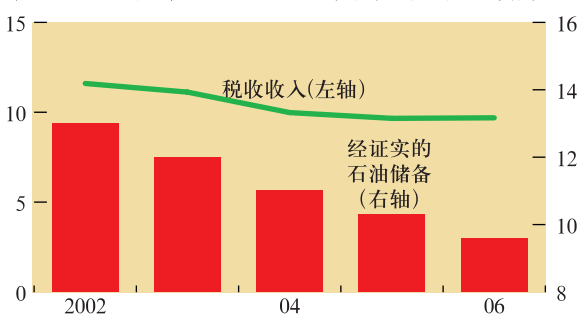
由于财政纪律的加强和石油收入的增长，公共债务比率已经下降。

(占GDP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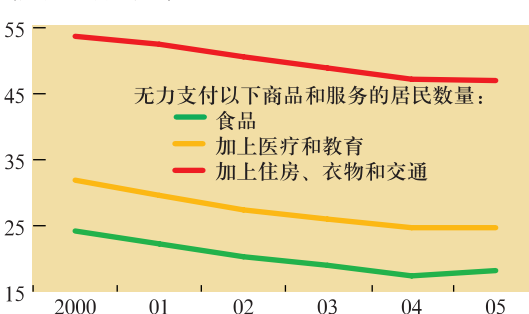
但是税收收入非常低，必须要提高以弥补石油收入可能出现的下降……

(占GDP的百分比)



……而且必须要加大投资和社会支出，以促进经济增长，消除贫困。

(占居民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Haver Analytics、墨西哥政府以及IMF工作人员的估计。

主权财富基金增长

我们对这些重要的国有性质的游戏参与者了解不多

Simon Johnson



Simon John是IMF研究部主管、经济顾问。

主权财富基金是一个还算新的名字，但是它所指的东西已经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政府持有的以另外一个国家货币表示的资产。所有国家都拥有外汇储备（目前，外汇储备通常是美元、欧元或者日元形式）。当一个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的话，就会累积超过它认为短期需要的外汇储备量，这时，就可以成立一个主权基金来管理这些“额外”的资金来源。

主权基金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它在世界范围总规模的急剧扩大是近10—15年的事情。1990年，主权基金持有资产最多大约有5000亿美元；但其现在持有的资产估计已经有2—3万亿，而根据经常账户最可能的趋势推算，到2012年，主权基金持有的资产将达10万亿美元。

到目前为止，超过20个国家已经建立了主权基金，还有6个以上的国家表示也有兴趣建立这样的基金。另外，资产持有也相当的集中，最大的5个基金占了总持有资产的大约70%。有一半以上的资产在那些出口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手中。挪威的主权基金规模很大，其他像阿拉斯加州、加拿大、俄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虽然地理上完全不同，但同样拥有庞大的基金。大约有1/3的资产总额被亚太国家持有，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和新加坡在内。

3万亿是一大笔钱吗？这要看和什么对比。美国的GDP是12万亿，以美元计算的商业有价证券（债务和股权）的名义总价值据估计超过50万亿，而全球商业有价证券价值大约为165万亿。如

果这么来看，3万亿虽然可观，但并不算巨额。

但是，如果相对于一些新兴市场的规模来讲，3万亿就是非常巨大的数目。非洲、中东和新兴的欧洲市场加起来，商业有价证券的总价值大约才4万亿；这也差不多是所有拉丁美洲市场的总规模。私人对冲基金——一种广义的私人投资基金类型，这种基金追求高收益，因此往往导致相当大的风险——管理的总资产据估计大约也就刚接近2万亿美元。因此，就像目前关于对冲基金的辩论一样，一场关于主权财富基金的潜在风险和机会的辩论也顺理成章的兴起。

信息缺乏

在今天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上，一种特殊的货币汇集方式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受管理的资产，还和投资策略中潜在的杠杆作用（也就是负债）息息相关。

举例来说，据报道，很多对冲基金和（对冲基金的“亲属”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杠杆比率为10:1。这也就是说，在这些交易中，他们将所拥有的资本借出去了10次。在有些案例中，杠杆比率甚至更高，令人瞠目结舌。无可否认，对冲基金改善了资本在全世界范围的分配，但是它们也可能造成对世界金融体系的威胁。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认为对冲基金应该接受更严格的审查，虽然继续保持对其相对较少的直接管制有利于全球资本流的分配。

不幸的是，我们对主权基金知之甚少。关于它们的资产、负债、投资策略的公开信息几乎没有。大家猜想它们应该只属于传统的“长期工具”：也就是说，它们从事“买入并持有”的策略，不从事短期行为，可能也不从事借款或任何直接的贷款活动。但是有一些传闻说，有些主权基金也和其他杠杆型基金一起进行投资。

至少有一家中央银行被报道在1998年对冲基金破产的时候曾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起进行投资。另外，还有一家中央银行很明显近期投资了一家大型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报道它们已经将部分投资从债券转向股票，我们认为可能会有更多的基金采取同样的行为。看起来很明显，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的部分资产来自主权财富基金（当这些与股票相关的资产增加时，必须引起我们加倍的注意），但是不知道数目多少。

无赖交易员——这也是对冲基金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主权基金的一个潜在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可能还不是很普遍，但是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负责央行储备投资的交易员进行了大量的投机活动，损失惨重。至少，其中某些交易员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信用风险经理的同意。不可能要等发生那么多事情之后才唤起人们对涉及主权国家的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监管的要求。最近施行的监管对冲基金的方法与其说是监管这些基金，不如说是密切关注那些贷资金给他们的受监管的中介机构。但是随着主权基金的重大发展，这种方式事实上也导致了一系列未受监管的中介机构的产生，它们可能会，也有可能不贷款给对冲基金。这些基金机构中不受监管的国有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真正的危险在于主权财富基金可能会刺激资本账户保护主义，各国通过这些保护主义挑拣决定由谁投资什么。当然，始终会存在一些国家安全限制，用以限制外国人在某些项目上的持有情况。但是世界范围内近期的发展情况表明，可能存在这样一种理解，外国政府不被允许拥有被认为是经济“制高点”的东西。这是一种灾难性的倒退，可能会极速、痛苦地导致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优先消除这些压力非常重要。

新加入的游戏者

主权基金不大可能会消失。它们是建立在经常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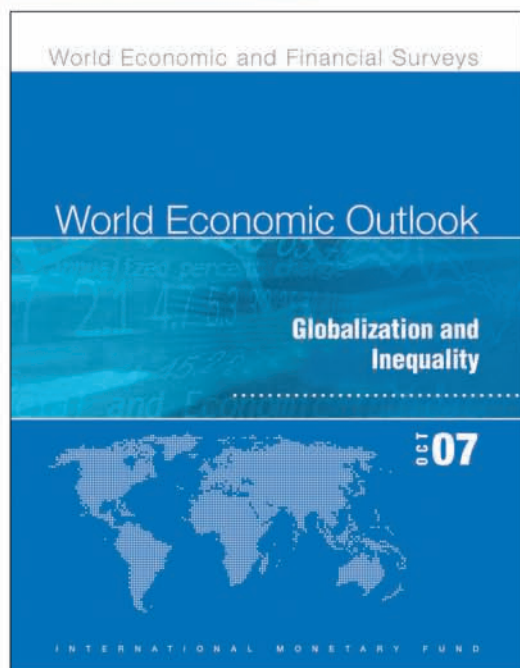
目顺差基础上的，只有那些拥有巨大顺差的国家开始履行那些延迟的经常项目赤字时，这些基金才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但是从目前的情况估计，在现在通用的主要汇率结构不变——意味着有些国家拥有巨大的顺差，而另外一些国家拥有巨大的赤字——以及顺差国从表面上显现的继续维持顺差的意愿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国家会开始行使延迟的经常项目赤字。当然，世界经济的确切形势会发生变化。增长会加速或者减速，这极可能影响到矿产品的价格。但是如果矿产价格居高不下，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出口商就会拥有巨大的顺差。如果矿产价格下跌，亚洲那些出口工业加工品国家的顺差就极有可能上升。

对于这种情况，IMF应该怎么做呢？当然，没有必要采取一些引人注目的激烈的行动。首先，这种情况涉及到与国家主权相关的一些敏感事务。另外，以目前3万亿总额的水平而言，主权基金还不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但是，当总额增长到接近10万亿美元的时候——虽然10万亿也不是一个大数目——这种现象或许应该引起更多的注意。

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在这场辩论变成政治话题或是竞选运动的一部分之前，对这些突出的问题开始建设性的讨论。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确定主权国家愿意分享哪些信息，要求提供哪些信息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信息可以用于我们进行全球经济和金融分析。

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能用来推断这些基金今后可能岌岌可危，令人担心是否会继续存在。事实上，IMF一直积极鼓励那些出口不可再生资源的国家“未雨绸缪”，建立这样的基金。但是，任何一个世界金融市场的监管者都必须充分关注私人对冲基金带来的现实和潜在的杠杆作用——主权基金无法被准确估算，除非我们能准确知道它们和对冲基金的联系到底有多深。

总而言之，主权财富基金是21世纪主要的国有性质游戏参与者。对冲基金虽然在本世纪变得更加突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倒退到了19世纪末，当时大量的私人资金在全世界范围游动，几乎不受管制——总的来说，这带来了世界范围内一个长期的全球经济繁荣和生产力快速增长的时期，但同时也导致了相当数量的危机。当21世纪国家部门和19世纪私人部门的情形一样的话将会怎样呢？有可能很好也有可能很坏。结果仍需拭目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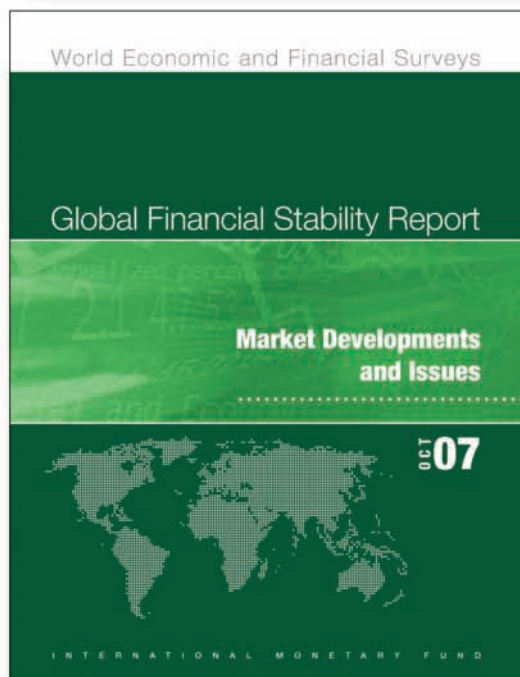


世界经济展望 年度订阅

《世界经济展望》是IMF工作人员所做的一部在信息收集和分析方面极具国际影响的著作,可以给一些重大倡议提供指导并服务于IMF的成员国。《世界经济展望》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出版,每年至少出版两次,为您提供国际经济形势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全面分析。凭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00多名经济学家的专业知识作后盾,《世界经济展望》已成为其自身领域最具权威的参考资料。当今世界,即使是小小的经济波动都可能引致强烈的金融动荡。因此掌握经济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几个月或者几年的走势至关重要。《世界经济展望》将向您提供有关经济发展的最新观点,并且还为您提供相关的分析、预测和数据,使您全年受益。

定价: 94 美元, 平装

ISSN: 0256-6877 库存号: OPTNEA4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追踪市场风险, 鉴别潜在的故障带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做了一项必须做的工作,那就是力图鉴别出全球金融系统中能够导致危机的潜在故障带,并且还提供了对成熟金融市场和新兴金融市场的全面论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主要关注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的状况,其中主要关注以下两个问题:金融不平衡;给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以及新兴市场借款者的市场准入带来风险的结构性问题。该报告定期向我们提供与国际金融稳定相关的结构性问题和系统性问题方面的文章。但是请注意该报告的本意则是为了加深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理解,而全球资本流动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取代了自1980年出版的年度报告《全球资本市场》以及自2000年出版的电子季刊《新兴市场融资》。

定价: 57 美元(学术优惠价格: 54 美元), 2007年4月, 160 页(简装)

ISBN: 978-1-58906-637-3 库存号: GFSREA2007001

欲了解更详细的信息或者订购图书, 请登陆网站

www.imfbookstore.org/fp/P0706GN2-FD, 或者发送电子邮件至 publications@imf.org,

图书优惠代码 P0706GN2-FD。